# 康复的家庭

【日】大江健三郎

共同记录的灵魂之音

父亲倾注温情的文章

母亲充满柔意的插图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

大江健三郎的长篇随笔

令你为之动容

【日】大江由佳里 插图

郑民钦 译

策　划：杨　雯／责任编辑：汪冬梅／装帧设计：姚　荣／版式设计：许　菲




ISBN 7-5442-2705-7
9 787544 227056 >
ISBN 7-5442-2705-7
定价　22.00元

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　**许金龙·主编**

# 康复的家庭

【日】大江健三郎·著

郑民钦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4·海口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4-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复的家庭／（日）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4.3
ISBN 7-5442-2705-7

Ⅰ．康… Ⅱ．①大… ②郑… Ⅲ．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6358 号

KANGFU DE JIATING

**康 复 的 家 庭**

| | |
|---|---|
| 作　　者 | （日）大江健三郎 |
| 插　　图 | （日）大江由佳里 |
| 译　　者 | 郑民钦 |
| 主　　编 | 许金龙 |
| 策　　划 | 杨 雯 |
| 责任编辑 | 汪冬梅 |
| 装帧设计 | 姚 荣 许 菲 |
| 出版发行 |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
| 社　　址 |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
| 电子信箱 | nhcbgs@0898.net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上海长阳印刷厂 |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6.5 |
| 字　　数 | 150 千 |
| 版　　次 |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442-2705-7 |
| 定　　价 | 22 元 |

[导 读]

# 温暖的大江健三郎

许金龙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个婴儿在日本的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呱呱坠地。这个婴儿，就是在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推出的系列随笔集“温暖人文”（全四卷，《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致新人》）里正对我们娓娓道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当然，与我们亲切交谈的这位作家，此时的身份与其说是文学大师，毋宁说是我们的一位朋友，与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长、我们的老师和所有热爱我们的人并无二致的一位普通朋友。因为，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欢乐和苦恼；他在大学期间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思索和追求；他走上社会后也有着和我们相似的成功和挫折；当然，在他年岁更大一些后，也就是成立家庭后，也和我们的家长一样，需要面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比如孩子抚养问题和教育问题等等。当然，对于大江先生来说，情况可能更特殊一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就因为头盖骨缺损而导致脑组织外溢，在父母的爱心和医院的抢救下虽然存活了下来，却留下了永远的后遗症——智力障碍。

“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大江先生和他的妻子为这孩子起了一个寄托了美好意愿和良好祝福的名字——光，希望光能够在漫长的人生中幸福地生活。对于大江先生和他的家庭来说，如何与这个孩子共生共存便成了需要积极面对的

最大课题。同时，有关这个课题的思索和感悟也成为大江先生在文学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频频出现在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和《万延元年的橄榄球赛》（1967）——该作品此前亦被译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到最近刚刚发表的系列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和《二百年的孩子》（2003）之中，使得作者的"文学观也随之发生积极意义上的转变"，从对智障孩子的关爱升华到对二十世纪人类三大悲剧（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关注，乃至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期盼象征着纯洁无垢和美好未来的新人——你们的出现！因为，你们与过去相连接，更通往美好的未来。

对于渐入老境的大江先生来说，这种期盼最近越来越强烈，除了在大量的小说作品中不断引入孩子这一具有明显象征性的概念外，他还第一次以平实易懂的口语文体，专门为你们——纯洁与美好未来的象征——写下了《在自己的树下》（2001）这部自传性很强的随笔集，分别以逃学、生存，还有自杀、语言、反战以及学习方法等作为不同主题，与所有具有相同或相似苦恼的孩子进行平等和真诚的交流。

大江祖母给他讲的故事中，有一个叫"自己的树"，山谷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棵属于自己的树，人的灵魂从"自己的树"的根中出来钻到刚降生的孩子里，而人死了灵魂又返回树根里。聪明的灵魂会记住自己是从哪棵树来的……但不可以说……如果进了林子，无意中站到"自己的树"下，年长的自己会和年幼的自己相遇……如果年幼的自己问"你是怎么活过

来的？”，年长的该何言以对？你像树一样笔直地向上生长了吗？

小时候的大江，曾问爸爸一个问题：树为什么能笔直地向上长？植物学上在森林中争取有限的阳光的答案，大江什么时候和怎样得知已经不重要了，而这个问题本身的象征寓意，无意中成了大江理解人生和锻塑人格成长的圭臬。

《康复的家庭》(1995)和其姐妹篇《宽松的纽带》(1996)是大江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的长篇随笔集，作家用同样朴素的口语文体叙述了自己家庭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成员间的温情。透过这些与他的小说语言和文体截然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随着作家一同体验面对智障儿子光的苦恼，发现光的音乐天赋时的喜悦，进而从家庭内部和作家心灵深处来观看外部世界，观看大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观看形成大江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江健三郎“温暖人文”散文系列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中所有的插图均为大江夫人由佳里所作。这些彩色画作与大江的文字共同构成了一个绮丽的世界，吸引我们进入其中的美丽世界。透过这些充满挚爱之情的文字和画面，我们将为共生共存的这一家人而感动，而赞叹。

# 目录



# 痛苦的样子



## 1

二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我看见起居室门背面贴着一张画卡——这是我们家祝贺生日的习惯方式——祝贺妻子的生日。这张贺卡是长子张贴的，画面上两个身穿同样颜色的服装、个子一般高的小姑娘正在给黄色和蓝色的大朵鲜花浇水。花朵和少女上都用罗马字母写着母亲的名字UKARI——这是长子对母亲的特殊称呼。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这首先就有点不可思议。

长子出生的时候，脑部发育不正常。经过畸形矫正手术后，又开始出现癫痫病等新问题。每次发病，医生都如亲人一样尽心治疗。我的家庭有幸结识一位医生，名叫森安信雄，如今已经去世。我以后还要详细回忆与森安先生的交往，但在我的心里，他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人生即相逢，从而学到各种各样的“人类文化”。按照这个理解方式，我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都作为“文化问题”加以把握。森安先生使我懂得了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问题”。

我的长子智能发育低弱，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但相当于正常人多大岁数的精神年龄呢？不用说我，家里其他人也都没有计算过。但是这一天，他写在生日贺卡上的一段奇特的文字，比花朵更让我注意。

一进入今年，过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多非常痛苦的样子。由佳里，再忍一忍就好了。学会许多罗马字，这一天就很愉快。非常痛苦的不是妈妈，只是姥姥。我这就放心了。

我又看一遍，惊奇地发现他的语言仓库里还储存着“痛苦”、“痛苦的样子”这些陌生的词汇。因为以前从来没听他说过“痛苦”这个词。

这些平时不用的词语，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收藏在他的心里。他创作完钢琴小曲起名时，一些词汇会突然浮现在脑子里。例如《悲哀》这首曲子。在此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有用过“悲哀的”这个形容词的变化形态。但是有一天，他在放在钢琴前面的乐谱上工整地写上“悲哀”这个曲名。

看到语言的这种不可思议性，我经常想起窪田空穗年轻时写的一首旋头歌："沉默的心海，半浮半沉荡漾着，一个词语。"

"痛苦"这个词究竟是通过什么机会什么形式传递给长子，储存在他心里的呢？这成为我们家这一天的话题。然而，"痛苦的样子"是他自己特殊的用法。可以说，这是从他自己的内心涌现出来，并非从外面传进他耳朵里的词语。

长子在心里把外祖母叫做"痛苦的样子"。家里人都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现在还和已过八十五岁的岳母住在一起。她曾住在客厅里，经常把客厅前面的正门打开，到门口迎接脑子里想像的回来的家人或者来访的客人，从早到晚，每隔四五分钟就去门口一趟。

外祖母是伊丹万作的遗孀。即使是家里人都想称其为"伟大的"这位电影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是《无法松的一生》。在日本战败的那段时期，伊丹患肺结核卧床，他还记得这部由阪东妻三郎主演的电影剧本是自己创作的。

伊丹万作写出非常详细的绘画分镜头剧本，对角色分配十分用心——他的儿子伊丹十三导演说，只要演员一定下来，这部电影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导演拿到绘画分镜头剧本后，照此立即开机拍摄。我当学生时，曾经仔细翻看过这个剧本。

电影中那个富有教养、举止文雅、不乏幽默的军官遗孀是伊丹万作以自己的妻子为模特儿塑造的人物形象。伊丹十三曾对妹妹，即我的妻子说过：电影里军官遗孀与她的儿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父亲留在自己死后的教育规划。

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十年以前——的外祖母，在家人以及老朋友的眼里，其人品性格与电影里备受无法松敬仰爱戴的

军官遗孀简直一模一样。而现在，长子感觉到外祖母是“痛苦的样子”。

按照长子的思路看这段文字，“由佳里，再忍一忍就好了”，这句话也许具有黑色幽默的要素，但他的内心应该藏着这种痛苦的疾病不会长久持续，很快就要康复的意思。

因为长子应该害怕地拒绝死亡——对他来说，森安先生的去世是最大的遗憾。贯穿于我正在创作的一系列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人或者家庭在从生病到康复的整个过程里伴随着真正的喜悦、成长和人格的完成。虽然长子无法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无疑通过自己的身体，深刻而明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然而，这个无法康复的疾病，人到老年以后，不仅肉体，而且精神也将衰弱下去，这是何等痛苦啊！“一进入今年，过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多非常痛苦的样子。”面对这种痛苦的衰老和终极的死亡，如果不相信灵魂拯救和彼岸世界，本人和家属的心灵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吗？所以面对这不治之症，如果病情有所好转，即使像冬日暖阳般短暂，都会给家庭带来欢欣激动的鼓舞。

至少现在我还无法谈论灵魂拯救和彼岸世界，但弱智的儿子感觉到外祖母“痛苦的样子”。我看得到从他们的关系里浮现出的微弱亮光。



## 2

前年，我和妻子自费出版了长子光创作的钢琴曲作品集。我在后记里想告诉读者他的残疾情况以及音乐对于他存在的意义。现将后记抄录如下。

光出生的时候，被发现脑部不正常。准确地说，经过手术以后，他才活在这个世界上。手术之后还一直长期关照他的森安信雄博士去世的时候，光写了一首曲子《给M的安魂曲》。这首音乐的旋律充满真诚的悲哀，使我们一家人感到震惊。我感觉到，通过他创作的音乐，可以窥视他内心最深处的感情。

据妻子回忆，当明显感觉到光的智能发育低弱的时候，他却从婴儿时期开始对音乐具有敏锐的反应。三岁的时候，听到贝多芬的音乐，就发出“贝——贝——”的声音；听到肖邦的曲子，就发出“嗯——邦”的声音。对于生出来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残疾儿的妻子来说，这个年轻的母亲无疑从在婴儿床边听到的音乐旋律中感受到激励自己的力量。

我作为年轻的父亲，自然也一直陪伴在光的身旁。光对鸟的叫声感兴趣，我便让他听一百多种鸟叫声的录音带。光五岁的时候，我和他在森林的小屋里，忽然听见鸟叫声，他模仿录音带里播音员的声音，慢慢地说：“这是——秧鸡。”这是光第一次用含义明确的语言和我进行的交流。

但是，光进入小学特别班和残疾儿童学校中级班以后，对

鸟叫声逐渐失去兴趣，开始喜欢音乐。他整天听着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巴赫等音乐家的作品。

田村久美子老师教光弹钢琴以后，他开始练习作曲。虽然残疾对肢体的行动产生影响，但久美子老师千方百计地耐心指导，不拘泥于手指的动作，把光引进选择和音、理解旋律的方向。终于有一天，我和妻子惊讶地看到他用豆芽菜般细长的音符写出来的第一首曲子。

久美子老师给光上课时，我坐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看书。我感觉到光通过音乐自信而生动地表现出自己最美好的人的素质。我每次听到久美子老师以及其他同样鼓励我们的音乐家们演奏光的作品时，都惊讶地感受到光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种内心世界的感情，如果没有音乐，光一生都无法表达，我和妻子、光的弟弟妹妹也绝对无法知道。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不能不说从音乐里发现了Grace。我把这个词理解为人格的高尚、品质的美好、感恩祈祷。我聆听着光的音乐以及音乐背后超越俗世的自我的东西。

《钢琴曲作品集》里收入十六首作品，每一首都是长子与家庭共同生活的各个场景的生动反映。自长子出生以后，我和妻子——尤其是她——四处奔波，但在这夙夜辛苦的日子里，也有歇脚休憩的时候。光的音乐正在表现这个时候的情绪，这使我觉得很有意思。

光以小学特别班毕业那一天的情景为主题的《毕业》，进入残疾儿童学校高级班以后为学生节创作的《青鸟进行曲》——这所都立学校名叫青鸟残疾儿童学校——不仅仅这些明确标有

日期的曲子可以引起人们的回忆，其他曲子也同样是休憩时间的记录。

例如《北轻井泽之夏》这首曲子，我在倾听一位钢琴演奏家朋友录制的录音带时，便不知不觉地进入在北轻井泽的别墅里度过的几个夏天的时空里。那个时候，妻子写生北轻井泽的花草，画册里还有几幅写生孩子们的图画。一边看着画册一边倾听光的音乐，那些夏天的情景鲜明地浮现在脑海里。

听今年考入大学理科专业的次子说，他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曾写过一篇作文《马拉松》。光从小学上中学的那一年夏天，女儿正在读小学，他们三个人每天早晨从位于山坡的森林里的别墅出发，一路“马拉松”跑到网球场旁边的泉水形成的小水流的地方。

女儿和光一起跑步就觉得心满意足，根本不争胜负。今年她就要大学毕业，性格变得谨小慎微，想起她小时候无拘无束放声大笑的性格，变化如此之大，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次子总想着要超过哥哥，第一个回到母亲种植有败酱草、桔梗的别墅院子里，进行好几次冲刺。不过，还是光经常跑第一名。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光具有最好的运动能力。后来由于癫痫病发作，体重也增加太多，即使到北轻井泽别墅，也没有和弟弟妹妹一起出去跑步。对于他来说，十岁到十二三岁是从跑步中获得愉快的人生的最好时期。

每当这个时候，妻子拿着写生画册一边观察花草一边等孩子们“马拉松”回来，我则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看书。如今，这盛夏般的人生时光早已过去。光的疾病越发严重，我和妻子也按照自然规律走向人生的秋天或者冬天。生命力的进展过程使

我们不得不忍受人生晚年的“痛苦的样子”……

外祖母在身体和精神上感觉较好的时候，会走进起居室，带着哄小孩般的温柔和威严，告诉光电视台播放古典音乐的节目。光的回答也如幼儿一样温顺。那天傍晚，外祖母每隔两三分钟就走进起居室，要妻子把水倒在各种各样的小器具里。在妻子应付外祖母的这段时间里，光一直躲在屋角，低着眼睛。这时，他的心里是否浮现出“痛苦的样子”这个词语？

然而，第二天早晨，外祖母又恢复老者的威严和温柔叫唤光，光也彬彬有礼地回答：“是！”



# 慎重的幽默



## 1

每隔四个星期都要去板桥的一家大学附属医院为光取预防癫痫病发作的药。长期如此，已成习惯，几乎从来没有忘过。有一天，发现家里的药只够吃到星期天早晨，于是星期六前去取药，但是医院休息，弄得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我正在空荡荡的医院公共汽车站着急时，一位出来散步的住院老年病人主动问我怎么回事，然后告诉我不妨到一层的急症挂号处去打听一下。于是我到那里开了一张一天用药的处




光和菜採子（长女）、樱麻（次子）在北轻井泽

方，临走的时候，好像是负责人的值班护士严厉告诫我：以后要提前来取药。

经过这一次教训，每个月快到月底的时候，家里人互相提醒，及时去医院取药，当然要避开星期六。我每次去取药总要浪费半天的时间，但发现如果在医院里看书，其实和在书房里没什么两样，于是便还主动要求去取药。

有一次，我在医院前面的大药房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身穿白大褂的年轻药剂师叫光的名字——处方上写的是儿子的名字——我走到柜台前，他和蔼地告诉我："这副药费点儿时间，午饭后再来。"其实，我刚才听见药房内对讲机的对话，已经觉察到分药时出现差错，所以觉得这个药剂师说话不诚实。

我回到医院，走进餐厅。在这里，我已经吃了二十多年各式各样的饭菜。这里普普通通的三明治有的带有一种特殊的芥末味，曾经让我清晰地回想起光动手术前后的许许多多往事。那一天用餐的人很多，我坐在角落里，旁边的餐桌上，三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正一边吃饭一边低声谈话。话题好像是给一个脑病患者——不知道是小孩还是大人——动手术的事，说是那位患者即使手术成功，也不能作为正常人重返社会，觉得徒劳无益。

不久以前，我在名古屋访问过接收重残儿童的医院。我想起当时看到的景象。一个精神孤独症的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干干净净的地板上——这所医院的病房充满清洁舒服的味道。医生蹲在旁边耐心地鼓励他。他明天就要接受肠的手术。孩子一言不发，医生告诉他发现肠出现异常的过程；孩子不能通过语言理解任何东西，医生告诉他要忍受手术后的痛苦。我一边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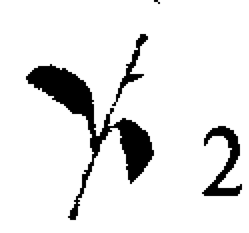
光和主治医生森安先生

着咖喱饭一边想起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旁边那三位年轻医生也给我留下尽心尽责工作后辛苦疲劳的印象——当然，我没有勇气和他们打招呼。

那一天，我花费从未有过的长时间才取完药回到家里。第二周，儿子感冒发烧，没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在家休息。第二天抑或第三天的晚上，我被他痛苦的咳嗽惊醒，便起身走到他床边。儿子满脸通红，睁着一双潮湿的眼睛，无神地盯着空中。我平时总是像对孩子，甚至像对幼儿一样对待他，心里总是挂念他的异常情况，而现在突然发现眼前的儿子完全像一个与真实年龄相称的大人。

接着，儿子出现想尽快从发烧的身体消除肉体痛苦和不安的祈祷般的愿望。我看着儿子，束手无策，上一周在医院取药时萌生的怒火——被自己捂下去——不由地重新燃烧起来。我大概也和儿子一样，满脸通红，呼吸急促。但是，躺在我眼前的忍受着发烧痛苦的儿子本身也起到让我平息怒火、冷静情绪的作用。

我面对不停咳嗽的儿子，能做到的只是给他枕边的杯子里添水，把他身上的毛毯盖好，然后熄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但感觉到这个星期一直堵在心口的郁闷已经消除，心情平静地重新上床。

 2

长子光出生的时候发现头盖骨有缺陷，把长在外面的瘤子一样的东西切除下来以后，再用塑料板修复缺陷部分，经过这些手术以后，他才算真正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我已经多次写过，为光做手术，并且在手术以后长期定期检查、一直鼓励光勇敢生活的是日本大学附属板桥医院脑外科医生森安信雄博士。受到森安医生治疗和鼓励的不仅仅是长子光一个人。他对于我们全家来说，还是心灵上的医生。

几年前森安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夫人给我寄来三页日记复印件。与学者、作家的日记不同，他的日记本的格式十分实用，字体认真工整，风格长年不变，显示着他的性格。夫人寄来的日记复印件记述着我和光的事情。大概夫人在先生去世之后细心阅读他的日记时发现的吧。

第一页有很多记述，其中涉及我的只有一行：

**年轻的作家经过犹豫和迟疑之后，终于下决心同意儿子动手术。**

我对没有流露任何感情和感想的这一句话感到吃惊。不动手术，光就无法生存。年轻的父亲在一段时间里对动手术犹豫不决。这些事实记载在森安先生的日记里。我经常想，仅仅是这个事实，如果存在超越人类的东西，我在它面前就无法抬起头来。但是，犹豫不决后的断然决定甚至使我产生自己再生的感觉。

我的描写光的作品《新人哟，醒来吧》获得文学奖，日记第二页记载森安先生参加颁奖仪式当天的感想，记录了我说的一句话：

“我说过，是妻子和给我的儿子做手术的森安博士一直支撑着我和儿子。”

然后写下这样的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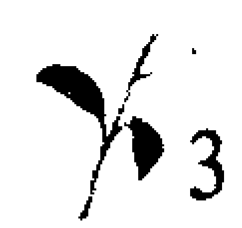
余亦关照光君二十年，虽远不及大江先生系念光君之情，然读其各种作品、评论，知其心情与医生多有共通之处。余向大江夫妇、光君表示衷心的祝贺。

森安信雄先生这样的医学专家评论我的作品，是我终生的荣幸。然而第二年，先生就病倒了。我闻讯大为震惊，也不管能否见得到，立即赶往医院。第三页上先生当天的日记是这样记述的：

大江先生来探视。由门诊Dr.菅原领来。看来他甚为余担心。他说光大概也很高兴。我说在六月休息一个月，因为挂念光君病情，以后打Tel了解他的情况。于是他放下心来。给我一本新著《阅读渡边一夫》离去。打算暑假好好阅读。

肯定门诊还有许多患者等我看病。心里着急，希望早日恢复健康，给患者治病。作为一个受到患者信任的医生，具有这种自觉性。这大概是长期在我的身心里自然形成的吧。反躬自

省，今后应更加努力，精益求精。



我参加由政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成立的“思考和平之会”已有六七年了。该会核心召集人是经济学家、我国近代基督教史专家隅谷三喜男博士。

在该会成立几年后的一次年底聚会上，隅谷先生亲自把一张印刷品分发给大家。因为这时聚会即将结束，也就没看。在回家的地铁里，我掏出来一看，不由得震骇，同时也深受感动。

上面的内容大致是说：大家从最近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大概都已知道，自己的确得了癌症。但医生说现在还可以工作，于是制定了五年规划，有所取舍，有的工作不能承担，想集中力量从事主要工作。核武器是世界的癌症，必须废除，所以打算继续努力开展废除核武器的运动……

隅谷先生当时是东京女子大学的校长。我应在该校教法语的前辈的邀请，曾做过一次题为《无信仰者的祈祷》的演讲。由于这个关系，我和隅谷先生还在电视上对谈。为此，我阅读先生的《日本近代基督教史》，受益匪浅。

先生指出，纵观我国从明治时期至战败的教育史，只有基督教徒对超国家主义势力进行过真正的反抗。今天对于——虽然还不能称为“超”—— 新国家主义向教育的渗透，也还是基督教徒进行真正深刻意义上的批判。

我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佛教徒，在那次演讲中，我说，即使像我这样的无信仰者也会有只能称之为“祈祷”的心灵体验，在我的人生旅程中，由于一直与残疾的长子共同生活，所以不断感受这种体验。

我每次见到隅谷先生，总是感受到一位具有信仰的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这也是引导我进入最深刻的人生感动的感情。于是，我的心里不知不觉地萌生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想过用什么样的语言概括隅谷先生的人格。这也可以说是我作为小说家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不仅对人，即使在街头看见榉树萌出许多嫩芽，尽管年年如此，我也想写一篇短文表现眺望这些树木的感受。我对浮现在脑海里的文章反复增删修改，直至形成稳定的文体……

对于隅谷先生，我想用“慎直的幽默”一语来概括。我想查一下这个平时不用的词语，于是拿过手边的词典查看，有的解释为“谦慎正直”，有的解释为“一本正经”。正是如此！因为我从每次聚会时隅谷先生的简短总结发言中都发现他的谦慎正直的幽默。我和他住在同一条铁路沿线上，有时在换车站台上碰见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模样令我畏怯地不敢上前打招呼。然而从远处看到先生的举止动作里含着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使我一整天心情愉快。那么，先生对什么如此谦慎正直呢？大概可以说是对基督教的主吧……

我心里萌生的奇怪感觉又是什么呢？我觉得以前也遇到过如此谦慎正直的高尚的人，那无疑就是森安信雄先生。森安先生已经去世。有一年，在森安先生的忌日，我和妻子前去探望他的夫人。听他夫人说，森安先生和隅谷先生原来是旧制一中

———高的同学，而且还是同一年级。这使我惊讶，也使我深知其理。

森安先生和隅谷先生在我心里结合成慎直的幽默的人品印象。这不是扎根于他们青少年时代一起接受的学校教育吗？据森安先生的夫人说，先生出生于基督教信徒的家庭，至今还信仰基督教，但先生本人似乎与教会没有关系。所以我想，联结森安先生与隅谷先生的纽带自然就是青少年时期的教育环境。

森安先生的确是一位慎直的人。我陪长子一起去先生的医院就诊时，长子兴高采烈，他的言行逗得——光原本就有幽默之处，知道幽默的效果，也有让先生高兴的意思——先生经常笑起来。但是，先生对于一旁的我总显得冷冰冰的样子。先生去世以后，我从他的日记里才知道先生不仅对我的长子，而且对我也十分关怀。先生对待我的长子的态度里洋溢着自然而高雅的幽默……

如果说隅谷先生对主谦慎正直，那么森安先生又是对什么呢？森安先生不正是对他日记里所记载的“长期在身心里自然形成的”、“受到患者信任的医生自觉性”谦慎正直吗？

我经常突然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好像光和自己从小到青少年时期一直受到同样的教育。其实仔细一想，父子俩在二十多年里一直共同受到森安先生谦慎正直的幽默的教育。



# 击中中心



## 1

八月三日晚间NHK播放的电视节目，是我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摄像师朋友们长期合作共同制作完成的。今年是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四十五周年。很早就开始策划制作一部主题为《世界还记得广岛吗？》的节目。我对电视节目制作本不熟悉，但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接受了节目策划这样大难度的工作。

我从长子光出生的那一年夏天开始，就经常去广岛。今年

六月是光的二十七岁生日，我的把以广岛为中心思考社会、世界和人作为自己文学活动支柱之一的工作也已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

我对广岛的体验写在《广岛札记》里，后来又写过不少各种形式的文章。其观点大概是这样的：人类在广岛、长崎所遭受的核武器打击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这种表现绝不过于草率——悲惨事件。而且在将近半个世纪里，这极具"威力"的核武器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起着巨大的作用。被原子弹轰炸的人由于放射线污染造成第二代人的各种疾病，受害者老年后会出现白内障、癌症等病症，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剧至今仍在继续。

我们也绝不能忘记的是，从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那一天开始，各种各样救助原子弹受伤者的活动就开展了，而且今天还以新的形式继续着。今年夏天，我在广岛见到这样一位老年妇女。她十七岁时遭受原子弹轰炸，当时她新婚不久，丈夫应征上了前线，自己不仅要忍受被烧伤的肉体痛苦，而且还要忍受在夫家受歧视的精神痛苦，但她仍然顽强地生活下去，抚育孩子，后来成为广岛演讲团的一员，向年轻人讲述原子弹轰炸的惨祸。她这样的人，从四十五年前夏天的那一天开始，就面对核武器的威力和受害者的悲惨，为恢复人性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着。

我经常想起他们的核心人物、原子弹轰炸医院重藤文夫院长。重藤博士担任广岛红十字医院副院长，赴任不久的那天，他在广岛火车站前面打算换乘电车去医院上班，遭到了原子弹轰炸。从下午开始，无数伤员抬进医院接受治疗。

现在想起来觉得不可思议，重藤博士是专门研究X光透

视治疗的医生，他立即发现医院地下仓库里的透视底片被曝光，开始仔细观察轰炸中心地的方向与医院内外的受害者、受害物之间的关系，成为最早确认投在广岛的新型炸弹种类的判断者之一。

光在六月出生，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是那一年的八月。当时我还年轻，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脑部就不正常，束手无策，不知如何解决，心乱如麻。我为了撰写在广岛召开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报告文学而前往广岛。那次大会在苏联的核武器是否为了正义、和平的评价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分裂。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刻，我对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几乎一无所知、毫无经验，为什么会接受大会报告文学的撰写任务呢?

现在我能明确回忆起来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情绪的迫切要求。如果不把自己的情感推向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就会被孩子的苦恼所压垮。另一个是当我接受《世界》杂志的年轻编辑一再要求撰写报告文学的任务后，从当时借居的二楼窗户俯视他离开大门的背影，忽然发现那身影看上去悲凉楚怜。

这位年轻的编辑安江良介君现在是岩波书店的社长，成为我终生的好友。当年是他说服我接受这项工作，其实他把我从被残疾孩子弄得焦头烂额的处境中拉出来写报告文学，大概也隐藏着自己的忧郁——他当时刚刚失去第一个孩子。

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吵得不可开交，弄得我筋疲力尽，但我还是抽空到广岛原子弹轰炸医院采访，听重藤文夫博士讲述自己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和治疗的经验，我觉得受到真正的鼓励，从内心深处治愈了自己的疾病。我的眼前展现出

一片崭新的人生视野……

在大学教过我的研究法国文艺复兴的专家渡边一夫教授，对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做过几个定义。其中一个定义是“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重藤博士谈论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以及受害者的治疗问题时，显然认为对这次惨重的灾祸“不要过于绝望，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表现出人文主义者对待苦难的态度。

我对这位年轻时专攻X光透视医学、具有不屈性格的医生恰好被派到广岛医院工作这件事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对自己面临人生第一次也许是最大危机的时候，能够在广岛听到医学专家的教导也觉得不可思议。正因为我在大学接受过另一位也是我终生老师的教育，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全理解重藤博士的人生思想。

这些重要因素结合的瞬间如命运一样存在于我的人生过程中。后来经过更多的实践，我现在对此坚信不疑。我有时候觉得，这是某种超人的存在通过我们人类“击中中心”的瞬间。



2

在绿叶葳蕤的时候，我到离广岛不远的一座以酿酒著称的小镇郊外访问重藤博士出生的老家。这一带旧房屋所在的地方显示是颇有历史的墓地。先生说过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在绿树茂密的山中墓地上，我向身体仍然矍铄硬朗的夫人询问先生原

子弹轰炸那一天之后的往事。一颗巨大的炸弹落在广岛，引起一场浩劫的消息很快传到附近的市町村，而且惨不忍睹的受伤者也纷纷逃到郊外。

晚上，夫人对重藤博士是否活着几乎已经绝望，但她还是打算第二天去广岛寻找遗体，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去广岛的火车票，便坐汽车去市区取票。而重藤博士幸免于难，在一个酿酒的朋友家里避难，喝了一些酒，庆幸自己死里逃生，然后推着自行车——担心骑车危险——往家里走，没想到在街上碰见妻子。

重藤博士从郊区搭乘去广岛救援的卡车回去，那天就开始为原子弹轰炸受伤者治疗。由于通往广岛市中心区的道路被封锁，他就在市郊的练兵场上为受伤者治疗。作为医生，尽管只是给伤口——当时不知道扔下来的是什么炸弹——抹些烧伤油，对于无数的受伤者却是多大的精神安慰啊。

就在重藤博士尽心尽力为大家治疗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受伤的军人站在自己身边的草地上一直敬礼。问他为什么这样，那个军人回答说：这一场悲惨的战祸是自己造成的，而您，一个非军人，为战争的牺牲者这样奋不顾身地工作……

当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里的重藤博士大概没有精力向夫人谈论这样的事吧。第二天，他又去广岛，之后连续几周一直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工作。一个月以后，他身体虚弱、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

我第一次见到重藤博士的时候，就在心里嘀咕他本人是否有原子病症状，但没有问他。这次问他的夫人，夫人微笑着回答说：他以前体质虚弱，带有神经质，自从遭受原子弹轰炸

以后，性格发生很大变化，别人都说他变得宽容大量，身体非常健康。

在为治疗原子病患者和维持医院运营而日夜操劳的那几年里，重藤博士正步入中年，身心发生巨变，判若两人，也许这为他后来一生从事的活动打下了基础。我每次阅读有关埃里克森的《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几篇评论和论文的时候，脑子里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重藤先生的面容，与文章里的描写重叠在一起。

重藤博士不正是通过向广岛这一场浩劫进行勇敢的斗争，进入超越“中年的自我存在危机”的新的人生阶段了吗？原子弹轰炸后的考验难道不正是为新的重藤博士的诞生——也是为了许许多多原子弹受害者的光明——而“击中中心”吗？

我这么考虑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的长子出生时脑部不正常，那时我二十八岁。我虽然比一般人早工作，但从人生年龄来看却是晚熟，这个年龄对于我来说，也许正处在“青年的自我存在危机”，或者已经进入危机即将结束的高潮期。在专家看来，我的见解也许大大偏离埃里克森的定义……

就在我即将进入危机高潮的时候，残疾长子的出生一下子压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痛苦，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儿子经过手术，终于可以留在家庭里生活，我以虚构的形式把整个过程写进小说，可以重新统和整体体验。于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度过了“青春的自我存在危机”。那些事情也如“击中中心”一样出现在我人生的重要时期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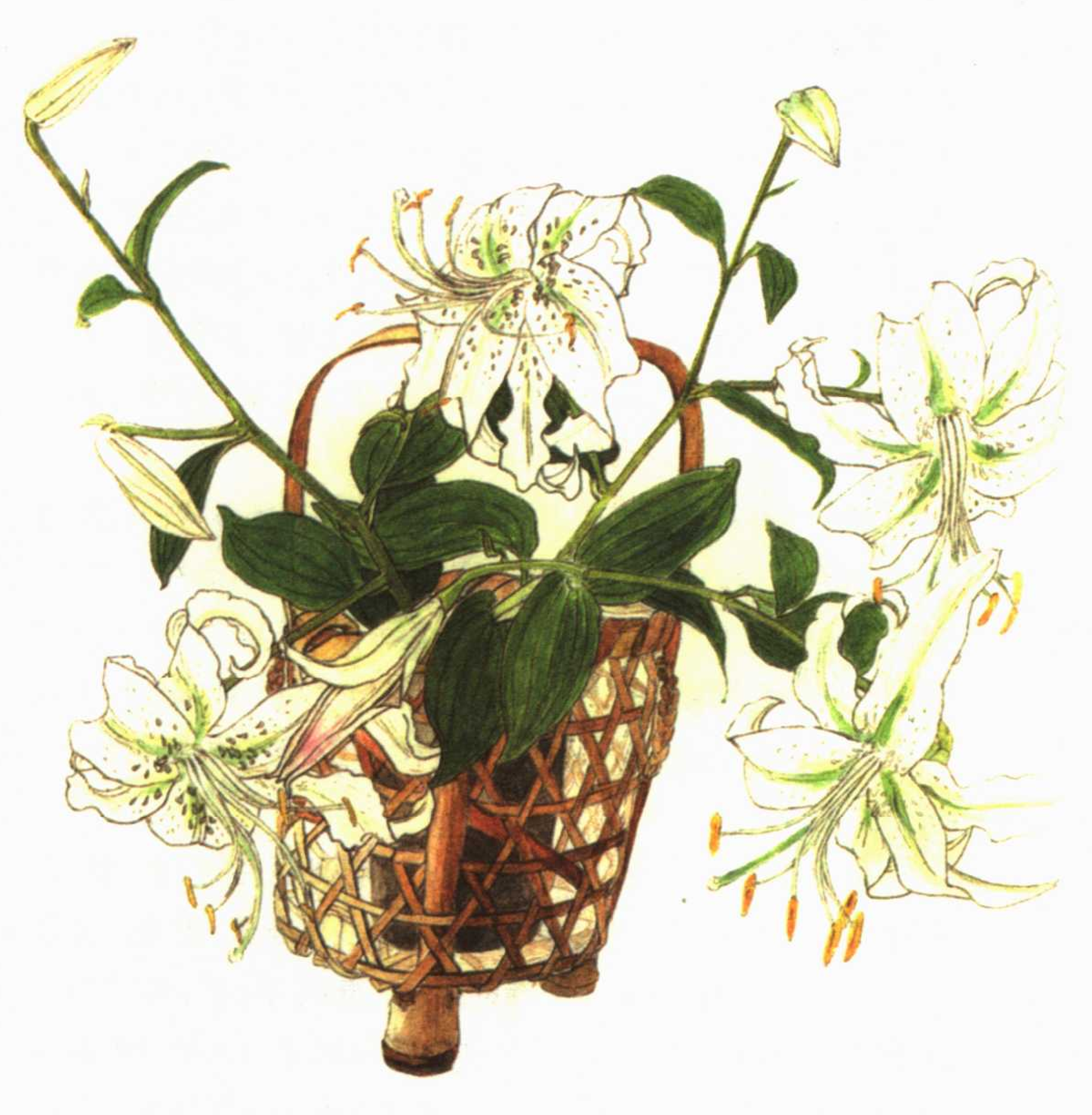


## 3

重藤博士曾几度对我说起一位年轻的眼科医生，心里一直非常难过痛心。那时正是盛夏，红十字医院里挤满原子弹轰炸的受伤者。不断有人死去，院子里火化尸体的烈焰终日熊熊燃烧。这时，一位年轻的医生对重藤博士诉苦，说自己根本没有力量拯救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人类历史造成如此的悲惨愚昧，人类怎么还能精神正常地继续生存下去呢？对于这么多的受伤者、许许多多濒临死亡的人，我们束手无策，却还要努力救治他们，这不是徒劳无益吗？

重藤博士对这个牢骚不停的年轻医生说：既然我们面对这么多痛苦不堪的受伤者，只能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然而，就在他离开门诊室的一小会儿时间里，那位年轻的医生吊死在走廊被炸毁而裸露出来的钉子上。重藤博士指着如无数的荆棘扎穿坚固墙壁的窗玻璃——那一堵楼梯的墙壁至今依然保留——话语里充满苦涩。

夫人告诉我，重藤博士还对那位年轻的医生说，虽然现在整个广岛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是只要翻过一座山头，那边照样是碧绿的原野、美丽的树林，你去那儿休息几天，安定一下情绪。我在夫人的陪同下前去参拜重藤博士的坟墓，树木繁茂，新绿滴翠。当他对绝望的年轻医生说翻过一座山头就有碧绿的山野的时候，他的心里大概浮现出自己在原子弹轰炸的第二天早晨返回广岛时看见的，这祖祖辈辈生活的绿色土地以及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妻子和幼子吧……



我在广岛会见的许多人如今都已去世。甚至可以说，健康生活的老年人实在是特殊的例外。我在原子病医院见过的那些住院患者，恐怕没有一个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吧？重藤博士对我说过：有的外国人来医院慰问原子病患者，当他们再次来访时，一定都要求和前一次见过的患者见面，但这样的幸运者至今一个也没有……

但是，广岛、长崎的这些已经步入老年的原子弹受害者现在仍然顽强地坚持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的运动。这个运动一方面要求国家基于补偿精神对原子弹受害者给予经济救援，同时要求政府与美国一道承担原子弹轰炸的责任，发起废除核武器的活动。这些至今还饱受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灾难痛苦折磨的幸存者替死者发出的呐喊，他们开展的正确而极具人性的运动，不是博得许许多多人的支持和共鸣吗？

许多人已经死去，即使活着，也正步入老年。然而，我站在重藤博士故乡的土地上，望着满眼年年更新的绿色山野，回忆那些在我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死者，同时也感觉到，在这个世界的深处，死者们的生命也在不断地更新、再生，激励着人们一直记住他们。





# 同情



## 1

坦率地把这些写出来，需要勇气——一种近似悲哀的勇气。家里人，尤其是我，有时候实在按捺不住对残疾儿子的火气，而且现在还是如此。

于是我想到医生、护士对病人的气恼以及他们的忍耐，想到康复中心的理疗医生、心理医生对患者的气恼以及他们的忍耐。我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我也很快就要进入老年，知道自己的脾气十分任性，到时候给家人和护士带来麻烦，结果

惹得他们对自己生气。

光在五六岁的时候，他的身高体重超过同龄孩子的平均值，但智力还不及三岁幼童。带他出去，往往会莫名其妙地突然停下来，有时一股劲往自己想去的地方走。我拉着他的手，肩膀到腰部常常感觉到他的很大的力气。

有一天，我带他去涩谷的百货商场。因为在家里和妻子闹了点小矛盾，情绪不大愉快，便带着光出去。百货商场的六层还是七层，有一条连接新馆和旧馆的通道。我正想穿过旧馆的体育用品部时，光又突然改变方向——他进百货商场以后已经好几次这样了。我简直想发作，但还是强忍着，告诉他一直往前走。但是光置若罔闻，依然朝自己的方向走去。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突然从心底冒出一种不可思议的不负责任的冲动。这个冲动无疑是出于对倔强固执的儿子的气恼。我一下子松开牵着光的手，自己到新馆买完东西，又在新书专柜前呆了一会儿，才回到刚才的地方。自然儿子已经不知去向。

这个时候，我非常惊惶失措，赶紧到百货商场的广播站，要求广播寻找迷失的孩子。广播员虽然开始广播，但是光意识不到自己就是走失的孩子。我听着广播，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到处乱找，不仅在新馆旧馆的同一层，而且还在上面和下面一层着急地四处寻找。大约找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找着，只好给家里打电话，也顾不得妻子担惊受怕了。

我跑得筋疲力尽，站在新馆楼梯平台上歇脚，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一会儿，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我看见一个个子很矮、

像狗一样的东西正在旧馆的楼梯上慢慢地、却是拼命地爬动。我急忙跑到连接新馆旧馆通道的那一层，从对面的楼梯下去，只见光严严实实地戴着红色毛线帽，身穿棉布连身服，正两手撑在地面上，顺着楼梯爬上来。光运动得满脸通红，肥胖的脸颊油光闪亮，只是瞧我一眼，并没有流露出什么特别的情绪。但是，在回家的电车里，他一直紧紧抓住我的手……

那一天，要是没有找到光，也许他会从楼梯平台上掉下去，也许他趴在滚梯上，双手被夹住……我好几次想到这里，都觉得后怕。要是那样的话，我出于一时气恼，导致残疾儿子的死亡，作为父亲，恐怕一辈子都无法从犯罪意识中解脱出来吧。更不用说我的家庭大概也会因此而破碎。

最近，不时看到报纸报道说，有的年轻母亲把夜里哭闹的婴儿摔死。每当此时，我总是站在毫无育儿经验的母亲的立场上，体验那种令人恐怖惧怕的感情。人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感情无疑是一种本能，但是对夜间哭闹的孩子的一时心头怒火，不也是与本能差不多的感情吗？

看到妻子对残疾的儿子那种无私的奉献，尽管已经这么多年，我还是经常感受到新的心灵震撼。但是，我发现，妻子有时候显然也为光的事情生气。这个时候，家庭成员就自然而然地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或者光的弟弟妹妹往往为光辩护。不过仔细观察一下，态度有所差别，我和次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支持光，女儿首先分清是非曲直，替母亲劝说光，让其承认错误，但还是明确显示出站在光的一边的态度。



2

不言而喻，最近我和光之间的心理对立，与以前他天真幼稚的态度让我棘手麻烦的情况不同。

光往来于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每天都要接送。最近光的弟弟妹妹经常代替我去接送，我极少主动去。但有时候接送还是没有安排好，也造成我与他的心理对立。我这么说，虽然自己也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有时候我正在抓紧时间读书或者写作，却不得不去接孩子。我家没有车，虽然妻子有驾照——当时她考虑周到——那也是年轻时候考取的。现在即使为接送儿子买一辆车，为确保驾驶技术，恐怕还得去驾校练习一通吧。但是，坐公共汽车再换乘电车去职业培训福利院，来回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有好几次心里着急，想尽快回去继续自己的工作……

从职业培训福利院到电车站，必须过两次人行横道。其中一次要横穿甲州街道，这条路大卡车等车流量很大，我觉得等红绿灯的时间格外长。如果在绿灯快变成红灯之前赶过去，一旦变成红灯，光就害怕，畏缩不前，万一在马路当中发病，那就太可怕了。所以每次他一个人去职业培训福利院，我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他过马路很危险，一定要小心。其实他非常遵守交通信号，保持着甚至可以说是比神经质更固执的态度。

有一天，我带着儿子急匆匆来到人行横道边上，一看是绿灯，而且行人已走到马路一半左右，便赶紧夹着儿子的胳膊小跑过去。跑到一半时信号灯开始闪动。过马路以后，我带着稍

微运动后的愉快心情，对儿子说：啊，终于过来了！虽然你在职业培训福利院工作很累，可是今天走得很快啊。儿子没有回答，挣开我的手臂，双手抱在胸前，转过身，叉开双腿站着，瞪着信号灯。回家这一路上，一直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跟在后面。

于是我也一肚子气，说起来实在可笑，在公共汽车里我也不和他说话。一回到家里，我就在起居室里继续工作，光躺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听FM，我不理他。儿子认为父亲不耐心地等下一次绿灯，就迫不及待地过马路，自己本来就走不快，而且走到一半变成红灯，让自己心里害怕，所以对父亲生气是理所当然的，自己没必要向父亲妥协。不过，他心里似乎还是在意表情忧郁、默不作声的父亲。

接着，他开始实行高超的和解方法。电话一响，他以平时未有的敏捷立即抓起话筒，妻子过来要接电话，他挥手不让，以格外明确的声音告诉我对方的名字，把电话拿到我旁边。然后，他又给我拿起晚报。电视里一出现我的朋友的镜头，他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看我是否注意到电视画面。但是，他对自己在穿过人行横道以后所表现的反抗态度，理所当然地没有认错的意思。

他这么一来，我倒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但为了维护父亲的面子，便开始寻找至少能与儿子平等和解的机会。这时，突然发现妻子和女儿正瞧着我们俩，一脸忍着笑的奇怪模样……



3

坦率具体地描述残疾人或病人与护理人或家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并赋予普遍意义的文学家中，正冈子规就是一个。我生长在爱媛县，从小就知道这位明治时期的短歌、俳句改革家的大名，很早就看他的著作。子规长年卧病在床，妹妹照顾他。他却对妹妹的护理十分不满，疾言厉色，大动其火，从如何看护病人到女性修养教育，大发议论，使我颇感兴趣。

子规躺在病床上完成他一生最伟大的事业，为了让他心情愉快，子规的邻居、也是他的生活资助者陆羯南曾让自己年幼的女儿穿着艳丽的衣裳前去探视，也不顾子规的肺结核病是否会传染给女儿。有关子规与陆羯南的关系，子规与始终尽心尽力照顾他的母亲、妹妹的关系，以及子规的疾病观等问题，现在还有许多值得重新研究。我经常想起子规在最后的日记《仰卧漫录》中批评妹妹律的那段话。

律乃不通情理之女人，乃无情无义如铁石心肠之女人。看护病人虽尽义务，却无同情慰藉病人之心。虽遵从病人之吩咐，却不知言语委婉……虽时常晓谕其同情之说，然无同情之心者焉知同情，徒劳无益。纵心中不快，亦无可奈何，别无他策。

我理解子规所说的“同情”，就是以发自内心的情绪积极地推测对方内心的一种力量。这样，子规的“同情”就与像我这样在文学领域工作的人最注重的词汇“想像力”相近。如

果把“想像力”这个词再对照一下护理人的精神世界，我就会想起卢梭在《爱弥尔》中关于教育的那句话：“仅仅一个人的想像力就使我们感受到别人的痛苦。”

子规在日记里记述的那些话，与其说是对妹妹护理的不满，不如说是自己对护理病人的根本方式的见解。在那些话语里，包含着子规对妹妹婚姻不幸的同情，也包含着对她倔强性格的些许担心。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妹妹的确竭尽全力、无微不至地照顾病中的子规。

子规在写这则日记的前后，还写过一篇随笔，谈论日本女性怎么才能以积极自发的心态去照顾病人。换成卢梭的话，就是日本女性怎么才能对痛苦的别人具有想像力。这篇随笔具有简洁明快的逻辑性，而且语调爽朗轻快。子规思考的结果，得出日本也需要对女子进行教育的结论。

从整个过程来看，患病的子规起先大动肝火，对什么都看不顺眼，气恼发怒，但过后觉得不好意思。大概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对妹妹的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对，于是写了这篇随笔，虽然是刊登在报纸上，但谅必妹妹不会马上看到，文中暗示自己向妹妹伸出和解之手。

其实子规发火的直接原因很简单：“例如病人连喊‘想吃糯米团子’，她却充耳不闻，毫无反应。若有同情之心，病人想吃之物，应即刻买来，然律从未如此。故若想吃糯米团子，只得直接命其‘买糯米团子来！’对于直接命令，她绝不敢违背。”

正冈律长期照顾卧病的哥哥，与母亲一道为哥哥送终后，果真进入女子教育学校学习，似乎没有成家，但成为教师，确

立了自立的人生道路。时隔一段以后，也许她是最深刻地阅读子规日记、随笔的一个人。妹妹为了对死去的哥哥的回忆而实现和解，该是多么美好啊。

我认为，积极的同情、想像力的发挥对于弱智儿，对于照顾他的家人、医生、护士以及康复中心的护理人员，更具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在告诉别人希望为自己做什么之前，本人并不知道需要做什么。

就我的长子而言，尤其小时候，根本没到自己提出“想吃糯米团子”这种要求的程度。然而，在妻子的精心护理下，对孩子的内心积极同情，开发他的想像力，终于发现他需要的只是音乐。我对妻子的护理特性表示感谢和敬意。

子规的心头压抑着病人巨大沉重的抑郁苦闷，他一方面通过日记把这种积郁爆发出来，但同时又写生花草慰藉心灵。子规的母亲和妹妹带着什么心情观看他的写生画册的呢？我的妻子一边照顾养育光，一边长期不停地写生山野花草——自然远不及子规。尽管病人、家人与患者、护理者的关系交织在一起，但当我翻阅妻子的写生画册时，总会勾起种种思绪。



# 接受



## 1

“恢复”这个词我早就知道。我在大学法国文学科读书时，开始意识这个词。那个时候，只要不睡觉，就经常要读法语。从小说里看到 réhabilitation 这个词汇，指的是入狱者出狱后经过社会再训练恢复名誉、恢复权利。不记得是从哪本书里了解到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巴尔扎克的书，对于二十一二岁的学生恐怕太难，也许是从我也经常看的西姆农或者通俗的侦探小说中知道的。

如果把“入狱者出狱后”换成“住院者出院后”，那么“经过身体的、社会的训练恢复权利”就接近于今天的“恢复”。但是，无论是法日辞典还是英日辞典，都只有上述的那种解释，作为医学用语的解释极其罕见，对这种“落伍”感到吃惊的人应该很多吧？及时吸收新语义本应是日本辞书的特色——日语的词汇用日语查找，外来语词汇以片假名表示，用日语查找——以英语辞书而言，越是像老牌的COD（《牛津简明辞典》）这样的代表性词典，动作越是缓慢。

“恢复”这个词被定义为一般通用的医学用语内容，还为时不长。美国等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就开始“康复（恢复）医学”，所以“恢复”这个词当时就已经具有医学含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

直至一九八七年，我才第一次真正理解“恢复”的医学含义。因为东京大学医学系康复部的上田敏教授给我来信说，明年将在东京召开康复医学世界会议，请我到会发言。

信中还附有会议预定内容的小册子，我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从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共同治疗疾病好像是这门新兴医学的基本原则——而且已经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可是自己又能做什么呢？于是我回信说自己发言不合适，推荐我在文化杂志《海尔梅斯》担任编辑时的同事、近二十年来一直尊敬的哲学家中村雄二先生代替我发表讲话。中村先生站在当代世界哲学新潮流的最前列，思考精神与身体的问题。

但是，上田敏先生回信恳切要求我重新考虑——记得也是当时——并寄来他的著作《思考康复——关于残疾人恢复正常人生活》。这本书把我带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上田敏先生以

明确的分阶段形式把残疾人的心路历程进行系统化分析尤其吸引我。残疾人在经历心理的痛苦过程以后，如何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现实，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呢？康复医学的目的是对残疾的接受，我觉得这个过程与文学——甚至文化论的——思维相通，而且似乎发现一种现实先导的东西。看完这本书，尽管我对自己是否胜任没有把握，但还是同意在世界大会上发言。

我是一名作家，为什么愿意在世界各国的康复医学专家云集的会议上发言呢？发言草稿中对我自身进行坦率叙述的这段文字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二十五年前，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脑部发育不正常。这是一起事故。现在，我作为作家，不得不承认，我的最本质性的主题是考虑如何一辈子与残疾儿在一个家庭里共同生活。

自己对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思考，并对超现实的东西的思考，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通过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发现并得以确认的思考。

接着，我讲述自己在与还不会说话的儿子共同生活中，如何最确切地领会弱智儿的心理，讲述孩子通过他所喜欢的野鸟的叫声开始与我的心灵交流，并且把这个过程写成小说……

我在小说中如何表现这个残疾的儿子呢？在创作实践的过

程中，如何理解残疾儿与家庭的共同生活成为文学的双重课题。就是说，残疾儿出生这个事故因此成为我这个作家的主题。

我要创作残疾儿为主题的小说。我要以一种语言从总体上综合性地、而且不失具体个性为创作模式。这个模式不仅包含残疾儿，而且包含家庭及其周围的社会、世界。我一直这样创作小说，在以小说这种语言形成模式的过程中，我发现存在一种形式。

然后，我谈到上田敏先生把残疾人的发展模式化为：残疾发生后，经历各种过程，最后接受残疾。我发现他的这个模式与自己小说模式形成的形式相一致。上田敏先生把这个过程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一个人因事故而残疾，第一阶段是“冲击期”，出现冷漠和孤独症状态。第二阶段是“否认期”，基于心理性的防卫本能反应，否认疾病和残疾。当残疾的不可完全痊愈性无法否认时，则进入第三阶段“混乱期”，情绪激动，发怒怨恨，而且悲叹抑郁。第四阶段是“努力解决期”，残疾人意识到自我责任，从依赖中摆脱出来，努力进行价值观的转变。第五阶段是“接受期”，残疾人把残疾理解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予以接受，在社会、家庭中进行发挥自己作用的活动。

那么：

当我以自己的残疾儿作为小说这种语言的模特儿时，也经历上述五个阶段。比起智力残疾的儿子所经历的整个过程，我们家庭更明显地同样经过从“冲击期”到“接受期”的道路。我们家庭和残疾儿如何在“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一起经受痛苦，又如何经过“努力解决期”最终进入“接受期”，在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我的小说也就完成。如何积极地接受残疾人及其家庭？具体答案出现之时，就是我的小说完成之日。

我以残疾儿的父亲和作家的双重体验这样说道：

当我通过小说这种语言模式思考的时候，再次感受到家庭和残疾儿在“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中经受痛苦、共同生活的重要。我想说，如果没有这个巨大痛苦的过程，也就没有确切的“接受期”。这就是人。



2

“接受”是acceptance的翻译，查阅COD（《牛津简明辞典》），解释为接受、高兴地同意，也有承认、信任、宽容的含义。在困境中超越痛苦，接受、承认、信任对方。从该词的形成历史过程来看，可以发现欧洲、美国的宗教背景。

去年“助残日”，我参加NHK综合频道的有关残疾人

主题的节目，时间很长，并让我担任评论的角色。按说我不过是一个残疾儿的父亲，没有进行专业性评论或者提出建议的本事。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这个机会，能直接听到真正的专家的见解，而且观看了——由于自己的怯懦和怠惰，也许平时不会仔细观看的——特殊的电视记录片，使我受到一次教育。

去年“助残日”观看的几部电视记录片质量优秀，感人至深。我采取对照 COD 明确定义“接受”的几种原意的方式，并且通过记录片里具体的富有人性的活动，体会到“接受”残疾的含义。

其中拍摄一位刚刚二十岁的残疾姑娘自己推转轮椅独自旅行的全过程的记录片非常好。她游览京都以后，回家乡去看望祖母。通过这次旅行，她得到新的体验，精神更加坚强，她的脸上虽然含带些许痛苦和徒劳的遗痕，但略显忧郁而刚强自信的表情是多么美丽。

她在记录片里说的那些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因为没有征求本人的同意，我不能在这里直接引用。她的话大意是这样的：残疾人也应该走到外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怕给别人增添麻烦，求助于健康者。即使是给对方增添麻烦，也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我的女儿因为从小就照顾残疾的哥哥，所以她在大学时一直参加自愿助残小组活动。坐在轮椅上生活的一位年长的女性经常打电话到家里来，让她帮助推着轮椅到外面——不是医院——散步。如果不是助残活动日，对方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又面临考试或者交作业，女儿就会拿着话筒，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



樱麻、菜採子在山庄



大江夫妇与光在北轻井泽

即使在这个时候，女儿也绝对不接受我的建议。如果发现我在小说里提到她通过助残活动所认识的朋友——残疾人，就会瞪着眼睛向我抗议，我不退让，她决不罢休。

这种时候，我认为虽说是小组活动，但既然接受了助残工作，就是社会行为，所以应该尊重对方的意愿。不过，女儿在电话里耐心地解释，表示实在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无法前去照顾，请对方谅解。我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看书，听着女儿以这种让对方理解的方式解决问题，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那位推转轮椅旅行的姑娘具有十分坚强的毅力，独自爬上京都寺院的斜坡，一直坚持到最后，不要求一直陪伴身边的摄像师和年轻女制片人的帮助。不过，她说即使给别人增添麻烦，也要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我希望自己的女儿通过自愿助残活动学习主动“接受”这种“麻烦”的态度，成为现在已经走上社会工作的她的一种精神……

记录片里有这样一个场面，姑娘在民家住宿时，向年轻的同住人讲述自己因车祸造成下半身瘫痪所经历的痛苦。她仿佛只是客观地叙述，语调那么开朗平静。从此她开始走上“接受”轮椅生活的道路。

姑娘决定出外旅行以后，说服了父母亲，还给预定住宿的饭店打电话预约订房。不是集体旅行，而是一个人旅行，而且还是轮椅旅行，听到这种情况，接电话的饭店有的一口拒绝，有的表示可以住宿，而且非常亲切详细地告诉她进房间的沿途通道情况。

我女儿所在的自愿助残小组一到计划安排残疾人旅行的季节，就每天不停地给沿途的便宜旅馆打电话，商量住宿事宜。

我在一旁听她打电话，感觉到我国目前如何对待残疾人的实际情况。从记录片中可以看到，对于那些缺乏温暖同情之心的饭店，那位残疾姑娘明确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实际情况，并且毫不气馁地顽强交涉——从事自愿助残活动的我女儿也是如此。我从她们身上感受到新一代人的坚强。

残疾姑娘回到家乡看望祖母，这是这次充满困难、令人感动的旅行的终点。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在朴素的老家大门口等待着，她流露出小时候显然受到祖母疼爱的幸福表情，却又担心自己这个样子会吓坏祖母，同时也给人独自努力推转轮椅来到这里的骄傲感觉……

这时，祖母几乎是敞着衣襟跌跌撞撞地急匆匆出来。祖孙相见无言的场面是何等感人啊。不论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姑娘，还是腿脚不利落的祖母，在自尊自豪、坚强自信的性格上，在富有修养的坦率神情中显然一脉相承。

接着，两人隔着被炉对坐，话语不多。祖母虽然还说不上是老年性痴呆，却也差不多，日常生活中，家里人把她当做小孩子一样照顾。她在情绪激动中，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伺候她的儿媳妇机灵应酬，妥善照应——我自己身边也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说话经常被人抢过去的老太太。

然后，姑娘拿出在京都寺院买的护身符送给祖母。祖母接过，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袱，取出来高兴地端详，给人一种完全“接受”老年造成的“残疾”，即衰老及其他一切的感觉。祖母和因事故造成残疾的年轻的孙女相对无言，流露出像哭一样的笑脸。她们各自超越失望和痛苦的“接受”，仿佛闪烁着微光互相映照……

如果祖母和孙女都身体健康，恐怕未必能够如此相互深刻理解。既然祖母不可避免地继续逐渐衰老下去，和她顶嘴的难道不正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孙女的自然生理造成的现象吗？然而，电视记录片里这两位互相“接受”残疾的老小女性，都能够宽容地互相理解，和蔼地相对而坐，笼罩着她们的微光高雅得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康复医学世界大会的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考虑到也许外国的与会者会认为我过于深入个人感情，便说了这样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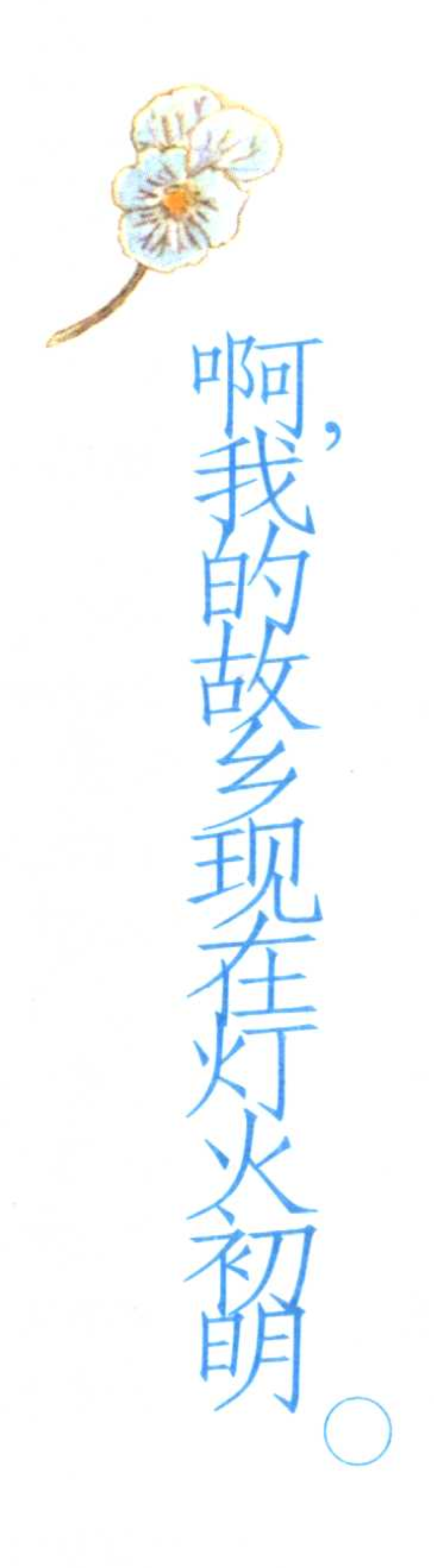
现在最令我自豪的是，我看到我的残疾儿子已经具有decent，即富有人性的宽容、幽默、信任的人格。而且我们家庭成员在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中都受到他的人格的影响。

通过我与儿子的关系，我也超越个人的范围，认识各种各样的残疾者及其家属以及为他们的康复进行努力的人们。残疾人也好，家属也好，从事康复工作的人们也好，都经受着各自的痛苦。即使是已经进入“接受期”的残疾人，仍然镌刻着痛苦的标记。残疾人的家属、康复治疗的人们也会有这样的标记。我认为，他们共同而明显的标记，就是他们都是decent的人。

**现在没有时间就此进行论证，但是我想在最能理解他们的人们面前说：超越了巨大的磨难，与痛苦的家人共同生活，支持着康复医学的这些人们的decent崭新形象里，具有今后连接日本与世界的最有希望的人的原型。**

我在这里直接使用英语decent这个词。这个单词的另一种翻译的可能性——它潜藏着丰富的含义，因此成为难以使用明确的界定语言翻译的单词之一——我认为，它非常适合在电视记录片里的那位坐着轮椅旅行的残疾姑娘经过艰苦努力见到祖母时两人相对而坐的那种气氛里说的话。我在上面写过，各自“接受”残疾的两个人，仿佛笼罩着微光，而这微光高雅得令人肃然起敬。我想这就是decent的内涵。

我和妻子也都老之将至——妻子肯定有她的思想准备——而我面对残疾的儿子以及支持他的妹妹、弟弟，在自己的言行成为真正的decent的人之前，果真能“接受”无疑是痛苦的老年这个现实吗？如今我正为此而感到心灵的畏怯。



# 啊，我的故乡现在灯火初明。



## 1

不久前，我发表了悼念井上靖先生的谈话。当时尤其使我心情激动的是听众中有几位医生。仔细想起来，我与不同职业领域的知识分子谈话，除了大学教师，最多的就是医生。例如为我的残疾儿子治疗的那些医生，还有我十几年来经常去检查身体的医院的医生们……

然而，我是作为患者、或者未来的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的身份与医生接触的。我离开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对方正在履

行自己的职责，所以我无法自由自在地谈话。虽然对方倒是经常询问自己：最近写什么啊？

极少有医生直接问我：你作为作家，如何思考人和文明？我倒想过，作家生病，而且是危及生命的大病，痊愈之后，往往有一部成为其后期代表作的作品问世。

井上靖先生患癌症，一旦治愈后，便完成一部《孔子》。这是解答我所思考的问题的一个充满启示的典型例子。我作为一名晚辈作家，在追悼井上靖先生的同时，重温《孔子》，并回答医生们的提问，这是我对有这次谈话机会最为高兴的地方。

井上先生时常对我谈起创作长篇小说《孔子》的规划。他的小说构思经常先以散文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吟咏孔子和一群寒儒在战乱的原野上流浪的散文诗很早就已发表。然而，正当他准备着手创作小说时，感觉身体不适，结果发现患有食道癌。

井上夫人等亲属大概都认为这长期悬而未果的《孔子》也就因此作罢，尤其夫人曾多次陪同井上先生到中国寻访孔子遗迹，似乎更觉遗憾。但是井上先生做过大手术以后，身体迅速恢复，着手创作《孔子》。

就在《孔子》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文艺杂志上以后，我与井上先生一起到巴黎、斯特拉斯堡、佛罗伦萨旅行。井上先生重访佛罗伦萨，尤为激动，回国以后，立刻精力充沛地埋头创作《孔子》。对此，他的家人异口同声表示惊讶。《孔子》大作完成，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井上先生不久辞世。

创作以孔子为主题的小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孔子的一生行径被其死后350年的《史记·孔子世家》所规范，后来的

所有关于孔子的故事都根据这个规范的记述。井上先生细读《史记》，这在《孔子》的细节中自然流露出来。

有一处说到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约合我国的七尺——人称“长人”，井上先生觉得很有意思。井上先生脑子里的孔子独特的人物形象——因为过于独特，虽然在诗歌中表现出来，但在小说里尚未形成具体化的形象——大概是从大个子孔子这个细节引发出来的吧。

另一处说到《孔子》中的讲述人蔫薑这个老人是殷人后裔。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死前7日，梦见自己亡故，受到祭祀，但是采用殷代的祭祀仪式，说明自己的祖先是殷人。

更重要的是，井上先生毅然撇开《史记》的记述。例如构成《孔子》重要主题的“葵丘会议”，以及故事发生的中心舞台负函这个地方，在《孔子世家》中均无记载。而且井上先生在好几处勇敢地对《论语》的传统解释提出异议。

例如《孔子》里的地方长官叶公是最能理解孔子的一个人物。但是连和辻哲郎都说“叶公被贬评之处也很明显”，按照《论语》的说法，“叶公是一个不尊敬贤者的狂妄自大的小人”。所以，如果按照和_所采取的解释，叶公对孔子说的话全都是冷嘲热讽和责备规劝。

## 2

如上所述，井上先生在《孔子》里把故事的中心舞台设在楚国为收容蔡国遗民而修建的新城负函。井上先生笔下的孔子在负函会见叶公时，说了一句显然是赞颂之辞："近者悦，远者来。"而且在负函听到本想投靠的楚昭王病故时，说出那句名言："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据《孔子世家》记载，这是孔子在陈国流浪时说的话。但由于包含着重要的思想，在书中引用两次。

以"索耳克氏疫苗"使全世界的孩子免除难以忍受的痛苦的索耳克博士异常激动地对他的法国哲学家朋友说：听说在中国，危机与机会相结合。我在这位哲学家的回忆录中看到这句话。

孔子带着他的弟子们历经苦难，长途跋涉，来到异国他乡负函。这种流浪无疑是"危机"的积累，终于到达有机会把自己的弟子推荐给国王的最近距离，但是由于楚昭王的去世，孔子决定回到故乡去。

时光流逝，书中的讲述人——当年跟随孔子流浪的年轻人，现在已是老人，重访负函。他讲述的这次旅行可以说构成小说《孔子》的顶峰。后半部的小说从这个部分才真正开始。井上先生势如破竹，故事发展起伏跌宕，显示着他天才的创作才华。值得注意的是，井上先生的语言艺术在仿佛同样的人物形象的反复叙述里制造着微妙的差异。

老人在负函看到村庄灯火初明的景象，不禁感慨万端："负函，这座神奇的城市，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心灵故乡，是孔

子精神的寄托之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一往情深。我独自伫立在黑暗的原野上，深情地凝视着灯火闪烁的负函，心潮澎湃。”

旅行结束回到住所以后，老人发出同样的感想：

**啊，我的故乡现在灯火初明。**

**但是，我立刻意识到，这儿不是我的故乡，我既不在这儿出生，也不在这儿成长。**

**不过，说故乡也可以。因为对于我来说，除了这里，没有一个能称为故乡的地方。**

旅行之后，老人和讲述孔子之会的人们继续谈论先师的为人及其思想。他所汇报的负函之行的中心思想是：“啊，我的故乡现在灯火初明。”这种宁静情绪的享受不能被这个地球上的人夺走。于是，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晚年的孔子对这前所未有的乱世是怎么想的？带着什么样的思想去世？他如何认识人的未来？

老人回答说：

**我想像孔子的心情 至今尚无瑞兆表明将有圣明天子降于斯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圣明天子身上的孔子，看到没有任何指望，于是“难矣哉”，“吾已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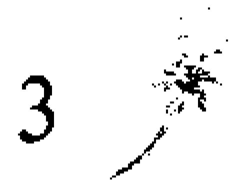
老人讲述葵丘会议决定不以黄河之水用于战争，回顾许许多多的国家相继灭亡。这时，大雨滂沱。小说《孔子》以老人

的这段话作为结尾：

**暴雨！惊雷！闪电！让“迅雷烈风”浇打脑袋、洗涤心灵。我们就这样坐着，凝心静气，肃然倾听这天地的声音，虚心坦怀地等待天地息怒，恢复平静。**

井上先生曾写过一首散文诗《迅雷烈风》。小说里的这个场面表现出诗歌的形象。井上先生的小说始于诗歌，以超群绝伦的叙述才华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在结束的时候，如梦幻般重新出现先前的形象，唤回诗歌，形成首尾鲜明的对照呼应。

井上靖先生既是诗人也是罕见的讲故事高手，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孔子》可以说是首尾一贯的杰作。

3 

在这里，可以就三件事进行对比：井上靖先生患有癌症，但手术后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孔子为了实现让自己的弟子走上仕途的愿望，不顾危险，漂泊异乡，在获知楚昭王去世的消息后，毅然决定回到家乡，完成他作为思想家的伟大事业；讲述人蔫薑老人重访负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故乡的含义，并且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年轻的孔子追随者，从而到达自己故事的顶点。

也许还可以加上井上先生在大病之后重访佛罗伦萨，激发创作构思，回国后精神百倍地投入《孔子》写作这件事。

异乡——面对死亡的拼死考验。

故乡——恢复、生产、新生命的再生。

从这种含义上的异乡——为癌症患者动手术的医院也是健康人的异乡——回到故乡，然后再生。这种形式的故事发展在上述的所有事例中都是共通的。而且如果离开井上先生和《孔子》的具体性，我认为更具有普遍性的形式。

我通过阅读各种古典文学以及与残疾儿的共同生活，逐渐发现这个道理。而大约十年前，我每天认真阅读但丁作品以及有关研究书籍的那些日子里，才把这作为一个命题真正明确地予以把握。

最近出版的但丁研究家约翰·弗雷切在其遗著中收有明确提出但丁具有皈依之心的论文。众所周知，《神曲》第一首诗写但丁上山受到三只野兽的阻挠。弗雷切认为，这表示但丁试图真正皈依宗教信仰的失败。通过下地狱经过炼狱再进入天堂的旅行，但丁重新进行皈依，终于获得真正的信仰，回到现世，创作《神曲》。

**皈依、死亡与自我再生是在真实的忏悔与虚伪的假忏悔之间细刻出道道明显的差异。在这部作品里，登山失败的旅行与事先描写的成功的旅行之间的差别是通过堕入卑贱、漫游地狱的旅行表现自己的死亡。奥古斯蒂努斯为了描写他在罗马期间的痛苦，简短地谈及同样的考验。**

奥古斯蒂努斯皈依之前病倒在旅途中的罗马，差一点丧命。经历过这一次“另一个世界”死亡危机的痛苦体验以后，他回到故乡，从在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的欢叫声中领悟到引导自己走向真正信仰的启示，于是一举皈依。

我从弗雷切的论点中受益匪浅。人在异乡濒临死亡，但是在医生、家人的鼓励下恢复健康。病愈之后，他不仅仅是回到生病之前的起点，而且朝着积极的方向上升，同时还获得继续不断上升的能量。于是，如果他是诗人，就创作诗歌；如果他是作家，就创作小说，表现新的收获。这些作品给人们送去生命的信息。

皈依对于无宗教信仰者自然无缘，但是，这种经历肉体与精神的疾病所造成的痛苦以及痊愈、康复以后的生产性活动对于无宗教信仰者来说，仍然也是植根于灵魂的作品创作。大概因为许多人感受到井上靖先生的《孔子》正是这样一部作品，所以才如此畅销吧。

我认为，井上靖先生不仅考虑一个人从生病到康复的过程，而且思考一个国家从生病到康复、再生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古代中国的思考，而且长期为日中友好而尽力。井上靖先生具有可以说是“勇敢的”构思力，他在战胜疾病后努力创作新作，这种以自己作为原型的表现，恐怕也是对一直尊敬的邻国的现在与未来的系念吧？



# 个性〇



## 1

前些日子，在我的故乡的村子（行政合并后成为町的一部分）里，和年轻人一起举办了第二次音乐会。实际情况是，我故乡的一些人为了保护这森林覆盖的山谷村庄的自然环境，决心一辈子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其中有的可以在东京做准备，这是为配合他们的活动举行的演出。

今年是请我的朋友、钢琴家外山准及其伙伴一起到我的故乡去。他们都是在我国古典音乐演奏或音乐教育领域勤奋工作

的、具有实力的演奏家。虽然是樱花初绽时节，但出发那一天大雨滂沱，飞机无法在四国机场降落，结果落在大阪。因为主力演奏家都乘坐这次班机，村里的年轻人还为他们担心。

会场挤得满满的，还有邻村的人，等待着演奏家们乘坐新干线跨越濑户大桥进入森林里来。于是，我在会上的讲话就稍微拉长一点，先期到达的外山一直独奏钢琴。等到大队人马到达会合后，演奏了钢琴三重奏、长笛独奏等节目。演出结束时，从开场算起，已经整整六个小时，但是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坚持到最后。

千里迢迢赶来的演奏家们为了抓紧时间，连演出服装都没换就上台表演。一到台上演奏，这些演奏家的表情姿势就与平时大不一样，钢琴手自不待言，小提琴、大提琴、长笛的表演者也都显示着乐器行家的派头。我不由得深切感受到：原来人们就是这样创造音乐，人们就是这样通过音乐而生存。这是完全可以让在场的500多观众——远远超过我的村子的规模——共同分享的感情。我的这种感受被后来观众寄来的非常多表达感想的明信片所证实。

作为我个人尤其高兴的是，这次音乐会演奏了不少我的长子光创作的作品。有钢琴独奏、长笛独奏，还有根据他的钢琴曲改编的四重奏曲。对于坐在我身边的光来说，将成为辉煌的记忆铭刻在人生中。最近这一段时间，大概年龄增长的缘故吧，我每次去职业培训福利院接他回家，总感觉他的表情显得忧郁沉闷。现在，他多么激动、兴奋、愉快，恰好HNK地方节目播放作曲者光接受献花的简短镜头，他的表情充满幸福。





中国古代乐器



音乐演奏

## 2

今年还出版了光的《作品集Ⅱ长笛·钢琴》。我写了一篇这样的后记《作曲的习惯》:

光去职业培训福利院工作，来回乘坐公共汽车或电车，有时和接送的家人一起去商店购物。他也曾和妹妹一起去过快餐食品店，也曾自己努力解答电视智力测验节目中的问题，而大部分时间则是听FM、CD或者收藏的古典音乐唱片。

但是，他生活的中心是作曲以及上田村久美子先生教的音乐课。可以说，作曲是光整个生活的顶峰，而听音乐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看着他的生活状况，我想起长期在美国的大学任教的法国哲学家杰克·马利坦对“习惯”这个词的定义。马利坦原本说的是“艺术的习惯”的形式，但我想从更大的范围理解其含义谅也无妨。

人花费很长的时间，通过经验，创造出职业的根本性东西。其中包含本人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所有东西。科学家具有通过其研究与人格难以分开的东西，工匠也具有通过其而工作的东西。马利坦把这种“东西”称为人的生存所需要的“习惯”。

我认为，对于光来说，作曲才是他生存所需要的习惯。我的这种对弱智的儿子——他一直只有小孩子的智力——的说法听起来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他的作曲行为及其作品表

现出自己的人格。

如果光不会作曲，我和家人恐怕对他藏于内心最深处的盒子里的纤细感情毫无所知。给予他表现情感的手段——和弦、旋律的作法——鼓励他表现，把他表现的东西用钢琴或者长笛等乐器变成耳朵能听得见的声音，以这种形式与他人联系在一起。我向通过这个过程，把光内心——我甚至想说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呼唤到我们共同的世界里的音乐家们深表感谢。就是说，我受到他们的生存习惯所给予的恩惠。

我在这里说到“习惯”。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利用杰克·马利坦的“习惯”这个用语，加上自己的人生与艺术的习惯，重新赋予深刻的含义。她认真阅读马利坦的著作，还和当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马利坦通信。她写小说谋生，不管是否有意识，逐渐产生小说家的习惯。例如以自己都弄不太懂的手法创作成功一部作品——并非世俗意义上的作品，而是艺术作品——她就说这得益于习惯的体验。

考虑到从事医学的人也可能阅读本文，所以特别想说一句：弗兰纳里·奥康纳和她的父亲一样，也备受狼疮的痛苦折磨。从她二十出头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开始发病，不到四十岁就辞别人世。她一方面寄希望于新发明的特效药，同时以乐观的态度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她的精神成长史不仅体现在优秀的短篇小说里，也可以从其书简集《生存的习惯》(The Habit of Being) ——其中收有她在病榻上写的最后一封充满关爱和勇气的信——中得到验证。弗兰纳里和三岛由纪夫生于同年，我时常思考他们的生

死观。

上面所说的最后一封信是弗兰纳里写给她年轻时相识、后来成为终生朋友的剧作家梅阿里阿特·李的。信的字迹潦草，几乎无法辨认，弗兰纳里死后在她的床头柜里被发现，由她的母亲寄出。信的内容是对当时正为匿名电话困扰的李提出诚恳的切实的建议。自己在临死之前还为朋友操心，这就是弗兰纳里。

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卑鄙者和那些本性暴露无遗的家伙同样恶劣或许是更坏的人。对匿名电话不能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虽然心有所惧，但必须保持警惕，继续做您的事吧。如有必要，可报警。也许这才是对那个家伙的开导。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我的短篇小说寄给您。心情一直极坏，无法打字。

编辑书信集的也是弗兰纳里的终生朋友萨利·菲茨杰拉德。他认为弗兰纳里除了小说家的艺术习惯外，还具有第二个良好的习惯，就是“生存习惯”。他说：弗兰纳里“不仅行为，而且内心气质和优秀的活力都逐渐在看得见的事物、生存的活物上反映出来，并赋予特性，而其本身反映在她的言行上。”她的这种“生存习惯”在信中也表现出来。上面那封信不就是一个样本吗？

## 3

我还一直考虑能不能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上述含义的“习惯”。现在想出来的是“个性”这个词。如果通过具体人物分析的话，也许更容易理解。

森安信雄博士为光做手术，而且后来一直关照他。我写过一篇文章《慎直的幽默》谈论我对他的感受，这不仅仅是不多的随意聊天的机会里得到的感受，他表情严肃忧虑地对我说明光的手术以及愈后情况时，当时我没有感到幽默，但后来回想起来，他无疑还是一个“慎直的幽默”的人。

他的一个女儿正在学医，好像对研究皮肤病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这件事时，目光少有地温和。他极少托我办事，有一次他请我给日本大学医学系的学生讲话，我想听众里有他的女儿。他在讲话中说皮肤科是医学研究的尖端领域，洋溢着年轻的研究员般朝气蓬勃的表情。那个时期，我正在阅读有关免疫学研究最新成果的科普读物，觉得森安先生的话很有道理。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他表现出具有“慎直的幽默”的学者神情。

现在回想起来，各种场合的“慎直的幽默”正是体现出森安先生的个性。正如上面所说，森安先生的“个性”大概也是深深植根于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环境，当然也继承了父母亲的性格以及家庭的氛围。应该说并非有意识地，而是长期无意识中耳濡目染的影响，形成他后来的品德。

后来，他选择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践中治疗疾病，救死扶伤，解除许许多多的患者的痛苦，同时教育学生，传之后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有意识地造就自我。另外，

他在医学国际会议上发挥的作用也是一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森安先生的个性应该无比博大。

从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这个角度来说，自然首先相信森安先生作为脑外科医生的渊博学识和精湛技术，但通过与先生的频繁接触，发现他的个性更是激励患者的力量。森安先生的高超医术自然不会变化，但如果先生突然变成一个个性缺陷的医生，那么患者及其家属将会多么困惑啊……

这样具体地来看，弗兰纳里·奥康纳在杰克·马利坦的基础上提出的“艺术习惯”以及“生存习惯”的“习惯”可以与一个人的个性明确地结合在一起。显然，一个人的个性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其经历、家庭、学校的环境等一切条件的影响，长期积累的结果。

当他从事一项充满困难的新的工作的时候，个性将成为从根本上支持、引导他的力量。然而，人们自然要问：虽然本人的确会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但能否积极主动地调动这种个性为自己开创新局面呢？

如果再回到艺术习惯，自然就会得出明确的答案。当我们面对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的关键时刻，千方百计，努力奋斗，经历无数次的失败，而一旦获得成功，作品完成，就会发现自己表现出一个从未达到的新世界。这是我们平时积累的艺术习惯的结晶。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觉得如果弗兰纳里·奥康纳处在这个时候，我可以与她同声相应：是的，您说得完全正确！

这样的话，生存习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困难时刻不也造成同样的效果吗？个性肯定使他的将来大有发展成为可能。

于是，我尊重自己、家人的个性，大家互相尊重，并逐渐深化、磨炼，以此作为教育的手段。说“那就是他的个性”，的确有时含有贬斥或轻蔑之意。但这不是反而潜藏着促使对方重新评价、重新理解的积极因素吗？的确，人很难重塑自我，但我经常从许多优秀人物身上发现如同残留的伤痕一样的过去的个性，倒让我尊敬之情油然而生。



# 没法子，干吧。



1

这件事发生在光上残疾人学校中年级的时候，却如同遥远的记忆。有一年夏天，我们在北轻井泽的山间小屋里避暑，我每天带着光出去散步。这一天来到附近的照月湖畔。野上弥生子女士在回忆录里谈到这个人工湖。她说：北轻井泽的别墅区是战前法政大学的教职人员开辟出来的。大家成立“水道合作社”，当参加的人数超过一定范围时，就显示出巨大的力量。

野上女士还写道：在一年夏季即将结束时，住在当地的别

墅区管理人对我说，打算修一个湖。听起来像是说梦话，也就不放在心上，但第二年果然把草原的小河流堵截起来，形成一个人工湖。野上女士的笔端流淌着愉快而惊讶的神情。

我对照月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栖息湖边的一对秧鸡诱导出光和家人的第一次会话。光听了几年NHK播音员录制的鸟叫声和鸟的名字的唱片，却从来没有对我和妻子说过一句话。来到北轻井泽的当天傍晚，妻子正在打扫别墅房间时，我让光骑在我的脖子上，站在岳桦林里，耳边婉转着清脆爽朗的鸟鸣。这时，光突然张口说道："这是——秧鸡。"

同样是这个照月湖，同样是与儿子有关，留在我心中的记忆，时时想起，仿佛促使我赋予某种意义。这就是我在开头说的发生在那个夏天的一件事。

那一天，我带着光坐上小船，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绕湖一周，回到渡口，正打算登上木板搭成的栈桥时，发生一点麻烦。光从小船上站起来，船一摇晃，他害怕地半蹲下身子，一动不动。我也在船上，鼓励他勇敢地迈上去。但是，他只是把脚往前稍稍蹭了一下，根本不敢登上栈桥。两个在这里打工的小伙子在渡口上用手拉住小船船舷。这时，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满脸不高兴地突然站起来，转身朝租船的小屋子走去。小船立刻使劲摇晃起来，我猛然跳上栈桥，和小个子的年轻人一起，好不容易把光弄到跳板上。

那个时候，我对那个把胆战心惊地半蹲在船上的孩子扔下不管，扬长而去的年轻人并没有生气。否则，我肯定会追上去说他几句。当时我对这个年轻人极端不负责任的举动只是感到茫然。那年夏天，我在北轻井泽车站附近的自行车租赁店前

又遇见这个小伙子。他一副电视里演艺界人员的打扮，大概是休息时间吧，正和几个姑娘聊天。我实在不理解，有着这一副大人一样高大健壮身材的小伙子，在从事那种需要责任心的工作的时候，怎么居然在关键时刻撒手不管呢？每次想到此事，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满脑子觉得不可思议。我甚至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后这类青年——说起来，当年在照月湖渡口的那个小伙子，如今已是中年人了——在我国不仅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增加吧？

因为在电车里、体育俱乐部的更衣室里，或者在与我发表演讲的大学会堂不同的角落里，我都遇见当年照月湖渡口那样的年轻人。

每次我也都如第一次的茫然感觉那样，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无法理解。尽管我不能肯定，自己在经历那年夏天北轻井泽发生的那件事之前，从没有遇见过此类年轻人——甚至小孩子……



2

这大概是十年甚至更早以前的事了，因为将要提及的朋友在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年轻时候的印象。与我一起从事讲座编辑的一位评论家对我谈过这样一件事。编辑部策划给全国著名以及许多尚不知名诗人出版的诗集举办评奖活动，于是需要几位名人审阅评选，但由于报酬的问题，未能找到合适人选——说

这话儿的时候，应该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当时，谷川说："大冈，没法子，干吧！"于是他们就干起来了。

谷川俊太郎先生就这样拉着大冈信先生——在诗歌领域，他们不仅是日本国内，也是世界级的重镇，却还有这样的自由时间——审阅数量庞大的诗集，默默无闻地持续了好几年。现在，谷川先生那独特的、平稳中含有坚强意志的清晰语调在我的耳边响起，他说的这句话一直铭刻在心：没法子，干吧！

我经常接送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也遇到一些其他残疾儿的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他们都给我具有经过苦难磨炼的个性的印象。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他们中有几个人不再见到，一打听才知道有的患癌卧床，有的把孩子送进全日制住宿设施里，有的只是单纯原因而无法继续接送。我虽然和他们没怎么交谈过，但每个人具有个性的形象连同他们的孩子的印象，一起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简单地说，我觉得，他们——包括现在仍然见面的父母亲——在各自的人生中，都曾经历过自我鼓励——没法子，干吧！——的决定性瞬间，而且至今一直坚持当时的这个决心。

一看见这些残疾儿童的母亲，就认为她们都在忍受着艰难辛苦的生活，其实这不过是我内心感伤的、而且未必合乎实际情况的观察。其实，残疾儿童也给父母亲带来欢乐。例如职业培训福利院组织孩子出去郊游，傍晚的时候，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主要是母亲或奶奶——都来到指定地点等待车子回来。我有意无意地听着她们的谈话，再一看车子回来时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和家人见面的热烈场面，还有我们家的实际情况，我更坚信自己的上述想法。

我和妻子在决心养育光这件事上，也曾多次各自在心里激励自己——没法子，干吧！——应该说，这句话坦率地反映出我和妻子的实际心态。

何况我还这么想，残疾儿童对自己正在经受的痛苦以及克服的困难不会夸大其辞地表现出来，总体上说，他们都是具有坚韧意志的强者，但是正因为他们身患残疾，大概也都这样激励过自己——没法子，干吧！

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曾经打国际电话责备儿子。因为儿子在家里不听话，妻子让我说他几句。大约十天以后，我收到儿子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已经不行了，还要再活二十年，我做不到。"如果他真的对自己这样绝望，有一天早晨从床上叫不起他来，那可怎么办？

其实，他能够每天坚持去职业培训福利院工作，和同伴们和睦相处，从中午盒饭的饭菜变化里感受到一点小乐趣，回家后听唱片，努力学习钢琴和练习作曲，其根本就在于"没法子，干吧！"应该说，我们做父母的以及家人都受到他的激励。



## 3

我追溯光的成长历程创作一批短篇小说，结集为《新人哟，醒来吧》出版。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与我在一个时期集中阅读维利阿姆·布莱克的书籍有关。这部小说集的题目就是取自布莱克的预言诗——布莱克对其赋予特殊的含义——鸿篇巨

制的一篇序文。

众所周知，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动荡时期，布莱克以具有神秘主义美感的版画和诗歌开创出独特的艺术世界。他的人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的思想紧跟美国独立、法国革命的当代史，通过基督教的形象重新理解美国独立宣言，还创作有讴歌标志着人类解放的法国革命的作品。布莱克公开宣称希望拿破仑打败英国，因此以叛国罪被送上法庭。此后，从现实生活的表面上看，他表现出对政治毫无兴趣……

另一方面，布莱克是一个幻视者，信仰比欧洲基督教更古老的传统。比起语言晦涩、不知所云的新柏拉图主义，布莱克的信仰具有比较容易理解的构思：一切灵魂原本都从属于天上的上帝，但降落到地上，被裹以肉体，过着堕落者的生活。然后灵魂重新脱离肉体，回到天上去。

布莱克认为，天真无邪的孩子比大人更接近天上的灵魂，体验、经验只是赋予纯粹灵魂的劳役。他的这种思想就是在我国也受到许多读者欢迎的《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的主题。

从他以铅字印刷的普通形式出版的惟一一部诗集（布莱克根据诗歌内容制成彩色版画，具有独特的色彩，采用手工印刷的方式，发行数量很少）发行时就开始创作的《塞尔书》属于短诗型的预言诗作品。

诗歌的整体气氛怪异荒诞，却又可爱可亲，描写天使或者神圣灵魂种族的一个名叫塞尔的姑娘，居住在生命永恒之谷。她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困惑，便与百合、云彩、蛆虫等对话问答。塞尔终于听从土块的劝说，穿过从天上之谷通往人间世界的大



维也纳的木刻



门。但是，她看到一个充满泪水和悲伤的世界，害怕地尖叫起来，逃回天上的永恒之谷……

我在例如近亲死于癌症这样的时候会想起布莱克的这首诗。因为歌唱永恒世界的语言着实异常柔美，与之搭配的版画也美妙绝伦，然而，他以简洁准确的语言描写必死者的世界的荒寂恐怖以及必死者肉体的脆弱，也极具强烈的表现力。

于是，我认为，凡是生到人世间来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的肉体，在这个充满叹息与悲伤声音的世界里，要不极易生病，要不衰老而终。例如我和现在正受到肝癌的痛苦折磨，即将死去的哥哥一起听到的悲叹，其实正在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基调。我们却好像无所畏惧一样，依然欢歌笑语，过着孩提时代那样的欢乐时光……

然而，当我们的心情重新振作以后，还往往会这样继续想像：我们就是降临人世而没有尖叫着逃回天上的塞尔。现在自己身在人世间，大概已经忘记，其实在自己的灵魂决心降临人世间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没法子，干吧！

当人到了一定年龄，家庭、朋友中几位重要成员相继离开人世，于是想到十年、二十年后的时光，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死。由于经历过这些人生体验，我的日常生活的感情基础就产生这样的坚定信念：自己的灵魂是叫喊着“没法子，干吧！”才决心出生在这地上的世界里来的，那么，当人世间完全被封闭成如塞尔所看到的充满悲伤和苦难的世界时，不也只能自我鼓励“没法子，干吧！”——勇敢地迎接新的挑战吗？

我现在正在写这篇文章，但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前，我的儿子在我的身旁发病，我赶紧站起来，帮着妻子好不容易让他

躺在长沙发上。当他发烧得最难受、满脸通红地看着我的时候，我也基于本文所述的思考，不由得悲从心来：难道儿子也是对自己呼喊着“没法子，干吧！”而生到这人世间来的吗？然而，一旦痛苦过去以后，光便露出微笑。我似乎从他的微笑里看见“没法子，干吧！”这个决心的积极成果。



# 独笑性的裂缝



## 1

在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当年他虚岁五十，现在我已经超过他活在世上的岁数了。而且我意识到，由于青少年时期没有父亲的缘故，至今我身上还残留着无法克服的性格缺陷。

从根本上说，这个性格缺陷大概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吧。我虽然一直提醒自己要尊重长者，其实往往不承认长者的权威性。另外，与这种性格似乎相矛盾的是，对于年长的行家，就像对待理想的父亲一样，佩服得五体投地。对这样的

人，我丧失批判力。

这不就是说无法在个人之间建立良好的独立自主的关系吗？我不知道心理学家是否把我的这种性格归结于从小无父的缘故。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在从小不受严厉的父亲管制下的自由环境里无拘无束长大成人，而且直至年届老境的。

我这样写法也许令人感到唐突，我见过两三次J.P.萨特，觉得他的性格和我一样，便产生亲近感。他在自传中说过大体这样的话：自己的表情必须是笑嘻嘻的才能命令别人。读到这里，我也有同感。表情严肃，这种命令者与被命令者的关系基本上不正是父子关系吗？萨特大概也是幼年丧父之人。他在晚年不得不站在父亲的立场上对待那些年轻的革命家，却反过来像幼小的儿子一样接受他们的指导，有时甚至任人摆布，惟命是从，这大概就是这种性格所造成的吧？

现在话题回到自己，每当我遇到别人要把什么会长、理事长之类在某团体内充当家长的头衔加给我的时候，总是几乎诚惶诚恐，想方设法逃脱掉。而且我实在无法认认真真地履行社会明确规定的形式上的规矩，所以往往采取开玩笑的手法，设法摆脱干系。

就是说，由于我早年丧父所造成的性格缺陷，使自己无法成为一个确立独立的自我的大人。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我意识到自己虽然五十过半，却在本应是大人的独立个性上存在一道孩子般的裂缝。

有时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孩子向大人撒娇的态度——在别人眼里大概很奇怪——对待残疾的长子，而且有时候觉得光自然而然地成熟起来，变成一个认真和蔼的大人，十分宽容地理

解我。

正是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接受担任证婚人这样的邀请——尽管这是大人的代表性角色。但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其实是我和妻子喜欢这一对新人，主动承担的——决定担任一回证婚人。新郎可以说已近中年，结过一次婚，是英语教育领域的专家。新娘是初婚的美丽姑娘。

于是我从证婚人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位已有近十年交往——而且是一家人交往的——新郎。就是说，通过我这个证婚人的大人眼光，用与以往愉快的朋友关系——即类似一同玩耍的小朋友的关系——不同的方式看待他时，就会有新的发现，原来新郎的性格里也存在着独立个性的裂缝。

于是，我想在婚礼上的证婚人致辞中谈一谈这个新发现。作为证婚人，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也许不合适，是一种充满孩子气的举动……

我在婚礼举行之前草拟的致辞是这样的。

## 2



Y先生和H女士的结婚典礼顺利举行，不仅新郎新娘，一直为这个婚礼操心的双方的亲属也一定感到高兴。

这是我和妻子第一次担任证婚人，自然非常高兴，尽力而为，但恐怕多有不周之处。担任婚礼司仪的新郎新娘的朋友考虑到我这个证婚人没有经验，从介绍新郎新娘开始，必要的程

序都做得很周到。我就轻松地发表一点感想。

我和妻子结婚时候的证婚人是伟大的法国文学研究家渡边一夫先生，参加婚礼的人一共七位，其中一位江藤淳不久成为我文学生活的最大劲敌。我的伯父是男方的亲戚代表，他大概也是为了讨好证婚人，问道："先生，听说法国人吃红烧青蛙。是真的吗？""红烧……"渡边先生无言以对："噢，是吗……"我的妻子今天有点紧张，这还是三十年前我们婚礼以来第一次这样，还是先让她坐下来吧。新郎新娘本来就很紧张。

我是作家，写小说，Y先生是英语教育领域的优秀专家。但是，我们是老朋友，准确地说，Y先生不仅是我，而是我们家三口人的英语教师。今天我穿着新做的、却不太合身的晚礼服，Y先生穿着一身一定让H女士心神荡漾的结婚礼服。但是，我们是穿着游泳裤开始相识的。

中野有一个名叫TAC的体育俱乐部，我参加这个俱乐部已有20年，只会一种自由泳。由于我的游泳技术和热心精神受到大家的好评，不久前被选为理事——我也曾经感慨地说：好在我只会自由泳！Y先生也是俱乐部的积极分子。我们认识差不多一年以后，在游泳池边上总是聊游泳的话题……

不久，我觉得Y先生的举动有点奇怪。游完泳后，他在桑拿浴室或者更衣室里都兴高采烈地和其他人聊天，有时还用英语和外国新闻记者交谈。他和日本人聊天的时候，为了营造愉快的气氛，往往说一些不太文雅的俏皮话。就是说，充当一个丑角。可是，他用英语和外国人交谈时，甚至不怕和那些可以

说是相当身份的外国知识分子对立，毫不服输地和他们争论，结果建立起相互理解的关系。他不时引用一些诗句，也都很高雅，而且忠实原著——我们日本人谈话很少这样。于是，我对他产生兴趣 这位在日语和英语之间似乎人格分裂的、具有魅力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我决定请Y先生做我的英语教师。我晚上到他的在四谷的办公室里，他给我单独上课。使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一位教师写的研究但丁的著作，当时我每天从早晨开始阅读，一直到傍晚去游泳池才放下来。但丁的一生充满苦难，但是众所周知，《神曲》最后一行是以“爱情”开头的。我想，这一行对于今天的婚礼十分合适。

I’amor che move il sole e l’altre stelle

(the love which moves the sun and the other st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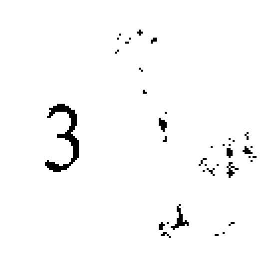
（是爱情，动太阳而移群星。）

Y先生对我了解很多英美文学，英语发音却很糟糕似乎很是感到吃惊。现在各位也许也有同感。正因为如此，我听Y先生发音准确、语调优美地朗读课文，觉得心情愉快，学习才持续了很长时间。不久，我要去公爵大学做一次稍长一点的关于日本现代文化的讲演，Y先生把我的讲稿译成英文，还认真仔细教我发音。那是我在外国进行的最为成功的一次讲演，首先译稿受到极高的评价。

恰好我的次子在家复读一年准备高考，便向Y先生学习英语。教室是我家的起居室，教材是爱因斯坦的书信集和叶芝的评传，一边阅读一边用英语讨论。我的妻子满脸忧愁地感叹说：这样的话，除了东京大学理科之类难进的地方，其他不

去！第二年春天，果然如愿以偿，实在令人高兴。

现在每星期一次通过电话向Y先生学习英语的是我的妻子。她继承伊丹万作这位好学的电影导演的血统，每周星期五早晨的英语学习对她来说实在是愉快的时间。现在她正在学《哈姆雷特》，说老师的音色极具魅力。然而，我对她的热心感到疑惑，便问她，她说奥菲利娅的音色最好，我却莫名其妙。



## 3

我刚才说到日语和英语的双重性对于Y先生来说应该是一个重大的人生课题。我国外交官里英语流利、也能用英语写一点文章的人多的是，也有不少美国人讲一口漂亮的日语。但是，Y先生的日语和英语的双重性就不是停留在这种便利性技巧的水平上。这是他的命运。他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一直品尝其中的甘苦，这就是他的人生。

我说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自我感觉。Y先生写过一篇没有发表的小说，题目叫《半个日本》。意思是说自己是半个日本人。我看了以后，越发觉得实在不简单。这篇小说讲述带有自传性的故事，说一个日本人从小就生活在英语环境里，青春时期经历过严重的个性独立的危机，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终于渡过危机，以积极的态度认同“半个日本”的现状。

我认为，在今后的日美关系中，更加需要像Y先生这样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水平上可以在日美之间架起真正理解的桥梁

的优秀人才。而且，像他这样痛苦地生活在日语与英语、日本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夹缝里，具有坚强的独立个性的人才是使今后的英语教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的优秀教师。我衷心希望这样的人才有一个美满的新家庭，使他的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于是，Y先生选择H女士这样年轻漂亮、真诚热心、通情达理的姑娘作为自己的夫人。我认为，这是人生中难得的喜事。

另外，这句话只能在这里说：Y先生在说英语的时候，有时完全变成一个可敬的美国人，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这么说，无异于在讨好新娘。但是，Y先生在说日语的时候，因为过于恭谦礼貌，我觉得把日本人表现得有点过头，有时还说一些略显恭维的令人担心的玩笑话。就是说，Y先生虽然已经克服了独立个性的危机，但在日本人与说英语的人之间还存在一道——尽管是很小的——裂缝。填补这道裂缝正是H女士的工作。用什么来填补呢？用但丁的话说，就是L' amor，就是 the love which moves the sun and the other stars 的爱。

感谢在座的各位听我这个第一次的证婚人这么长的发言。尊敬的新郎新娘的父母双亲，祝贺你们。Y先生、H女士，衷心地祝贺你们。

## 4



妻子认为我的上述证婚人致辞在婚礼上发表不太合适。因

为离婚礼还有一些日子，在妻子的努力说服下，也许我会决定重写。我还听见妻子给朋友打电话，询问“裂缝”这样的词语在婚礼上用恐怕不合适吧。

仔细想起来，为了给新郎新娘致以我们小小的祝贺而选择“大安”吉日，把我拉到百货店购买礼服以及其他各种东西，为了完成证婚人这个角色，妻子最是积极地四处奔波。好像还买了证婚人必读之类的书来看。

所以，在我们家里，扮演着“父亲”这个成熟的大人角色的应该是我的妻子。她也是幼年丧父，她的母亲的为人做派像是大家闺秀，她的哥哥继承父业，选择电影导演这个职业。她哥哥是我高中时期开始的朋友，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早年就失去父亲这个“专制者”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长子，具有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性格。

我的妻子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就背着母亲把配给的大米偷偷藏起来——母亲总是把配给的大米很快吃光——以补充下半个月食用。母亲不惜花钱给哥哥买高级绘画颜料，她还得劝母亲不要连生活费都花进去。这个沉着稳重的女孩子如同真正的“父亲”那样长期关照守护着艺术上完全开放的才华横溢的哥哥和大方美丽的母亲。



# 哪个家庭都一样



## 1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引用了长子为祝贺他母亲生日写在贺卡上的一段话。当时他还写自己二十六岁，所以算来已是两年前的事了。这期间，我们家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之一就是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岳母由于大腿骨与骨盘相连接的细小部分骨折，住进医院。虽然她的智力有点衰退，但腰板腿脚硬朗，一到傍晚，就在大门与屋门之间快步来回走动。但终于在这一天，她说自己腿痛。

于是主要是妻子开始忙里忙外，我留在家里，通过妻子打来的电话，也可以了解我们医疗发展的部分现状——觉得医学上无能为力的地方，以及明显的医术进步等情况。经过X片拍照，发现岳母骨折，必须住院。医院的老人病房恰好有空床位，我们也放下心来，但说是两边的床上都是男性患者。

岳母多少有点特殊的洁癖，十年前还拒绝在任何医生面前露出自己的肌肤。对于老年人的健康检查更是不感兴趣，五六年前发现肺结核已经相当严重，才住院治疗。我在别的文章里写过，办理手续的时候，那位女生活指导员狠狠教训了我一顿：这种状态的老人放任不管，想一想她的结核病菌到处传播，那简直就是对社会的犯罪行为。

让岳母睡在两个陌生的男人——尽管都是老人——之间，如果她真的面对这个情况，恐怕非常糟糕。因为她目前只能在床上大小便。

于是我和在体育俱乐部相识多年的一位大学老师商量，最后他在附近的一所大学附属医院——最近长子也开始在这家医院治疗——找到合适的病房。然后经过主治医生精心准确有效的诊断治疗——岳母自己说是“天才性的骨折”——以及护士长、护士们的耐心照顾和鼓励，岳母很快就痊愈出院。

然而，岳母住院一个多月以后回到家里，她的智力似乎比骨折之前更加衰退。我和妻子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好在身体恢复了健康。

今年妻子生日的时候，家里人按照惯例都写贺卡表示祝贺。我当时为了评选文学奖事宜，正在阅读森亮翻译的十七世纪英国诗人赫立克的作品，从中感受到喜悦欢愉的心情。便抄

下他的四行诗送给妻子：

幸运悄悄地来到我们的屋顶——
如同无声无息的积雪和夜露。
这幸运并非突然降临，正如阳光照在树上的时候，
光线的感觉在树枝上慢慢扩展。

我们家，别人的家，大体都是如此——经验告诉我，似乎每个家庭都这么想，也许更加明显一点。我本来想这么写：“尽管生活千辛万苦，如果把家庭成员比做一棵树上的树枝，太阳光会不知不觉地照射到每个人的身上。而根干也许会强烈反应，这是妻子不屈不挠的性格的表现……”但是由于多年来都是赠送贺卡的习惯，就引用赫立克的上述四句诗表示祝贺。

## 2

但是，看了残疾的长子写在贺卡上的这一段话，我和妻子都大吃一惊。

妈妈，祝您生日快乐。今年五十六岁的人好像在逐渐增加。请多保重身体，不要感冒。我不会写很大。我的文章不太好。

每天，我喜欢傍晚。因为端来晚饭。哪个家庭都一样。说

是傍晚，其实就是五点。

每周星期三，就去牙科医生那里，我会注意的。我不太害怕。

从性格上说，光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他对我表现出明显的生气，一般都是因为我对他开玩笑有点过火。从幼年时期就是如此。他为了使说话或文章具有幽默感，虽然其中也有无意识的风趣，但往往刻意追求。

因为写贺卡是在年初，他想今年肯定还有许多人和母亲一样过五十六岁生日。的确是这样。但是每天也都有人进入五十七岁，他装做没有意识到的样子。这显然是光想制造的幽默。今年五十六岁的人好像在逐渐增加。

每周星期三坐电车去牙科医院看牙，这是光的现实生活。他小时候就牙齿不整齐，刷牙不干净，经常出现问题。也曾经全身麻醉后同时拔去几颗牙。那次我也非常紧张，不亚于他出生以后不久做头盖骨手术的情景，一直坐在候诊室里等待。

进入青春期以后，光开始患癫痫病。由于连续服用抗癫痫剂，副作用日益明显，牙龈红肿，出现草莓状的红包。因此不敢用牙刷刷牙，他的大部分牙齿开始松晃，口臭也越发厉害。

但是，自从妻子带着光去位于梅之丘的牙科医师会牙科中心就诊以后，在牙科卫生员极其细心周到的指导下，他的牙龈状况明显好转。对于家有残疾儿的母亲来说，牙科中心无异于救助恩人。我在一旁看着光每天晚上使用各种形状和不同功能的牙刷刷牙时，不由得感受到母子俩付出的努力……

牙龈状况好转以后，下一步就是由专职医生拔牙和安假

牙。光的牙齿治疗已经进入这个阶段——其实今天下午我就要陪他去医院，医生预先告诉我说这次治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于是我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想赶在去医院之前把草稿写出来——光本人好像也很担心。但是他大概为了让母亲放心，故意写道“我不太害怕”。

光写的那段话的中间部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最近岳母经常从作为她卧室的客厅走到大门口，再回到屋门，在大门口和屋门之间来往走动，那样子像是在等待已经约好的旧时朋友的来访。只要看见信箱里有报纸，甚至哪怕是一张小广告，都要拿到起居室里交给我。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论我是在写作还是看书，都要从椅子上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接受。否则她会拿着小广告一直姿势端正地站在那里。即使没有什么可送的东西，直至两三年前，还每天进来询问家人是否安康。但是现在只是在大门口和屋门之间来回走动，雨天也不例外，弄得门口的脚垫上净是泥土。

我怕她摔倒再次骨折，但是她每三四分钟就在大门与屋门间来回走动，根本劝不住。心想她是否作为一种有益身体健康的运动呢，只要她愿意也就算了。但是光对外祖母的这种举动——光从职业培训福利院回来后，总是躺在起居室里听音乐或者作曲，外祖母在门外走路的动静听得十分清楚——好像心里很难受。

岳母的这种走动有时从天一亮就开始，午后稍晚一点时间最为频繁。为了填写最近开始接触的老年人生活照顾中心的管理员送来的调查表，有一天，我一边工作一边在稿纸边上记录岳母开关大门的次数，结果记到一百多次，只好停下来。

一到五点，虽然家人的晚饭时间尚早，妻子就把岳母的晚饭送到客厅。吃过这顿饭，虽然也有例外，但她就呆在自己卧室里，不再出去走动。于是光对外祖母的烦心，至少今天才算是轻松下来。我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每天，我喜欢傍晚。因为端来晚饭。哪个家庭都一样。说是傍晚，其实就是五点。”

光在这里想强调，对于自己来说，给外祖母端来晚饭的五点才是最令人高兴的傍晚时间。

3

其中最让我和妻子感慨的是“哪个家庭都一样”这句话。想起来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每次家人团聚，即使外祖母话语不多，她也是一家人的核心。她对光说话格外亲切和蔼，所以外祖母和光的组合成为家庭的轴心。但是，不久以后，外祖母便不再走进我的起居室里。即使送报纸或者小广告，也是我一接过来，她便立刻返回客厅。有时打开一道门缝观察外面的动静，一看见光要上二楼的卧室，立刻出去挡在他面前，和他说话。但是她问的话往往使光难以理解，只好低着脑袋一声不吭。例如外祖母向光打听明治末年死去的她的哥哥的消息，或者问光是否对那个年轻的军官还有印象……

妻子除了给母亲端饭和送点心之外，整天忙于家务和负责我的工作上的联系事务，所以很少去客厅和母亲聊天。女儿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每天辛苦劳累，好像周末也很少和外祖母


Yukari





说很多话。这么说来，好像就外祖母不是家里的成员似的。哪个家庭都一样。

我和妻子逐渐觉得心头豁然。此后妻子在客厅里陪伴母亲的时间似乎多了起来。到成城大街两旁的樱花盛开的时节，我们观察光的状态，打算带他去赏花，此前先带岳母到附近观赏染井吉野樱和山樱。我们做好准备出门时，尽管光依然照样躺在起居室里听FM，表现出毫无兴趣的样子，妻子和岳母还是叮嘱他好好看家……

岳母大概不会对现在的事情重新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也不会清晰地回忆起往事，和家里人聊天。这一阵子光接连几次癫痫病发作，而且比较厉害，身心疲惫，所以每次接送去职业培训福利院都要格外小心，而次子从四月起转到本乡校舍学习，也就不能指望他去接送哥哥了。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早晨和下午两次往返职业培训福利院，中间这一段时间往往无法工作，只好躺在沙发上休息。

十五年前那种自然而然的家庭感觉，似乎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的那种信心十足的康复状况，已不复存在，一去不复返了。这种满含怀旧情绪的感伤往往袭上心头。

那个时候，在北轻井泽的别墅山庄，光每天早晨带着弟弟妹妹跑“马拉松”，我工作结束以后，就跑到熊川钓真鳟。妻子则登上后山的斜坡，从人们一般不注意的洼地里采摘坚硬女娄菜，仔细写生。住在关西的岳母每天从电话里听到我们这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却像是发生什么大喜事一样，高兴地声音激动。

但是，我不能一直沉浸在这惆怅伤感的情绪里。坦率地

说，也没有这样的时间。最近这一阵子，我只能时而抽空接送光，但知道年底要更换老师，还有一些新生进去。光还要继续治疗牙齿，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面临新的工作和学习环境的变化。而且一到午后稍晚一点时间，岳母就开始在门外来回走动……

在家庭的这种日常生活变化里，即使不断有东西被毁坏，但也有什么东西在毁坏中恢复、再生。我偶尔阅读有关老年性痴呆症的书籍，上面刊载有脑的缝隙的照片，知道岳母这样的智力衰退恐怕绝无恢复的可能。但是，从极其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大概有一天也会这样回忆：这种病可以治愈，我们自己不全都在这种治愈中生存的吗？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正是为了学会以长远眼光看问题的方法，自己才活在这个世上……



# 异人。



## 1

这件事发生在十五年前。那个时候，伊丹十三还远远没有获得国际著名电影导演的名声。我和司马辽太郎先生谈话的时候，听到他说出对伊丹深刻理解和充满激励的话语，不由得喜出望外。

司马先生说：“他是个异人。”虽然司马先生没有详加解释，但我觉得这句话与我从十六七岁开始就亲近伊丹的感觉完全吻合。

翻阅手头的辞典《广辞苑》(第四版)，其中对“异人”是这样解释的：

**[异人]：①不同寻常的人。优秀的人。椿说弓张月后编云“我国每逢天皇治世，必出一异人”。②不同的人。别人。③施行奇术之人。仙人。④外国人。**

伊丹到司马辽太郎先生府上拜访，提出想把司马先生的工作实况拍摄成一部电视记录片的设想。不久前，伊丹开创出电视历史记录片这种新形式，刚刚把大佛次郎的《天皇的世纪》拍摄成系列片。

司马先生没有答应伊丹的要求，但在与伊丹的交谈过程中，深深感觉到“他是个异人”。

伊丹登门拜访司马先生之前，应该熟读过他的全部著作。伊丹的读书方法与那些研究者不同，他具有集中性。他大概详细说明了自己拍摄记录片的构想。但是，司马先生听着听着感觉到一种危险。如果用伊丹的手法把司马先生创作的以幕府末期、明治时代为题材的著作拍成电视，它所表现的日本人的国民性、国家的特殊性的独特风格势必超越大体保守的一般理念。

我没有能力对司马先生的整个工作进行前瞻性的评论，但可以说，很早以前就是他的著作的热心读者之一。我还曾经为他的初期小说《鬼谋之人》写过腰封。我就读的高中——伊丹也在该校读过，中途退学，后来想复学，但是被原先的班主任、音乐教师拒之门外。我和他一起去见老师，他根本不申诉

理由，倒是我慷慨激昂地为他辩解。接着，他叫我的名字，说："健三郎，算了，回去吧。"伊丹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的耳边——的前身是正冈子规毕业的初中。司马先生在有关子规的创作上给我留下特殊的回忆。

司马先生丰富的人生观和巧妙的叙述语言有时柔和地包裹着带有虚无主义的历史观的棱角。例如关于明治、大正、昭和的天皇观问题，如果以伊丹的电视拍摄的鲜明形象直接出现在画面上，恐怕难免要发生具体的麻烦问题……

六月中旬以后，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一天，在该校历史悠久嘎特兰格尔俱乐部（カドランゲル·クラブ）的一间屋子里，我想起当时与司马先生的谈话。今年是芝加哥大学成立一百周年，举办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我参加其中的日本研究所举办的百年庆典演讲。第二天与来自美国各地的大学的理论家们开了一天的研讨会，这很有意思。听众不算很多，主要是大学教师和研究生，但个个都是能说会道的辩论高手，提问尖锐深刻，如同自由辩论。

因为我在上午的研讨会上没能具体引用日本一位思想家的有关言论，便利用午休时间，使用大学发的临时借书证，到开架图书馆查找资料。这时，该校的电影研究俱乐部的人来找我。他告诉我，伊丹导演在日本遭受三个暴徒的袭击，脸部等处被刺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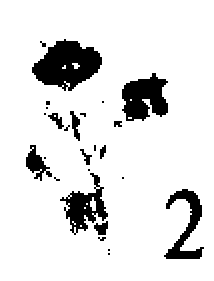
我从嘎特兰格尔俱乐部给东京打电话，向妻子了解情况。我的妻子是伊丹的妹妹，她似乎已经从惊恐中恢复平静。我回国以后，她把长期以来一直记录的生活日记中那几天的部分给我看。其中写道："因为丈夫在美国，我可以自由

地支配时间，去探望哥哥。”

日本各个媒体都对此事作出反应——我在美国从《洛杉矶时报》上看到经过认真查核事实的严肃的评论——我发现这些报道中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不把评论的核心放在伊丹与地痞流氓的暴力行为的关系上。都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把伊丹导演的电影称为“社会派”，然而，真的是“社会派”吗?是否有受到国税厅和警察厅大力支持的“社会派”呢?

据我的观察，伊丹的脑子里恐怕没有“社会派”这个自我意识，倒是的的确确认为，一般被称为“社会派”导演的许多电影，虽然不能说全部，但大多数没什么意思。

伊丹想创作有意思的电影。他的总体构思和细部观察，以及导演技巧把对象所隐藏的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得淋漓尽致、暴露无遗。这就是伊丹电影最终具有危险性的地方，而司马先生从电视记录片的构思中就看穿了这一点。



## 2

几年前，岳母发现患有肺结核，住院那一天，伊丹亲自开着他那一辆豪华小车送她去医院。伊丹十分喜欢车子。这次遭暴徒袭击，也正是他从自己现在心爱的英国本特利后排座上取东西下来的时候。如果车子也遭到损坏，一定会让他更加痛心不已的。他的这种“日常感觉”与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感觉有所不同，犹如《葬礼》里笠智众扮演的和尚乘坐劳斯莱斯轿车

出来那样的趣味。我和他久未见面，那一天在环境舒适的医院病房里谈了很长时间。

那一天，我和伊丹见面的时候，我正深受责难，他却若无其事，悠然自得。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岳母肺结核的病情相当严重，而且一直没去医院治疗，长期放任不管。我作为户主，在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被女生活管理员狠狠申斥一顿。这不仅是对岳母的极端不负责任——我无法让给岳母看病的医生相信，虽然岳母现在显示出高雅的修养和充满社交性的言行举止，其实她几乎病态般地厌恶医院——同时也是对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的子女以及社会的犯罪。

然而，伊丹端庄威严地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言不发，不为我说一句好话。好像这个女生活管理员对电影演员兼导演伊丹十分熟悉，甚至还是他的影迷似的，现在正充满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代替伊丹谴责我这个抚养岳母的女婿一直虐待自己母亲的行径。伊丹在《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认为和这种性格的母亲住在一起的人都是受虐狂者。他的这种心理分析使我的美国朋友感到心情忧郁

伊丹埋头研究心理学的时期——他甚至和研究弗洛伊德、拉康的学者一起出过书——由于小时候养成的娇生惯养的性格，已经与压制他的母亲在心理上完全分道扬镳，但因为说的是与秉性难改的这样性格特殊的母亲共同生活的人，所以并没有对我和妻子进行人身攻击的意图。

岳母到有关科室进行各种必要的检查，在她的病房里，伊丹对我谈起他的电影导演规则。美国的优秀电影肯定都要遵守这种规则，而日本电影几乎没有这种规则。他自己打算彻底遵

守电影规则。

他的话很有意思，我想这在小说里大概可以归结为创作完整的情节结构。恰好最近我陪女儿——她利用休息时间——看了WOWOW集中播放的一部美国花巨资拍摄的大片——我已有十几年没看美国片了——《背对未来》三部曲。

该片的显著特点是对故事情节构思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第一部的情节构思已经具有很高的水平，第二部在高水平的基础上，集思广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第三部又更上一层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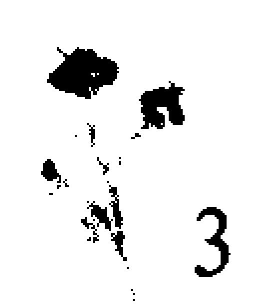
伊丹对自己导演的电影也是千锤百炼，细致入微。这不仅表现在他的《马尔萨的女人》等系列作品里，在后来的影片中愈发感觉到这种意图的积极积累。伊丹属于具有丰富的实践创作经验和才华的导演类型——虽然他原本更是一个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恐怕不是那种专业理论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他的话可以简单理解为“情节构思第一主义”。

即使在我印象中与伊丹在感情上敌对的评论家也承认他的《民暴之女》具有深厚功底的情趣。一部投资巨大的电影，当然需要宣传，于是伊丹亲自到各种媒体发表谈话，例如参加“防止民暴的倾向和对策”这样的节目。这在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的基础上，的确向我们市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智慧。当伊丹的工作还是以创作随笔为主的时候，他的文章中最有意思、对社会最有好处的还是各种类型的采访记录。这个工作仿佛是他成为电影导演之前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但积累了自己后来的知识与方法的资本。

为了宣传电影而在电视上发表谈话、演讲所涉及的民暴

（民事暴力）问题恐怕不得不被简单化地理解。其实，伊丹认真思考过推荐给第三者的方法，但或许也有过于简单化的部分，使别人误解这个导演拍摄这部电影只是一种图解民暴。即使不是民暴，实际上这类图解式电影有的是，所以往往容易引起误解。但是，伊丹的电影是具有多面性的作品，不能进行简单的理解。评论家们难道不应当写出与媒体上纯属大肆炒作不同水平的、让观众真正理解电影所具有的本质内涵的文章吗？

有一种说法认为：暴徒看过这部电影后大为恼火，才袭击伊丹。我对这个观点表示怀疑。暴徒的犯罪动机难道不正是出于媒体在《民暴之女》放映之前过于简单化的评论宣传吗？优秀的艺术作品只能在被理解的过程中触发受众的情感爆发，正如从作品内部不会向外面溢出来一样，也是一种“陪伴”的东西。伊丹电影中经过精雕细刻的情节构思充分达到这个理解关系的全过程。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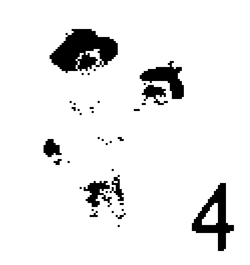
我在美国的最后一场活动是到瓦胡岛和夏威夷岛的大学去演讲。比起美国本土来，可以更及时得到日本的消息。有几个人把伊丹的伤势情况、会见记者的谈话内容告诉我。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伊丹说自己拍摄的电影的主题是自由，今后还要继续表现自由的题材。我觉得这句话真实得无需任何“简单

化”的理解。

我和伊丹第一次认识是高中二年级，当时他坚决反对学校学生必须穿学生制服的强制规定。对他来说，日常着装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问题。后来，他终于发现有的学生制服不是金色纽扣，而是黑色纽扣，这才勉强忍受。从他最近在欧洲会见记者的照片里发现他身穿中国式立领服装，这使人想起四十年前他身穿学生制服的模样，实在很有意思。

与自由对立的东西，是压制、固执、苛刻。想到这些，就知道伊丹如何一直受到巨大的痛苦折磨。如果高中时那个班主任、音乐教师能够重新接纳伊丹，他就和我们一样读书，大概能考上大学，遇到一位好老师，从而满足他生性好学的愿望。结果他高中毕业后走上社会，从事绘画插图的辛苦工作。当然这一切无疑都是造就他成为今天电影导演的养料，但他原本应该可以更幸福地施展自己的才能。

伊丹的随笔真实地体现他的个性，但因为当时发表的地方往往是通俗的报刊，所以从其文章中随处可以发现在写法上煞费苦心的地方，虽然不能说是妥协，其实也不必如此辛苦。伊丹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不得不和当时肯定存在的许多苛刻制度进行顽强的斗争。他的“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无疑异常深刻而沉重。



4

伊丹很快出院，没有留下后遗症，好像立刻投入新的一部电影的采访工作。不仅亲朋好友，许多不相识的人送给他鲜花表示慰问，一位才华出众的女演员把其中一部分花送来分赠给我们。她和妻子谈起有人以污言秽语攻击我。但攻击者不是地痞流氓，而是艺术院会员。她说："我们女人来保护男人吧。"妻子对信子的话，只是露出依然从容不迫的稳重的微笑。

伊丹的康复不仅使他的家庭，也使我的家庭充满明亮欢快的气氛。



# 经过推敲的语言。



## 1

听人说话，觉得很有意思。这虽是长期的体验，但有时也会再去重新反复体验，思考什么样的话才真正觉得有意思。经历过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体验的人说的话自不待言，知识渊博的人的话，亲眼见过另一个崭新世界的人的话听起来都觉得很有意思。至于具有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的人的话——不论是谁，到了一定年龄，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知识——只是平平如流水，难以使我始终听得聚精会神。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思考哪些人的话的的确确使自己从心里真正感觉到有意思。我的答案很简单: 以经过推敲的语言说的话。我所说的“推敲”并不意味着从文体到词语必须逐一精雕细刻。只要一篇话里有一两个经过认真推敲的语言，并成为该篇话语的核心，就可以使人听时如沐春风，感触到新鲜的智慧，过后回味无穷。

那么,经过怎么推敲的语言才能使说话有意思呢? 有时是通过学习（研究）来推敲语言的。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人生的体验本身使语言得到“推敲”。上述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第三种方式倒是常见的。

我们家有一位优秀的钢琴家朋友海老彰子女士。今年秋天,我的天生残疾的儿子将其创作的曲子结集出版《大江光的音乐》（COCO75109）CD，给全家人带来巨大的喜悦。这些曲子主要是海老进行钢琴演奏,还有同样是我们最尊敬的长笛吹奏家小泉浩先生的参加。妻子把光正在指挥和另一个人正背对我们吹奏长笛的场面速写下来,将来作为我的这篇文章的插图。不久以后,有好几个人都说这个吹长笛的人的模特儿大概是小泉浩。我是在为CD素材录音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海老的钢琴与小泉的长笛共同演奏的《毕业》,我的心头不由得辛酸疼痛，仿佛被粗壮的手指抓伤我的胸口

海老彰子女士在音乐杂志上发表对谈文章,在音乐会的说明书上撰写文章,我读后发现其中有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含义上的真正经过推敲的语言。于是我感受到仿佛刚刚结束与这位美丽端庄的女士进行愉快对谈后的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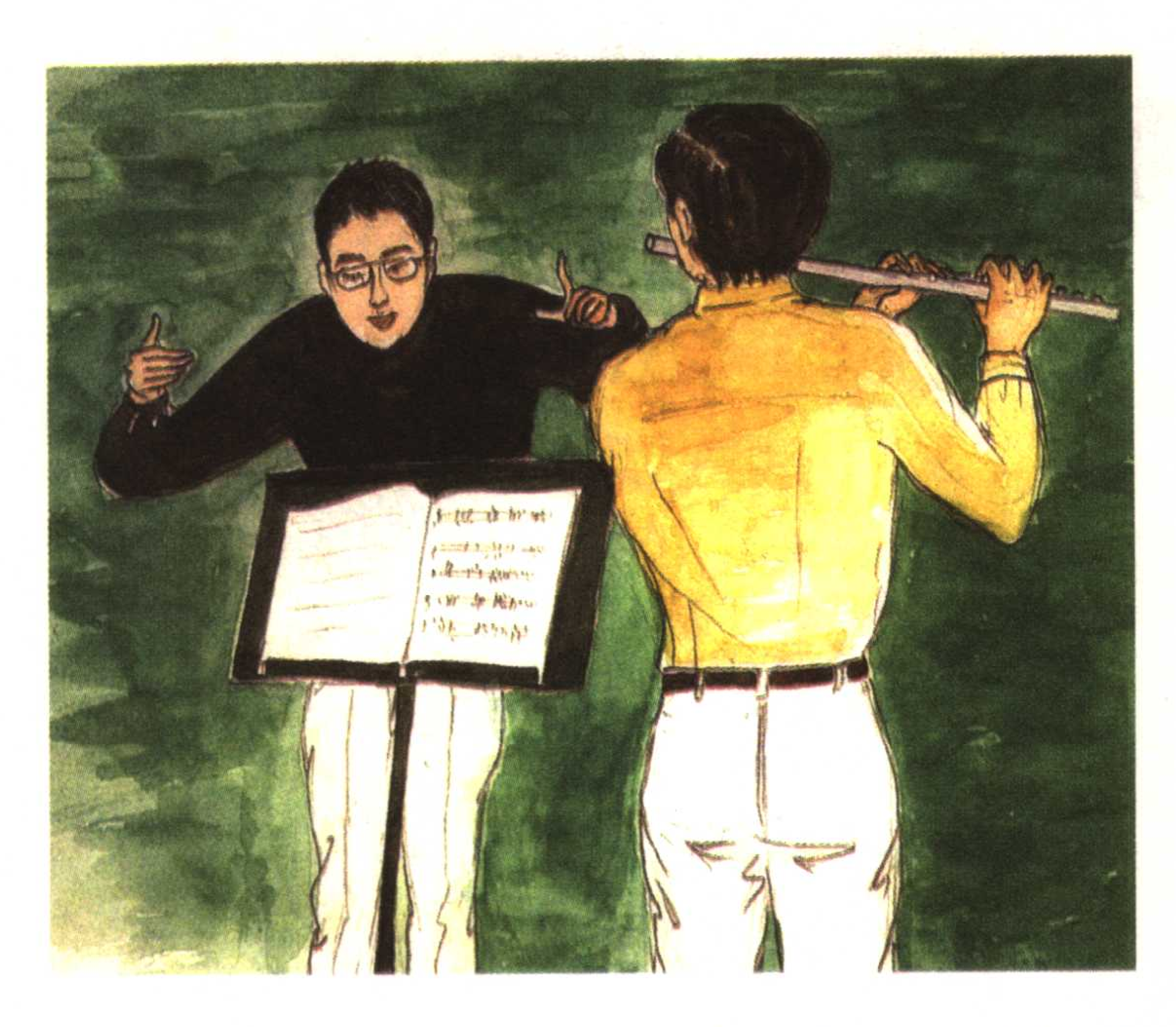
海老女士认真推敲的词语之一是“认识”。她在与日本音

乐杂志记者的对谈中说到这个词。我们了解花草树木，也了解人类宇宙，然而当我们通过体验和想像力真正理解的时候，才觉悟到自己以前其实至少并没有“认识”。我认为，这就是海老赋予“认识”这个词的含义。这大概相当于海老精通的法语中的comaître这个词吧？

海老女士认真推敲的另一个词语是“深受感动”。德彪西也好，肖邦也好，只有从心底“深受感动”，才能把他们的音乐化为自己的表现。海老大概想把自己积极主动创造的某种能动性赋予“受到感动”这个被动态的词汇里，同时还想强调受到感动的深度，所以才选择“深受感动”这个词。

海老女士年轻时赴法学习，在法国参加国际最高水平的钢琴比赛，获得优异成绩，此后一直在欧洲进行演奏活动。要开展演奏活动以及为此奠定坚实基础的日常生活，肯定需要一定的法语能力。我想，她能够用法语过着充实的生活，而且在演奏会上能够用法语和其他演出人员、指挥，以及和评论家、听众进行交流。

以这种形式在国外充实生活过的人往往都是如此——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能达到这样充实程度的人，还为数极少——海老也对自己的母语怀有特殊的感情，并且喜欢认真推敲。这是因为身处被外国人包围的环境中，海老女士在内心深处思考的时候，恐怕只有通过日语才能获得最重要的启示的缘故吧？另外，她通过经验的不断积累，大概也意识到要想获得启示而必须使用的日语本身又是何等的暧昧，自己必须加以重新定义吧？限于篇幅关系，我在这里不能展开议论，但必须指出的是：我国的法国文学、哲学的杰出研究家，旅居法国，并经过



小泉浩先生的演奏与光的指挥



艰苦探索获得累累硕果的森有正先生才真正是呕心沥血地推敲“定义”和“经验”这两个词的人。

我从海老女士的文章中感觉到语言推敲的情趣，更从她的钢琴演奏中感觉到幸福。因为她把以独自的方式“认识”、“深受感动”的东西在音乐中表现出来。尤其在我的家里演奏光的作品时，我发现她真正“认识”、“深受感动”光的身心深处的东西。作为光的父亲，每当我看到光笔直地站在海老女士弹奏的钢琴前面侧耳倾听时，就能真切感觉到光正在“认识”、“深受感动”着世上最宝贵的东西。



2

海老彰子女士和小泉浩先生演奏光创作的曲子，光是作者，他到日本哥伦比亚唱片总公司的录音棚观看录音的那一天，对他来说应该是终身难忘的日子。第一天，乘地铁在赤坂下车后，按照地图寻找公司大楼，我想光会感觉到在陌生土地上行走的劳累，更有对即将开始的录音的期待和兴奋。

光在等电梯上楼去录音室的时候，突然发病。那一天，我和妻子在敞开着大门、传来正在调音的钢琴声响的录音室外面，首先要做的事是把椅子排列起来，让光躺在上面，并且把毛巾弄湿为他擦汗。不过，录音开始以后，光对演奏者的提问，虽然态度审慎却是明确地予以回答。

光与教他作曲的田村久美子老师之间已经研究过好几遍乐

谱。虽然曲子使用的都是简单的技巧，但海老女士为了准备正式演奏，还是认真地反复练习，并且发现几处和声和休止符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还有如演奏的速度、是否强调断音等小问题，也要听取光的意见。

对于海老从录音棚通过麦克风提出的问题，光都略做思考，然后一一准确地回答。海老还使用两三种方法进行演奏，征询光的意见，问哪一种最合适，光总是毫不犹豫地判断回答，一旦决定下来，就从不更改。

这种在音乐中具体使用的语言，也是经过认真推敲的语言，可以使海老与光顺利地明确地进行交流。这种经过推敲的语言具有清爽舒畅的交流和理解，尽管录音时间很长，但我觉得工作人员的心情都很愉快。

还有记者前来采访录音的情况，他对光创作的音乐从心底给予关心，反复地慢慢地问光刚才录音的这些曲子是怎么创作的，想表现什么，但是光只是歪着脑袋，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我在一旁替光着急，就把记者的问题解释给他听，让他理解。但是光还是几乎没有回答，记者也没在笔记本上记录什么。

这说明日常会话的语言有时反而比使用专业术语谈话要难。我这么说也许是一种“反论”：日常会话的语言由于十分暧昧模糊，经常无法准确地表达意思，说者与听者之间需要事先建立起足以相互理解的关系。

而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思已经经过必要而充分的推敲，它本身作为一种中性的工具，无论什么人使用，都能够准确地表达意思。虽然掌握专业术语的含义必须付出努力，但一旦掌握，专业术语就成为最容易表达意思的工具。光与海老共同拥

有音乐专业术语这种工具，而新闻记者与光之间横亘着暧昧模糊的日常用语的海洋。

录音之后，需要确认每首曲子的题目，决定CD的目录。光每次作曲，都及时地安上恰当的题目，并且工工整整地写在乐谱上，然后夹在纸夹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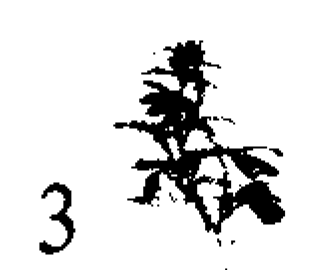
这些曲子有《毕业》、《生日华尔兹》、《万福玛丽亚》，为青鸟残疾儿童学校的学生节创作的《青鸟进行曲》、《星星》，还有《序曲先生》。因为巴赫创作有许多著名的序曲，大概光想以自己的序曲表达对巴赫的敬意吧。此外还有《华尔兹》、《回旋曲》、《北轻井泽之夏》、《冬天》。

另外，为光做脑外科手术、并且后来长期一直关照他的森安先生去世以后，光为其夫人创作的曲子有《给M的安魂曲》、《为惠子夫人创作的摇篮曲》、《舞蹈》、《西西里舞曲》、《主题回归》、《悲伤》。我和妻子去欧洲旅行，第一次把他留在家里时创作的《愿飞机不要坠落》。

从以上的曲名可以知道，光有好几首曲子是根据欧洲舞曲的形式命名的，有的还造成重复。于是让光重新取名。光重新取名为《魔笛》、《人们喜欢的华尔兹》。光的《魔笛》与莫扎特的《魔笛》虽然旋律不一样，但总觉得在气氛上有某种共通之处。《人们喜欢的华尔兹》这首曲子，妻子尤其喜欢，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低声哼唱。

光平时总是沉默不语，或是思考自己的曲子所形成的印象，或是注意倾听别人对自己的曲子的议论。如果有人提出需要修改，他就把经过这一番认真推敲的语言作为曲名。对于光自己决定的曲名，虽然他考虑的角度完全出乎我们意外，但

我们感觉到这曲名准确得难以更改。再听曲子的录音，更是这样的感觉……

3 

很早以前，我们一家人曾回四国的山村老家探亲。光与祖母熟悉以后，两个人经常单独在一起。

但是，回东京那一天，女儿在飞机里显得忧心忡忡的样子。因为光临走时对祖母大声说道：

“奶奶，请死得精精神神地！”

祖母回答说：“是呀，精神起来，好好死去。可是，光，奶奶舍不得你走啊！”

过了几天，光和妹妹经过一番商量以后，打电话给祖母，更正他说的这句话。他打电话的时候，全家人都聚在他身旁，想听一听祖母的反应。

“实在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要说：奶奶，请活得精精神神地！”

电话那头的祖母好像高兴地笑起来。不久以后，祖母得了一场大病，幸运的是，很快就痊愈了。她对一直照顾她的女儿——我的妹妹——说道：“我生病的时候，没想到是光原先说的那句话最能鼓励我：请死得精精神神地！我一想起光说这句话的声音，心里就有了勇气。说不定多亏了这句话我又活下来了。”

光在家里的时候，一般总是沉默不语。回到乡下，大概祖母无意识地对他谈起自己已经上了年纪，这一辈子什么事都经历过，只有死是头一回，这是人生大事，一定要认真对待之类的话。因为女儿也时常听见祖母的这种唠叨。光听了以后，对自己心中浮现出来的想法反复推敲琢磨——推敲的方式即使如同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捕捉不时冒出水面的水泡那样——并形成一句话藏在心里，而当感觉到分别的依依不舍时，不禁脱口而出。

残疾的孙子反复推敲的这句话给祖母增添了战胜疾病的力量。我也要牢记光的这句话，准备迎接自己即将来临的这一天。




# 残疾人十年活动



## 1

去年是联合国残疾人十年的最后一年。为残疾人举办各种活动，我也参加其中的几次会议。一方面是陪同残疾的长子参加活动，同时自己应邀去发表讲话也不下二三次。因为去年我想尽量参加这个主题的活动。

最近，邀请作家（小说家）演讲这种形式的活动在我国已经司空见惯，于是就有所谓中介机构的人打电话来约请。这些人一般都自称——使用外来语——“制作人”，而且说话的内

容也大体相似: 某月某日是否有空? 我们正在策划一个对谈节目……

我只要一接电话，如果对方是年轻女性，往往很难对付。虽然对方说的是“对谈节目”，但我会想起在美国短期访问时看到的深夜电视里那种充满种族偏见的逗乐节目。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我把这个意思告诉对方以后，曾经有一位周刊杂志的女主编立刻这样回答说: 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想创造一种文化讲演会的新形式。至于“对谈”的另一方，现在正在交涉。所以，得花费相当的时间才能不伤和气地把这件事推掉。

而且——这显然是属于老一代人的我的责任——我分不清楚这次打来电话的洋文名字的公司是否就是前几天打电话来的那家洋文名字的公司。如果说“前几天我已经说过了……”，又担心使得对方莫名其妙，可是交谈之后，对方说“您的回答还是和前一次一样”。

还有更挠头的事，对方问“是否有空”，我有时会无意识地回答“有空”。作家生活中，出门约会，或者去外国短期旅行，其实倒是例外。表面上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的日子才构筑起小说家的坚实基础。我作为专业作家，最珍惜这样的时光。前几天，我接到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 · 戈迪默女士的电话，去饭店见她时，她说:“我们的人生中，除了写小说，还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这句话引起我的共鸣，但也为这种无法获得的满足而叹息……

因此，只有我的尊敬的朋友、前辈的约请，或者给我出书的出版社的策划，我才同意去讲演。此外，我的习惯是: 让打来电话的人书面把讲演会的策划意图等有关情况告诉我，

然后再决定是否参加。

去年年底在堺市的演讲，属于上述情况中后者的成功例子。记得夏天开始的时候，有过一次电话，接着堺市残疾福利科的办事员M先生按照我的要求给我寄来一封信。我作为残疾儿的父亲，看了这封信，很受感动。现得到M的同意，抄录几段如下：

……呼吁身心残疾者“参与社会与平等”的联合国残疾人十年活动即将结束。那么，整个社会或者政府今后是否也和这十年一样继续对残疾人予以关怀呢？残疾人是否还是像以前那样仍然不被人们所关注呢？残疾人怀着期待与不安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的未来。

……在这十年里，当我开始意识到我们与残疾人共生的时候，通过残疾人的存在，反观出我们的人生观多么僵化狭隘，往往迷失“对生命的共同感觉”。大家都说“拒绝残疾人的社会是脆弱的社会”，在即将结束残疾人十年活动的时候，我想重新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如此脆弱？

M在信中还谈到对我参加康复专家上田敏教授主持的对话系列的《谈自立与共生》的感想。

……您谈到“接受残疾人是人类共同的课题”，我认为，这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课题，也同样是整个社会如何接受残疾人，并与之共生的课题。只有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共生，我们才能够肯定各种各样的生存形态，使自己多少获得自由，

**甚至成为产生先生所说的新人形象和文化的契机**

我看完这封信，深受感动，决定同意演讲，并且把演讲的题目《从共生中吸取力量》以及演讲的要点告诉他。后来又给他打了电话。于是，M 又给我来信，说道：

**从您提议的题目中，我思考吸取力量的两个主体。一个是与残疾人共同生活的家人、家庭以及周围的人们；另一个是抽象的，即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时代从与残疾人的共生中吸取力量。不知我的想法是否妥当？**

另外，M 希望我在演讲中谈一谈我与残疾儿的个人关系以及在小说创作上的反映。他说，演讲结束后，将放映描写残疾人与医生关系的电影《雷纳德的早晨》。这样安排的演讲会，使我产生喜悦的期望。我愉快地想像着在堺市举行的“残疾人之日·演讲与电影的集会”的情景。



## 2

我对M提出的问题进行一番思考，首先是拒绝残疾人的社会为什么是脆弱的？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一些观察谈论问题，但我认为，我曾短期生活过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社会可以作为接纳残疾人的社会典型。这所大学建在山坡

上，高度差距很大。各个高度区生长着不同的植物，其中包含许多澳大利亚原产的植物，令人觉得只有这种不同的高度才能使各种植物分布在一个校园里。虽然景色壮丽优美，却对残疾人很不方便。但是，我看到残疾人坐在带马达的轮椅上，在高高低低的校园山路上毫不畏惧地快速行驶。

我从伯克利分校的大学社会里发现一种坚韧的精神，如果拒绝接纳这些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者——他们将向何处去？恐怕有的只好终日关在家里，有的进入残疾人福利设施。

福利设施无疑是必要的，有的设施管理很好，具有作为社会接纳残疾人的预备组织的功能。残疾人能够在福利设施里愉快地生活，光这一点就显示着社会对福利设施支持的力量。这样的福利设施本身可以称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吧。

然而，以单纯地把残疾人与社会隔离开来为目的或者具有这种功能的福利设施曾经有过，现在依然存在。就是说，不能不承认，不少福利设施只是作为拒绝残疾人的社会的一种补充形式。

在疾病的痛苦折磨中完成伟大事业的已故美国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这样写道：以可怜悲悯的态度看待残疾儿童，必然导致把这些不幸的人们送到偏远的地方隔离起来的想法，我看见在他们的前头冒起奥斯威辛集中营焚烧犹太人的黑烟。

许多有着切身体验的残疾儿家庭的父母亲恐怕都认为这句话未必危言耸听。想到自己年老、最终就要死去的时候，不得不把残疾的孩子送进福利设施，即使知道有一些完全自由的开放性的设施的例子，但我们心里难道就不担心吗？

现在回到家庭的角度来考虑，关于拒绝残疾人的社会问题，可以通过一个典型的例子进行具体的想像。如果我的家庭没有残疾长子这个不可缺少的成员共同构筑日常生活，那将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不得不想像那是一个冰冷淡漠、没有生气的家庭。如果没有长子，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恐怕也是很脆弱的。我们的家庭难道不也是一个脆弱的家庭吗？包括长子在内的全家人无法顶住一些困难——例如岳母逐渐显示出老年人的精力衰退——造成的压力。由于家庭成员中有一个是残疾人，其他人都想方设法照顾这弱小的成员。例如光的妹妹，长期以来，她千方百计地鼓励哥哥，提高他的信心。她上大学的时候还参加学校的助残志愿者小组活动。另外，我在别的文章里已经写过，星期天早晨，她接到残疾人打来的电话，希望她前去照顾，这个时候，我在一旁，虽然嘴里不说，心里却希望她婉拒对方，留在哥哥身边……

她通过助残志愿者活动，积累经验，不仅大大增加了护理哥哥的知识，而且具有系统性。另外，她还学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哥哥说必要的话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她能够把家庭内的残疾哥哥摆在社会中的残疾人一员的位置上来看待。至今我还想起十几年前她以幼稚的方式鼓励哥哥出去散步时兄妹两个的形象，然而，她现在对待哥哥已经是一个成年女性了，这与昔日的少女形象毫无矛盾……



3

M在信中还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对接受残疾人的“接受”一词的解释。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我是根据上田敏教授在《思考康复——关于残疾人恢复正常人生活》一书中的定义才使用这个词语的。因事故而残疾的“冲击期”，相信残疾将会消失、否认残疾会永远留在自己身上的“否认期”，还有不得不明确承认残疾这个现实的“混乱期”，接着是克服这个过程准备面对残疾的“努力解决期”，最后是“接受期”，接受自己是残疾人这个现实，紧紧把握自己对家庭、社会所发挥的作用。

所以，这个词语应该比社会或者构成社会的健康者接受残疾人这层含义的“接受”具有更积极的强烈的含义。

但是，在我以写演讲笔记的方式回答M信中问题的时候，觉得如果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社会对残疾人的接受与残疾人对自身的接受在本质上有相同之处。如果从家庭是社会的缩影这个角度来看，就更容易理解。

应该积极地把残疾儿童接纳在家庭里，应该努力把有残疾人的家庭生活方式作为今后的生存基本形式。这样，残疾人的家庭在地区社会里将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或许最终会向社会发出的这样信息：这不就是接受残疾人的家庭吗？进一步说，接受残疾人的社会这个形象不是也变得十分鲜明吗？


1991 Yukari Oe

4 

我在堺市演讲的那天，在饭店里很早醒来，打开电视机，正在播放住在四国松山福利设施里的残疾青年希望在印刷厂工作，自己在市内寻找住房的记录片。这位残疾青年非常积极地准备自立。而陪伴在他的轮椅旁，熟练地测算台阶的高度，判断轮椅能否上去，并且把情况告诉他的是一位已经自立的、年龄较大的残疾人。电视记录片还出现租赁房屋中介机构的姑娘与残疾青年就租房条件坦率交谈的镜头。实在是一部很生动的好片子。

然而，使我深有感触的是，自己熟悉的松山街道今天出现许多残疾青年的轮椅，从一个新角度来看，的确大为改观。我的印象是不仅街道的景物，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和蔼可亲。于是，我感觉到，与其说社会接纳残疾人，不如说残疾人正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接纳这个社会，这就是他们的自立。

堺市的会场上来了许多残疾人以及照顾他们的父母亲。我和妻子外出时，如果找不到合适人陪同光留在家里，也经常这样带着他3个人一起出门。我怀着亲切的思念，觉得从根本上获得力量，走上讲台。



崛田先生赠送的礼物：刺猬、巴厘岛的青蛙、俄罗斯的木偶。



# 优情（一）



## 1

一般地说，小说家不要创造从未有过的新词汇。诗人则另当别论，他们是语言新领域的开拓者。他们创造的新词汇被社会接受以后，小说家才可以使用。

但是，我把几个特殊的词汇，连同创造这些词汇的小说家的形象一起，藏在心底，并且有时也十分谨慎地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

其中一个词就是“优情”。这个词大概可以理解为“富有

人情味的温柔之情”，虽然与“友情”、“有情”不尽相同，却又有相同之处。也许先前已由几位语言开拓者在日语文脉中使用过这个词。但是，我在文章中使用这个词语时，心里想的这是堀田善卫先生的造语。

对于堀田作品的热心读者来说没有这个必要，但我觉得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先介绍一下他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为好。为纪念堀田先生作家生活50周年，筑摩书房将要第二次出版他的全集。我记得在他的全集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就写过一篇与“优情”有关的文章，所以很早以前就把这个词与堀田联系在一起。

这次我看了堀田全集的样书后，写了一篇题为《如果戈雅描绘温柔的巨人》的文章。这是我现在——而且永不改变——对作家堀田善卫的印象。

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老旧的学校宿舍里的那一年，经常想起堀田先生。宿舍旁边有一棵巨大的橡树，主干粗壮刚直，枝干遒劲伸张，庞大的树根在黑暗的地下盘结纠缠，不知伸展得多深多广。然而，只有那一树茂密葳蕤的绿叶才使我想起堀田诗人的面容。

南非女作家这样描写堀田："不是文学家的主题选择他，而是他被时代意识所选择，他参加艺术题材的表现方法。”这是多么惟妙惟肖的堀田善卫的形象啊。她还写道："文学家通过自己的全部作品讲述如何理解人生的长篇故事”。堀田在日本的中世纪、西欧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戈雅时代的历史以及超越历史的世界里漫步走来，讲述人生的故事。堀田本

人起始于中国、横穿日本的痛苦而充实的人生故事在小说里更加深刻而厚重。

现在堀田的文体已成为最精炼优美的音乐。不可思议的巨人，而且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巨人，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堀田说到“优情”的时候，肯定说的是“温柔的感情”，而且我觉得应该是指男性的温柔。当然，我这么说，丝毫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只是单纯地将其作为把“温柔”分为两种类型的符号。

有的杰出的女性使人感觉到她的温柔是男性的“温柔”。例如中野重治在患病至临死之前撰写的始于青春时代的回忆录《夏天的书签》中，就说佐多稻子女士表现出男性的温柔。我把佐多女士视为“优情”的人。

堀田本人就是“优情”的人。我曾经和这位大作家一起去印度、乌兹别克斯坦、泰国旅行，从来不觉得他的温柔显得黏黏糊糊。他的为人本质上的严厉与这种“优情”融于一心。我所说的并非那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传统美德。不论对己对人，严厉难道不是“优情”的基础吗？正因为有了“优情”，无论对人多么严厉，都不会变得残酷。



## 2

二十年前，我和堀田先生一起去印度旅行的时候，住在贝拿勒斯的英国风格的饭店里。大高个的男侍者威风凛凛地端来用保温布覆盖着的红茶器具。我先前从未见过那样的红茶，以后也再没有看见。

堀田小时候曾被寄养在外国牧师家里——牧师夫人似乎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所以他的生活离不开英语。在外旅行时，也经常收听BBC的对外广播。我正躺在床上一边阅读泰戈尔的英文诗集，一边喝着满满一壶的红茶，堀田从他的房间里打来电话，说：

“广播里说，三岛君闯进自卫队的司令部，剖腹自杀。好吧，吃晚饭见。”

我慌忙拧开收音机调整波段，心想堀田怎么这么平静冷淡。但是，傍晚当我走进面对着榕树的宽阔风景的餐厅时，只见堀田已坐在里面。他身穿深蓝色西服，系着黑领带。我把这种人生最本质的东西称为“优情”。

堀田长期居住在西班牙，回国后不久，送给我一个巴塞罗那的特产陶器。现在出国旅行成为很普通的乐趣——当然，无疑有的国外旅行会成为铭刻在人生中的美好体验——谁都知道，旅游纪念品最难带的就是又重又易碎、不大不小的陶器。然而，堀田夫妇竟然把陶器作为纪念品带回来。

这是一个陶器刺猬，整个身体呈褐色，白色的鼻子像是陷在身子里，鼻尖和眼睛是黑色的。身上的刺像是插着一根根圆

木棍，如大波浪型烫发的发型感觉。刺猬很矮，却沉甸甸的。堀田附来的纸条上写着："好像你练习书法，且作镇纸吧。"

我把这个陶器刺猬摆放在书桌前面的架子上，这样每天都和它见面。我一边看着它一边构思文章，前些日子的目录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那褐色与白色构成稳重幽默感的刺猬，使我经常想起"优情"这个词。

现在，我甚至感觉到自己发现这个陶器刺猬与堀田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家族的血缘关系。想像一下当年堀田在西班牙的生产陶器的城市街道上突然停下脚步，伸手取过这个陶器刺猬的情景，我把它与作家进行这种联系的感觉，也许并非什么奇思怪想吧。



3

我之所以对堀田善卫先生送给我的西班牙纪念品及其造语"优情"写了这么长的文章，是因为我还想借此对摆在我书桌前面的长约一米、宽约三十厘米的架子上的东西生发出各种小小的回忆。我觉得不仅陶器刺猬，其他每一样东西都能与我所到各国旅行的独特"优情"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同时其中几个别人送给我的旅行纪念品也使我想起他们的"优情"……

架子上的小东西里，最容易损坏的就是那个长约六厘米的玩具青蛙。这个乐器实际上已经损坏，青蛙脑袋是用黏土烧成的，身体是纸糊的共鸣箱。这是我在婆罗浮屠古迹前面的地摊

上购买的。

我四十刚过不久，与朋友一起去巴厘岛旅行。由日本航空公司招待，像是修学旅行。同行者中有一位N先生，与我大概是同一届的东京大学毕业生。他毕业于教养专业，当时这个专业刚刚成立，后来培养出不少人才，他正是在多方面都具有个性的人才之一。

他毕业后进入日本航空公司工作，曾经翻译出版苔塞朱“我知道什么”文库的《民航概论》一书，担任日航雅典分社社长的时候，曾推动在拉夫卡迪奥·赫恩（日文名字叫小泉八云）的出生地建立纪念碑的计划。他不只是埋头于本职工作，还译过苔塞朱文库出版的关于作曲家肖松的书籍。

N先生提出一项计划，由日航资助机票，邀请一些东京大学的校友，现在是日本的法国文学教授、电影导演等不同领域的学者、艺术家到某个地方探讨该地有关情况，问我是否愿意去该地旅行一趟。于是，在岩波书店的关照下召开过气氛轻松的研究会的我们这些人，都表示愿意参加。

一行中有哲学领域的中村雄二郎，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山口昌男，建筑领域的原广司，戏剧、小说领域的井上厦，法国文学领域的清水彻、渡边守章，英国文学领域的高桥康也，电影领域的吉田喜重等优秀人物。

但是，我在这次旅行中发生一件有点哭笑不得的事。当时我的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刚刚脱稿，打算约时间交给出版社，同时又要准备去巴厘岛。每次这样忙碌的时候出门旅行，都是妻子为我准备行装。这次也不例外，我只是把几本书塞进旅行包里，就直奔成田机场。

到了雅加达，住进饭店。我看见饭店大厅的书店里有研究巴厘岛的英文书籍，于是首先想到把日元兑换成美元，结果发现妻子——她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慢慢地为我准备行装——忘了把钱装在我的旅行包里。幸亏出发的前一天我在电视台和一位来自美国的作家对谈，装有酬金的信封夹在我正在阅读的一本书里。

日航只给我们提供机票，其他食宿等一切费用自然自理。我在电视台对谈的酬金蜒那个美国作家的酬金和我的一样，但他苦笑着说："听说日本人很谦虚……"——大概能对付这次旅途的花销，所以对我来说实在是及时雨……

这次旅行，我只在住宿的第一家饭店买过书，此后对所有的商店都不感兴趣，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也只是在饭店的游泳池里游泳，连附近的小卖部也不逛。一同旅行的人是否因此觉得我是个"禁欲主义者"呢？本来我们这些人在晚上也都是愉快地议论探讨，谁也没有打算享受那些异国女性的服务，所以在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听说当地旅行社的导游说原先以为我们是一伙同性恋者哩……

我在巴厘岛的旅行中，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当地所有的村子都有三座寺院，形成一组。我在其中一座称为"死亡寺院"的布拉·达列姆寺看见一个姑娘。布拉·达列姆寺的守护神是魔女兰达，起先以为这是附在人体上为非作歹的恶神，其实是使用魔法治病的好神。

雨后的黄昏，寺院里弥漫着肃穆神秘的气氛。我从侧面看过去，只见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的陪同下，离开人群，跪在边儿上，虔诚地祈祷。我离开寺院后、发现笔

记本忘在寺院里，又返回去。这时，她和弟弟妹妹站起来走过来，我一下子看见她刚才一直故意不让我看的另外半边侧面。那半边脸颊的肌肉异常扭曲，惨不忍睹，简直令我震骇惊栗。

她的面部缺陷大概是天生的，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下，一直在这座寺院祈求魔女兰达治愈。我不禁深为感动，同时想起光。如果光是巴厘岛的农民的孩子，为了治愈天生的弱智残疾，不是也像这个姑娘一样，每天傍晚由弟弟妹妹陪着到魔女兰达的寺院祈祷吗？这平静虔诚的祈祷难道不就是自己每天的乐事吗？即使残疾永远留在身上……

这次旅行的费用实在是精打细算，买回来惟一的纪念品就是这只玩具青蛙。青蛙全身涂着橘黄色，银色的线条描出眼睛和嘴巴，黏土烧制的脑袋，纸做的身子，一提起来，发出呱呱的叫声。那声音和在印度尼西亚的水田、河边听到的青蛙叫声简直一模一样。

从婆罗浮屠佛教古迹下来，广场上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卖玩具的地摊。我发现玩具青蛙格外多，不由地停下脚步。身穿爪哇印花布长袖衬衫的中年男子摊主拿起一只青蛙鸣叫着，向我兜售。

我发现从他的袖口露出来的左手上长有小爪般的第六个手指。就是说，这个身有缺陷的男人，是否仅仅因为左手六指，就能在印尼这个著名的观光旅游地确保一个条件优越的摊位呢？

如果我的想像正确的话，光要是生在爪哇岛，也会由于自己的残疾而获得这样生活的条件吧。想到这里，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四国老家的小村子里，各种残疾人也都得到各自适当的

生活安排，心情愉快地和村里人共同生活。我站在罗望子树的树阴下，回忆起这些往事，备感亲切，不觉心情激动……

那么，这个玩具青蛙在我的心里又是如何与“优情”联系在一起的呢？那个六指男人之所以能够得到阳光普照的广场上最好位置的摊位，正是其他冷若冰霜般的摊主对他显示的“优情”。



# 优情「二」〇

 1

摆放在我书桌前面架子上的各种小摆设中，个子最大的要数瑞典的陶器马。那是在瑞典历史悠久的著名港口城市约特波里，在洋溢着欢乐气氛的晚宴结束以后，大概我也正陶醉在愉悦之中，于是接受了这个礼物——否则，我想会表示婉拒的，只是心领其好意。在斯德哥尔摩的饭店以及机场的小卖部里都摆着这种陶器马，看来是该国的名产。但是，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所说，带着这么大的陶器旅行实在很不方便，所以大概

我从来没有买过。深蓝色的马身上描绘着红色和白色的斑纹。

晚宴在约特波里郊外的住宅举行，当我辞行即将上车之际，C.L夫人跑出门外，把这匹马送给我。我抱着它坐进车里，仿佛觉得能就这样抱回东京去。现在，这匹马英姿飒爽地站在桌子上。妻子说："自从这匹马进家门以后，家里好事不断，比如光的CD创作成功，这是家里人谁也没有料到的。"

一九九二年秋天，应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我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进行巡回讲演，第一站就是瑞典，然后是丹麦、芬兰。另外，我对从苏联独立出来以后的波罗的海三国的发展方向也很关心，尤其对爱沙尼亚甚感兴趣。

第一场演讲在约特波里市书展期间举行。从旁支持我的旅瑞日本妇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把我的《M/T和森林的神奇故事》译成瑞典文的两位日本妇女和当地的新闻记者结婚并生有女儿，拥有一个充实稳定、富有知识修养的美满家庭。参加晚宴的十几个同样与瑞典人组织家庭的日本女性也给我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

瑞典的庭园到处可见结着许多红色饱满果实的日本花椒。在同样种植着高大繁茂的日本花椒树的住宅里，我受到醋渍鲑鱼和煮小龙虾等美味佳肴的款待。然后和她们聊天，我觉得，这些稳重冷静中透着忧郁、却又意见中肯的日本女性所组成了如此高品位的团体，和她们进行这样心情愉快的谈话，在人的一生中实不多得。C.L夫人的丈夫是一位标准的北欧型美男子，在约特波里港务部门担任要职。从这个家庭里，我具体感觉到，与担任要职的丈夫共同生活的夫人，在家庭里的地位也相应很高。

C.L夫人是参加晚宴的日本妇女的代表,她的印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她们的思维方式、感受方式、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呢？从我回国后收到的C.L夫人的来信中可以了解一二。

十月上旬，第一场雪落在红叶似火的树枝上，冬天迅速来临……

瑞典社会正遭受经济萧条的寒风的强烈袭击。瑞典人引以自豪的沃尔沃汽车公司已经解雇了四千人，每天都是削减医院、学校、幼儿园数量以及失业、种族歧视、难民问题等坏消息。

我仿佛觉得过去三十年连身体健壮的人都浸泡在暖和温泉里(安逸于舒适生活的现状)一样的社会主义生活一下子颠倒过来。我工作的幼儿园也有6个人已被解雇。是政府发给我们临时补贴，建议我们承包幼儿园，改为私立幼儿园。“私立”意味着赢利。于是职工分成两派，一派赞成，一派反对，闹得一团糟。

我坚决不和不明白“私立”含义的瑞典人共同经营幼儿园，所以是反对派。恐怕明年一切都会更加严峻，但我坚信，全国人民一定会认真思考，共同渡过这次危机。

上面我说这些日本女性“稳重冷静中透着忧郁”，读者大概能理解其中的含义了吧?

离开瑞典那一天，我很早起床，写了一篇准备在C.L夫人等编辑的旅瑞日本人联合会的会报《Hashi》上发表的短文。现抄录如下：

……回到日本以后，又重新开始每天身心疲惫的忙碌生活。在离开约特波里的今天早晨，我眺望着窗外静悄悄的细雨濡湿的七叶树，写下这篇短文。

在这篇文章里，我决定不一一列举给予我诸多关照的各位朋友的名字，因为我对生活在瑞典这个充满独特的沉着与自信的社会里的人们、尤其日本女性都具有共同的深刻印象。

高水平生活所产生的多种含义的丰富、个性鲜明的生活方式、深思熟虑的见解、与具有知识修养的瑞典人的丈夫形成的令人尊敬的良好关系、具有独立能力的天真可爱的孩子……

一想到这些日本女性融入瑞典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积极人生，就觉得这才是对现在国际社会上“敲打日本人”行为最有力的回答。与外国人组成家庭，并侨居国外的人，显示出如此从容不迫、生机勃勃、充满自信的生活，这就使人感觉到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我平时很少考虑这些，所以对自己在此地的感觉感到吃惊。我也明白，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经受过漫长黑暗的严冬考验造就这些人们、尤其女性的精神……

看过《Hashi》，其中几位朋友的形象描写十分幽默，虽然这些都是刚刚认识的朋友，我却已经感受到亲切怀念的乐趣。另外，一位朋友的女儿以瑞典人敏锐的眼光观察日本人的一篇东京见闻也很吸引我，因为我也从翻译我的小说的年轻姑娘身上看到同样优秀的瑞典人。也许这里寄托着日本人对朋友们最明亮充实的幸福吧。我怀着感谢之情向朋友们表示祝福。

 2

还有一件东西长期摆放在我的书桌上，就是法国文学研究家渡边一夫教授亲手制作的城堡模型，我视之为珍宝。从所附的《缘起》一文的日期来看，当时先生六十九岁。那一年，筑摩书房出齐先生的全集。我和我的前辈二宫敬先生都参加该书的编辑工作。为纪念全集的出版，渡边一夫先生用凿子在石板上雕刻城堡，然后施彩抹色而成。欧洲风格的城堡整体呈白色，配以淡茶色的圆锥形塔，还描绘美丽的盾形徽章，写有“Manoir du Grand-Duc OE en Utopie”。以下是《缘起》中的一段话。

Grand-Duc 可称为太守亦可称为大公，无可有国之太守大公比尧舜有过之而无不及，故称为大江太守，应毫无所惧。

旗帜之一仅为 OE 二字组成。

旗帜之二之蓝白二色深有用意。典故出自 F.拉伯雷想像中的卡冈都亚国王的家徽的颜色，蓝色代表天空，威严神圣；白色代表欢乐喜悦。(《巨人传》第十章)

大江太守之盾型徽章乃模仿法兰西斯一世之家徽，中间乃红色烈焰，泰然雄踞其中者乃不惧任何劫火之食火灵兽萨拉曼特(Salamandre)。法兰西斯一世喜爱此灵兽图案，在其宫殿、居所雕刻装饰。徽章之术语将包围萨拉曼特之火焰称为 Patience（忍耐、忍受痛苦），语义含蓄深刻。

Nutrisco et Exstinguo 亦为法兰西斯一世之格言，不言而

喻，此乃与萨拉曼特之天性结合之意，然亦隐藏昔日王公贵族之野心。可直译为“吾养之，吾亦灭之”。然根据大江太守之高尚情操与深谋远虑，亦可解释为扶正祛邪。

 3

重读此文，不禁感慨系之。从中发现先前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先生对我的关怀。光出生的时候发现后脑长有一个大肿瘤，用急救车将他送往日本大学附属板桥医院治疗。先生新近开设有法国文学课的立教大学就在医院附近。我每天去医院的特殊病房探视孩子——其实与探视病人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一天，探视完孩子以后，决定去立教大学的法国文学研究室拜访先生。

先生情绪很好——也许是装做情绪很好的样子。他兴高采烈地说：“在东京大学里没有自己的单独房间，立教大学给了我这一间。”——那种洋洋得意的样子显然是装出来的。他还故意摇了摇坐着的温莎椅，不过因为空间窄小，椅背碰到桌角上。

我像年幼的孩子对父母亲诉说心中的苦楚似的，把儿子出生时的残疾情况告诉他，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会使先生可能陷入忧伤。然而，先生听着我的话，不仅姿势优雅的侧面脸庞，而且连脖子也逐渐红起来。当时的景象使我终身难忘。

我以光的出生作为素材创作小说《个人的体验》，主人公



'93 Yukari Ōe

瑞典木马

起先想逃避孩子，经过曲折的思想斗争，终于决心与将会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我考虑以“忍耐”这个词作为主人公人生的根本信念……

先生在送给我的城堡模型的《缘起》中，把盾型徽章里的火焰解释为Patience（忍耐、忍受痛苦）。我奇怪自己怎么就没有把先生的用意与我的小说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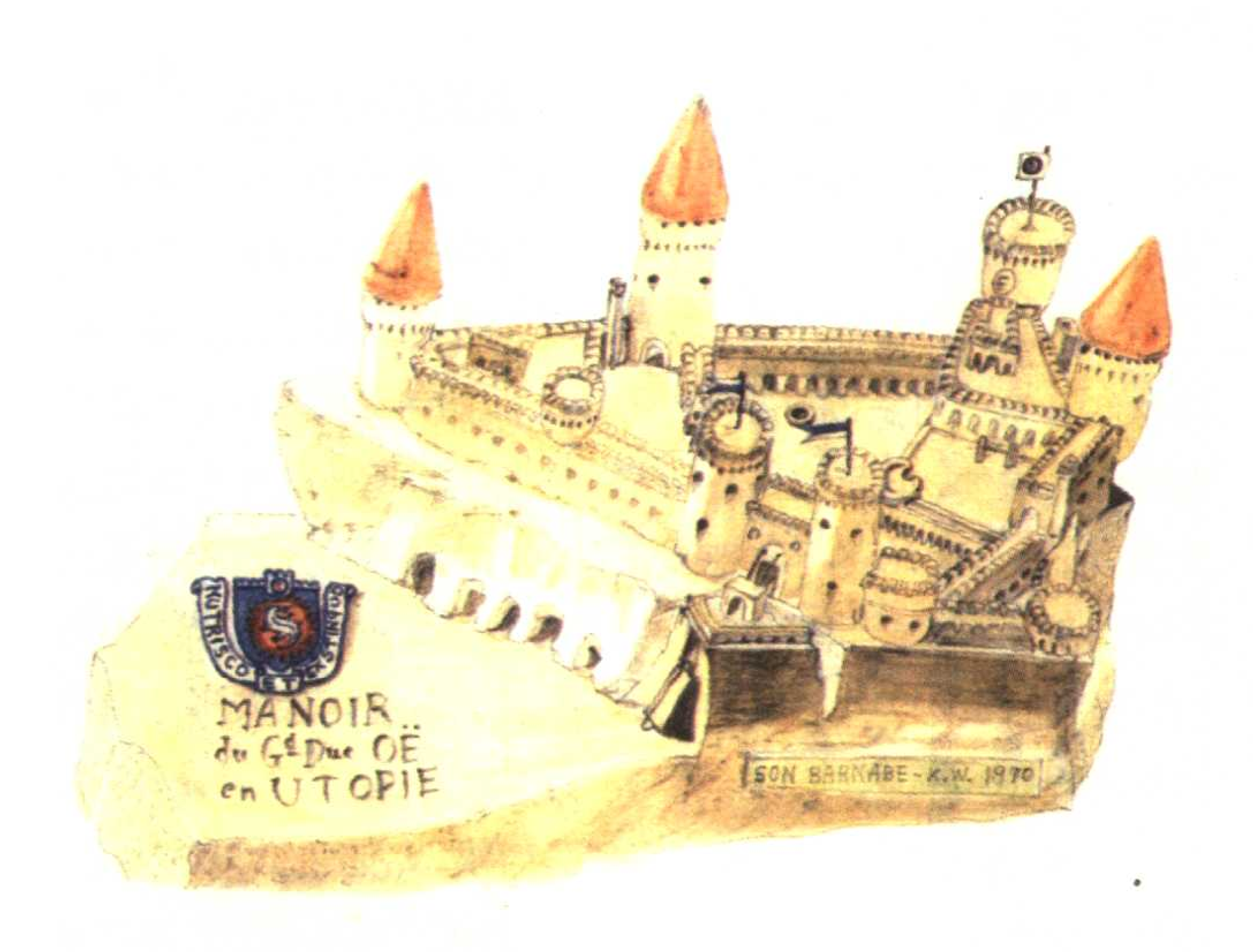
现在重新端详这个城堡模型，发现城堡背面下方，特地凿有一个小孔，贴着一张小纸，上写“出逃口”三个字。看了以后，我不禁心情难过。其实，这个小孔，与其说是“出逃口”，不如说与纸上的这三个字很适合。渡边先生在与同样是法国文学科毕业的前辈作家对谈中，谈到城堡与小孔时说：

“因为我觉得他那样的人大概也需要‘出逃口’吧。”

当时，我正从事几项与归还冲绳行政权有关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和大田昌秀先生蠖现在他是冲绳县知事，作为学者，他诚实地信守自己的信条；作为组织者，他具有卓越的工作能力———起编辑《冲绳经验》。我在这个刊物每一期上都发表文章，其中引用一位冲绳出身的人的语录。这些话包含有对天皇家族的直接攻击，我从那歇斯底里般扭曲心态里，看到冲绳本土最底层生活的弱者的悲愤。

《冲绳经验》每一期的封面都由渡边先生设计。我的这一篇文章发表以后，收到先生用法语写的信，记得其中引用一句意为“不想真做，不如不做”的法国成语严厉批评我。

我深深感受到先生用法语写那封信的良苦用心。优秀的日本史学者、在瑞士动乱时作为加拿大代表出色地完成任务，却在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下自杀的哈佛·诺曼先生是渡边先生的挚




渡边一夫先生的城堡

友。

我曾看过渡边先生写给诺曼先生信的草稿，充满着甚至可以说是激烈的强烈挚爱之情。就渡边先生的极其谨慎的性格而言，他用日语写信，恐怕总是一种带有自我抑制的行为吧？当先生直截了当地表现强烈的爱憎感情时，使用流利精湛的法语也许最为妥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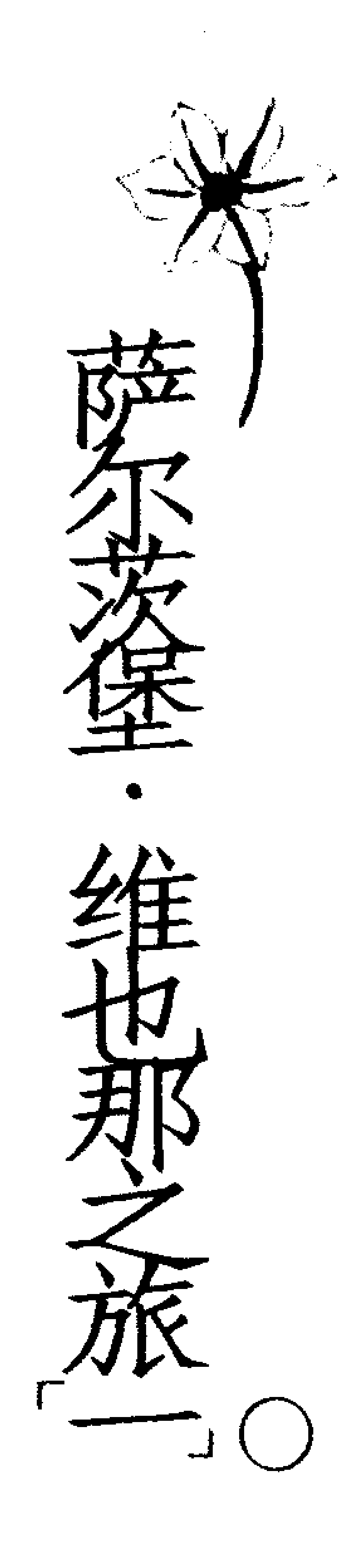
当我收到先生的这封信时，正和我收到城堡模型时一样，我明白这是先生提醒我在社会上一定要小心谨慎。我端详着小孔和写着“出逃口”的小纸，心里感激先生对我的关怀……

现在，光就要三十岁，我和他共同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视为这是先生对我的整个人生的教导，如何对待政治、社会的态度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更深刻更重要的是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一方面始终不渝地坚定自己的人生态度，但如果遭受压迫挫折，不要就此丧失信心，一蹶不振，应该具有从“出逃口”逃脱的勇气，然后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年轻人不是更应该如此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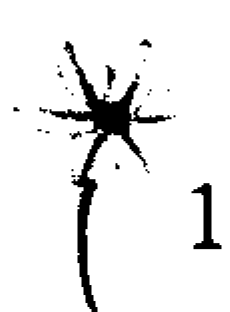
先生为我制作这个城堡模型的时候，离他去世只有十年。我感受到他的人生态度的博大高尚。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造一座“城堡”传给后代。



'93 Yukari



# 萨尔茨堡·维也那之旅（一）



## 1

一九九三年秋，德国柏林歌剧团来日本公演的时候，我为其演出节目单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现在先把这篇文章抄录下来，然后再谈论我的旅行。因为这篇文章直接表达我们一家人的感激之情。

**我从年轻时候起一直听瓦格纳的音乐，但感觉到有一堵墙壁使自己无法融化进去。觉得这似乎与三岛由纪夫对瓦格纳的**

礼赞有关。不过，在欧洲的剧场欣赏瓦格纳的歌剧的梦想不知不觉地在我的心中逐渐强烈起来。

去年秋天，原本只是作为家庭的一种乐趣而自费出版的光的作曲集终于制作成CD《大江光的音乐》。我的一位真挚的朋友听了这盘CD以后，邀请光和我们夫妇一起到欧洲旅行，目的就是听音乐。

我对此表示感谢，但不打算接受。因为我没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在光的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休息日里，一家人听光的CD。光也想以此让家里人得到愉快，然而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也活了三十年，但总共只有四十七分五十三秒的音乐。"

于是，我和妻子决定带着光去他一生中惟一一次的欧洲旅行。

从今年年初开始，我参加策划"音乐伴奏老朋友谈话"这样的活动。其中之一是英国文学研究家高桥康也先生谈论瓦格纳和道兰德，他把在国家与时代方面的距离都难以结合的这两个人物极其巧妙地联系在一起。高桥演讲的主题是爱与死，尤其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激烈的爱与高兴的死结合在一起，以"爱死"这个造语进行思考……

我一边听着女高音和男高音的独唱以及二重唱，一边思考，到我们这个年龄，虽然每天都会想到死，而对于爱，不过已经成为遥远往昔的回忆。然而，在人生临近终结的时候，在神秘的心灵深处，不是曾经有过爱与死的理念紧紧纠缠着重新唤醒的体验吗？我感到恐惧战栗。

无疑只有在瓦格纳音乐的磁力吸引下，自己才产生这种平时没有的深刻感受。而且我与家人在从萨尔茨堡到维也纳的旅

行中，又一次坚定了自己的这种想法。虽然一路上一直沉浸在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里，但主人还是为我们安排了在维也纳国立剧场演出的《尼伯龙根指环》。

这出歌剧的演出时间是五个小时，我和妻子担心残疾的儿子光能否坚持下来。但是，光对尤其是布吕西尔蒂以整个灵与肉迸发出来的最出色的咏唱听得如痴如醉。

我一边陶醉于优美的音乐，一边联想光所经历的各种事情。例如在歌剧接近尾声时，哈根把酒杯递给吉库弗鲁特，别有用心地问道："听说您听得懂鸟的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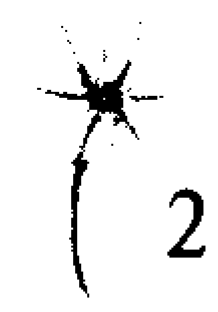
天真的——我想这样看待他——回答说："已经很久没有注意听鸟的叫声了……"

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已经说过，光生下来以后四五年里不会说话，于是一直让他听近百种鸟叫的声音，终于说出第一句具有明确意思的话："这是——秧鸡。"从此以后，他开始慢慢地摸索着和我们进行交流，很快走进音乐的道路。音乐终于成为他生活的中心，把鸟的叫声忘得一干二净。然而，这些鸟的声音不是把他与瓦格纳——光正对他的音乐听得入迷——紧密联系在一起吗？

长期以来，我是在经受着欧洲文化的压力下理解瓦格纳的，所以无法像光呼吸音乐那样自由自在地倾听。但是那天晚上，我完全沉浸在瓦格纳的——借用高桥的话说，就是"爱死"的——炽烈燃烧的火焰般的情节之中，不由自主地连声感叹，逐渐产生与光同样的感受。

在旅行的最后日程里，我们参观巴黎的奥尔塞美术馆。我仿佛事先约定见面似的，径直朝先前一直疏忽的雷诺阿创作的

**瓦格纳肖像画奔去。虽然轮廓线条粗犷，但从那明亮的、充满无限温情的蓝眼睛里，我仿佛在这一次旅行中第一次见到亲切而熟悉的瓦格纳。**



2

我和妻子带着光一起去欧洲旅行。这是十年里我们家最大的一件事，目光放远些，也许说是二十年更为妥当。这次旅行能够成行，起因是光的CD的出版发行，因此受到邀请，同时另外还有几件是偶然地——其实也是必然地——凑到一起。人过五十，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对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重合怀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啊……

主要一件事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岳母，几年前曾摔倒骨折，这次又发生大腿骨尖折断的事故，她正在住院。但是，可以让正在大学农学系读书的次子和已经大学毕业留校在图书馆工作的长女看家。

当然不能把年逾九十、智力开始衰退的岳母白天一个人放在家里。她的骨折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住在医院里，雇人照看，这对我们来说是惟一可以离家出门旅行的机会。

另外还有自己的工作安排、妻子身体状况等因素，这些都一一解决以后，开始商量具体日程，却又担心光能否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能否适应近3个星期的外国饭店的生活。

光在十岁以前，妻子经常带着他乘坐飞机或电车回关西的

娘家。这已经是近二十年前的事。那个时候，岳母身体还很健康。她是多么热情亲切地疼爱光啊。而妻子的体力——也许甚至可以说是臂力——可以控制光，所以带他坐车上街都很有把握。

过了五六年，显然光开始有意识地配合大人对他的搀扶，所以他的行为能够控制。只是偶尔反抗的时候，妻子无法用体力使他服从自己的意志。加上光一旦癫痫病发作，例如在街上要使劲支撑他不让他倒下去，对于妻子来说，实在力不从心。我想再补充一句：光有时候不听母亲的话，有时候依仗自己身体的优势欺负弟弟妹妹。我把这一段时期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新人哟，醒来吧》系列小说，尤其第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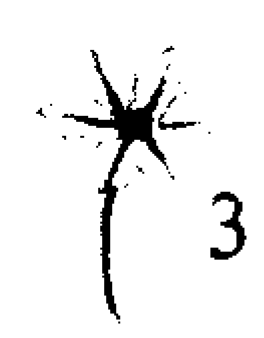
但是，对于光来说，他推搡自己最喜欢的妹妹，也是因为自己的身心感觉痛苦而无法忍受的缘故。而一旦痛苦过去，他对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内疚，终日垂头丧气。于是受害者的妹妹反而和家里人一起鼓励他精神振作起来。

一位在社会活动中也很著名的天主教牧师大概浏览过我以光的上述情况为题材写的小说，或者听别人说过光的一些事情，就把光的这些情况作为他演讲的素材，而且真名实姓地写进书里。一位天主教修女把这本书送给我，我们全家看了以后，我和妻子、女儿都觉得心情沉重。因为书里津津乐道地描写光手拿木棒殴打朋友，然后受到宗教式的训诫。

一个残疾的孩子，在他的身心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时，一时冲动，发泄在弟弟妹妹身上。也许当时他认为，这种事发生在家里会得到宽容谅解。正因为如此，过后他一直为自己的行为羞耻悔恨。我们一家人也一直认为，这只是家庭内的

“自找苦吃”，对他既生气又谅解，同时也自感羞愧。

这与在家庭外面用木棒（！）殴打同样是残疾人的朋友这种野蛮行径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这位圣职世界里的重要人物居然连判断这么一点区别的能力都没有……



3

于是，我怀着巨大的期望和同样巨大的不安——据妻子说，我显得比平常任何一次旅行都没有过的激动兴奋——光显得比平常更加冷静沉着，妻子与平时没什么变化，一家人出发前往欧洲。这是六月九日的早晨，细雨蒙蒙，恰巧这一天国内发生一件大事。

我们坐在瑞士航空公司的喷气式大型客机的坐位上时，我和妻子想起经常带着光在国内旅行的情景，不禁感到亲切。光小时候，不论是电车还是飞机，只要一坐在坐位上，就姿势端正，一路上老老实实，绝不乱走乱动。对他来说，上厕所是一件最为重要的工作，一旦下决心从坐位上站起来，就直奔厕所，如同要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所以，只要一上交通工具，他首先就认好厕所的位置，正如我们一进饭店，就要确认万一发生火灾时逃命的太平门的位置一样……

坐进飞往欧洲的飞机里以后，他也是如此，先认好厕所的位置，然后系好安全带——从身体状况来说，他即将三十岁——便一动不动地坐着，如同一尊塑像。飞机进入水平飞行状

态后，在愉快的气氛中慢慢品尝飞机内的饭菜。我看光从荞麦面薄煎饼、鱼籽酱、鲑鱼的凉菜开始就吃得津津有味……

一会儿，机舱内灯光熄灭，开始放电影，光躺在放倒的椅子上，似乎已经入睡。起先我坐在靠窗的坐位上，光坐在我旁边，但是他把红茶洒在坐位上，幸好过道那边的坐位上没有别的乘客，于是我让光坐在我的坐位上，自己坐到过道那边的坐位上。这顿饭吃得心情愉快，也因为给我们端饭添菜的那位讲着一口亲切轻松法语的服务班长和蔼地同意我们这样换坐位。

我一直看书，电影结束以后，机舱内十分安静，坐在前面的妻子——由于出发之前紧张的准备工作——疲倦得睡着了。我突然发现光虽然一动不动，其实并没有睡觉。按说他肯定不会意识到一生中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旅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与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组织的乘坐观光车去外地住宿训练时心情紧张的程度应该没什么两样。

光落坐以后，立刻戴上耳机，把播放的音乐调到古典音乐频道，宁静地倾听。他把眼罩拉到下巴、喉咙这块地方，睁着一双机灵的乌黑的大眼睛。整个姿势简直就像一幅画……

古典音乐是光的生活乐趣。不论什么场合，只要有机会听到古典音乐，就绝不放过，可以说是不听不行。但是，这种习惯在各种场合也略有不同。恐怕这不能说是仅仅出于好奇心，因为他在吃饭的时候一直倾听环形磁带里的音乐，其实已经从头到尾听过一两遍了。

这次临出发前几天，光并没有兴趣查看地图，或者欣赏即将住宿的饭店的照片，而是聚精会神地研究最后顺路前往巴黎时安排的音乐日程。他显得悠然自得，丝毫没有激动不安的样

子。但是，父母亲忐忑不安的情绪几乎无意识地传递到他的内心深处。另外，他心底其实也有同样的不安，所以在飞往欧洲的大型客机里，夜间，他睁着眼睛，凝视昏暗的空间，面对即将体验的有生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尽管并非完全有意识地——依靠一直支持自己人生的音乐来安慰心灵。

光在听音乐的时候，我的妻子有时都觉得他已经进入某种深层的理智的境界——已经超越我们在他小时候能够伸手可及的境界。这个时候，他就睁着机灵的眼睛——当然，从他的智力水准来说，无法称为“机灵的人”——现在也睁着乌黑的眼睛，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开始的一切……

当地时间深夜，我们抵达位于日内瓦郊外山上的饭店——从高高的山坡上可以俯视湖泊。光筋疲力尽，一直睡到天亮。第二天早晨，我们到大餐厅就餐，窗外垂悬着绿叶茂密的树枝。旁边餐桌的日本旅游团肆无忌惮地向光投来好奇的眼光，我想起瑞士航空公司客机上的乘客都没有这个样子。



# 萨尔茨堡·维也那之旅「二」

## 1

早晨从苏黎世乘坐火车前往萨尔茨堡，预计中午过后不久就能到达。光在火车里显示出与在飞机上不同的冷静沉着的态度。在饭店吃过早餐，离去火车站还有一段时间，一家人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从间隔距离恰到好处地整齐种植着七叶树、橡树、榆树、白桦树的阳台旁边，走到高高生长的混生林地带，再返回来，耳边有黑色小鸟的清脆鸣叫。

光仰头在树梢上寻找鸟。鸟的叫声尖脆高亮，声声不停。

光结束幼儿期的自闭性以后，一下子对鸟的鸣叫声失去兴趣。现在由于受到第一次出国旅行的刺激和第一次在外国听到这种少见的鸟的叫声，重新唤醒他对鸟叫的浓厚兴趣。

我想起光小时候听过的日本鸟类录音带里几种与这个小鸟相似的叫声，问光是否就是那种鸟。我问了几遍——在特殊情况下，光会敏锐地回答问题，但一般地说，和他说话的诀窍，要慢慢地、不能让他着急地，稍微变换语言反复询问同样的问题——他听我说出一种鸟名，就默默地摇头。后来我问道："是知更鸟吗？"

他微笑地回答："不是，音程不一样。"

就是说，光终于具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比较日本鸟类与欧洲鸟类的方法。

当我们乘坐EC（即欧洲城国际特快列车163号）出发以后，光一动不动地坐着，兴致勃勃地望着窗外的山川树木、楼房建筑。看来他对突兀出现的阿尔卑斯山陡峭险峻的高峰感到震惊……

我在年轻的时候曾协助编辑渡边一夫先生的著作全集，阅读过蒙田、拉伯雷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旅行日记。对他们描述的一路上天主教与新教的城市错综复杂地反复交替出现，觉得头晕目眩。而现在车窗外就实实在在地出现尖塔和清真寺两种不同风格的教会建筑的交替。在妻子看来，大概我也和光一样，一副眺望窗外风景的茫然神情。

在长时间行驶的列车里，光似乎逐渐适应，不知不觉变得安宁平静。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和妻子也就放下心来。我开始看书，当窗外出现欧洲独特的树木时，热心注视着。当草原

的平面向着铁轨水平地靠拢过来的时候，妻子则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聚精会神地观察野花。光对我们的视线总是采取超然的态度，竖起耳朵倾听风景。当光面临困难的局面时，我们为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当困难克服、危机渡过以后，我们又自然而然地朝着自己的方向，而且各自不会拉开太大的距离，共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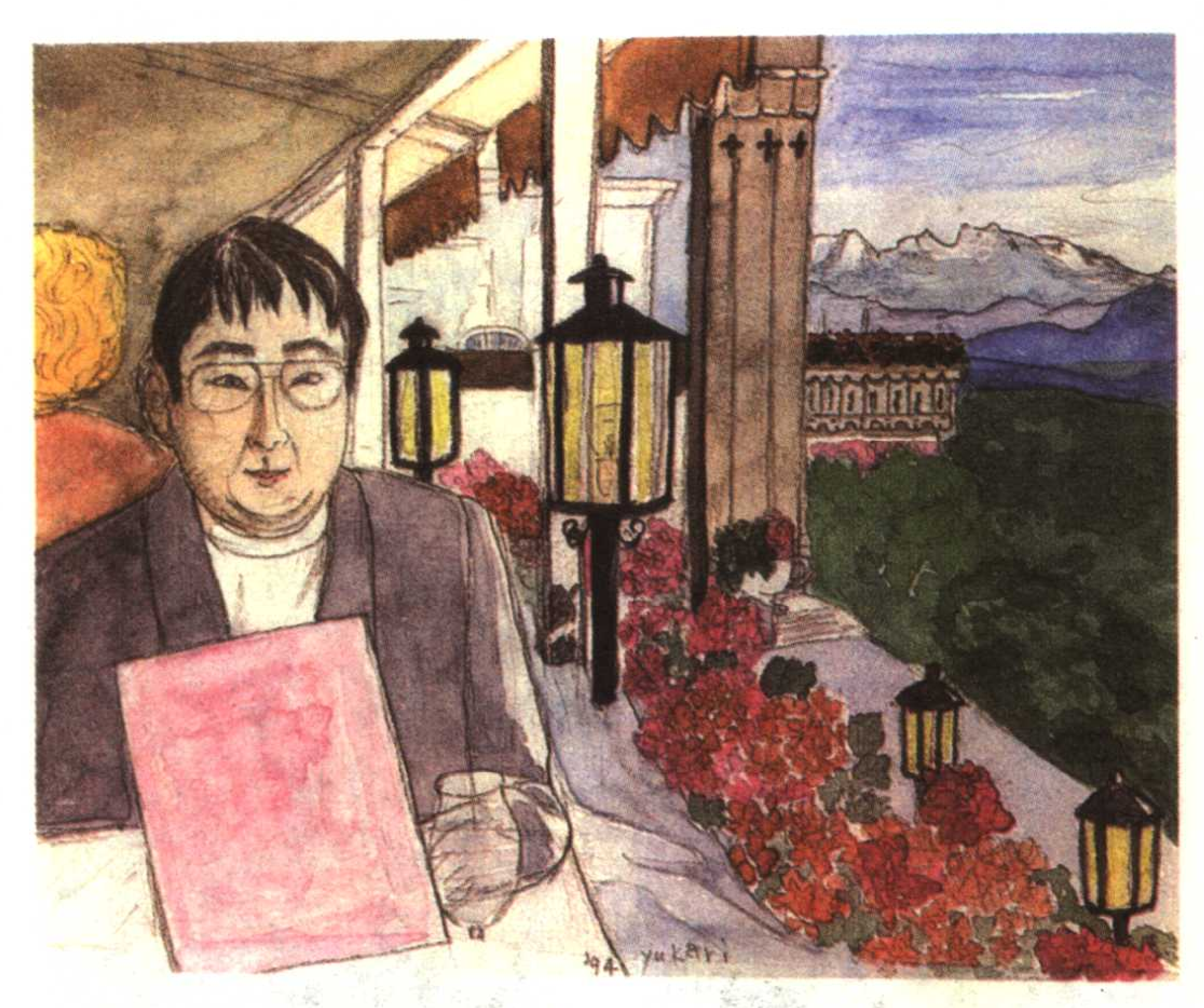


## 2

已经为我们预定好名叫哥本茨尔的山庄风格的饭店。萨尔茨堡车站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色，下车以后，直奔郊外，抵达路标表示700米的、外观朴素的饭店。妻子和光住一间屋子，我住隔壁，但两间可以相通。走到阳台上一看，美丽的萨尔茨堡城市景色尽收眼底。

正面横着萨尔察赫河，还有旧市区、新市区；右边是山峦，满山茂密葱茏的树木绿得发黑；左边阿尔卑斯山巍峨耸立，大概是与德国的交界；中间是霍恩萨尔茨堡，我在介绍萨尔茨堡景观的书籍里已经见识过。我忘情地欣赏萨尔茨堡的美景，不觉天色渐暗，暮色浓郁，并且下起雨来。橘黄色的闪电闪耀扭曲，伴随着隆隆雷声。这天晚上，由于高速飞行产生的生理性不适应，我一直没有睡觉，望着窗外，直至天亮，觉得蜂拥地围裹山头的乌云具有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版画那样的粗犷线条。

我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所以在旅途中也做笔记看材




ザルツブルグのホテル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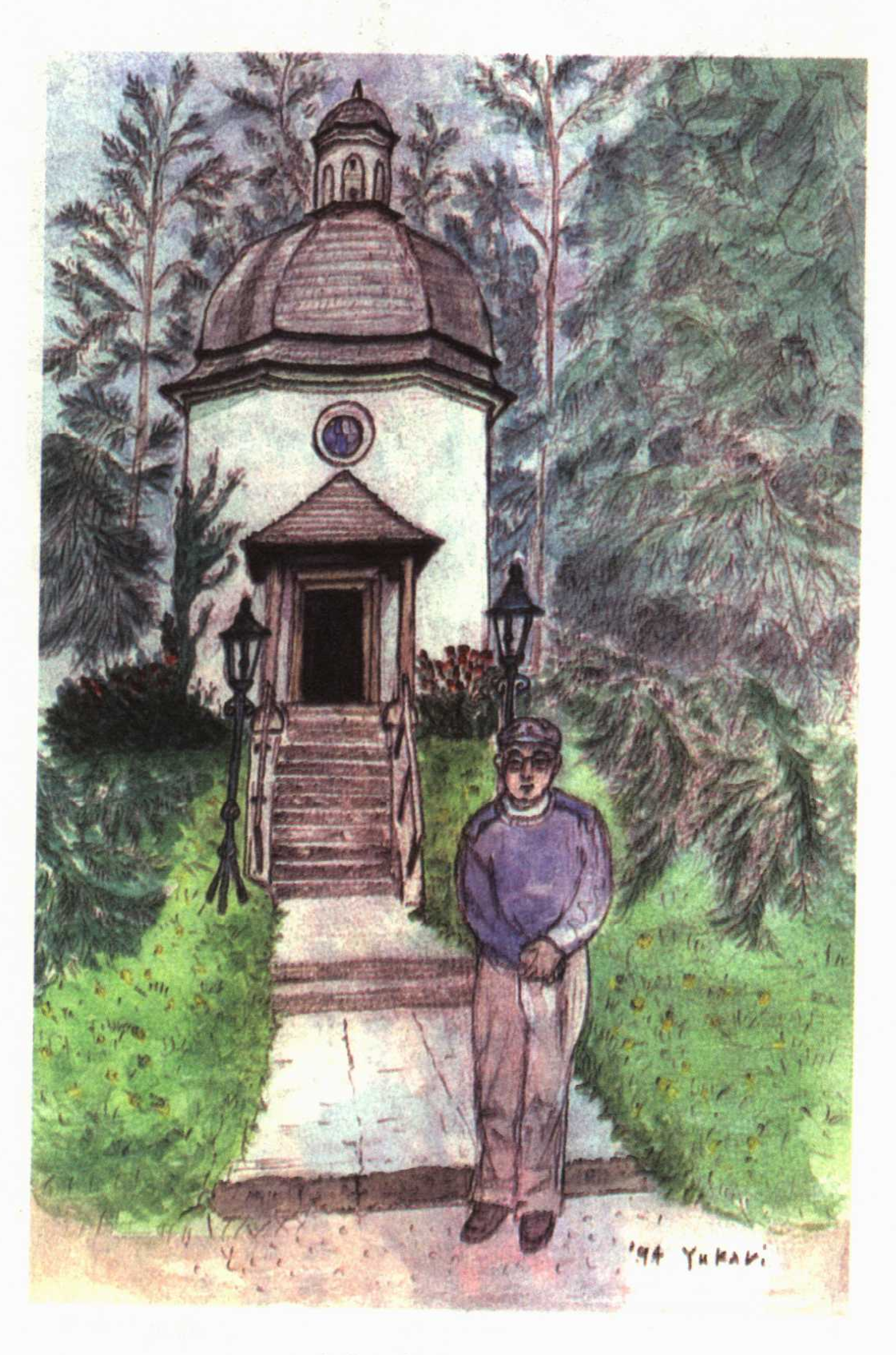
在萨尔茨堡的饭店



维也纳玩具

'93 yukari

ウィーン土産




圣洁之夜的教堂

料，想把神秘的气象写进去。气象的各种条件造成云彩的千变万化，欧洲与日本大概无多大差异。但是，我看古代绘画，觉得欧洲云彩的形状、色调显然别具一格。而且在欧洲旅行时，的确也亲眼见过。我曾在美国的大学里住过一段时间，窗外树木峥嵘的景色以及气象的变幻无穷尤其铭刻在我的记忆里。而且，我在阅读巴尔扎克、狄更斯的作品时，他们生动细腻的气象描写，时时让我不由自主地亲切回忆起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暴风雨或者暴风雨过后晴朗宁静的天空。

抵达萨尔茨堡那一天，傍晚开始下雨，而且还有些微风。接连几天，气温都很低——今年的这个季节气温偏低——在萨尔茨堡逗留期间，经常下雨，这种天气还是很少见的。不过，我们都处在旅行的兴奋之中，在宽敞的阳台上支起帐篷布的天棚，愉快地共进晚餐。我翻看妻子的画册，发现她对摆放在阳台上的一排花盆很感兴趣，还有身穿西服的光正一本正经地看着菜单的表情……

饭店的女老板说，虽然饭店规模不大，但这里的饭菜在整个欧洲都享有声誉。看来她是这家家族经营的饭店的核心。她的丈夫身体高大健壮，似乎是退役军人。我们在路上一边采集植物一边散步的时候，他驾驶着漂亮潇洒的小车从我们身边驶过，还对我们亲热地挥手致意。

一个美丽的姑娘和女老板的儿子主要负责服务台的事务性工作。我和他们简短地聊过几句，给我留下认真坦率的印象。服务台的墙上挂着尼克松的照片，我想起曾看过这样的新闻报道：尼克松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到政治上本应保持中立的奥地利访问，却在萨尔茨堡机场受到示威游行队伍的包围。我谈

起这段往事，正在转接电话的儿子、即服务台姑娘的丈夫说，他当年就参加示威游行包围过萨尔茨堡机场，但是尼克松冲破包围圈，来到这家哥本茨尔饭店，对这里的美味佳肴非常满意。

我听他们说，参加萨尔茨堡夏季音乐节的许多音乐家都住在这家饭店里。我想起来我们到达那一天恰好是周末，餐厅里客人很多，人声嘈杂。后来有一天，在音乐方面目光敏锐的光发现有一张椅子的靠背上贴着写有"SEIJI OZAWA(即征尔·小泽——编者注)"的名牌。于是在旅行即将结束时，我们还欣赏了小泽征尔先生指挥的马勒第三交响乐。

渡边一夫先生是研究法国复兴时代及其文学的专家，他在法国王朝评传的著作中论及的几个人，如亨利四世、卡特琳·德梅迪西斯埋葬在巴黎郊外的圣·多尼大教堂里。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王朝圣地祖坟被挖掘破坏。后来，亨利四世的脑袋、卡特琳·德梅迪西斯的脚没有找到，据说被民间收藏，不知流落何处。渡边先生曾带着奇怪的幽默感写过一篇随笔进行考证。

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从维也纳到巴黎的安排似乎多少与渡边先生的情趣有关。那一年是圣·多尼大教堂的领地祖坟被挖掘一百年纪念。于是我想，如果有什么与此相关的纪念活动或者刊物出版，可以在当地亲自体验或购买。

然而，萨尔茨堡艺术节就是在圣·多尼大教堂举行，甚至我还得到出席小泽征尔先生指挥的马勒第三交响乐的入场券。这位指挥天才在欧洲获得成功后回国时，我曾采访过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他是我此生所认识的最杰出的青年之一。时隔

三十多年，我看到的站在大教堂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指挥的小泽征尔先生更加优秀。他从容不迫地组织、调动法国的交响乐团及其合唱团、美国的黑人女低音歌手以及当地的少年合唱队，通过马勒的音乐，表现人的丰富感受性。

光陶醉于指挥大师“导演”的音乐旋律之中，在第一乐章结束后的长时间休息里，我们想起他在萨尔茨堡的饭店餐厅里骄傲地坐在贴有“征尔·小泽”名牌的椅子上吃饭的情景。



3

光的三十岁生日是在哥本茨尔饭店里度过的。安排我们旅行日程的一位U先生给饭店传来祝贺的传真，而且因委托饭店订做生日蛋糕，于是饭店女老板也送给光生日纪念品。我和妻子给他回赠光的CD，以表感谢。我们在这家饭店住了几天，与女老板之间也达到见面熟悉的程度。

第二天，我们来到一楼大厅时，服务台的年轻人格外亲切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吃午饭时，女老板特地来到餐桌旁，显得很兴奋，说昨天晚上一家人听了好几遍贵公子的CD。

她说：“我的父亲经营过小饭店，幸运的是，自己和这家具有悠久历史的饭店的继承人——就是现在的丈夫——结婚。我们认为，我们的饭店经营一直是成功的。孩子们也都热爱这个工作，并且为之感到骄傲。长子娶了个温柔的媳妇，他们一起负责服务台的工作，孙子们也都健康地成长。那些可爱

的孙子，您大概见过了吧？

“我之所以能做得这么好，全靠父亲的教导。父亲教育我要积极向上地生活。您和太太对待孩子的态度就是积极的人生典范。我们一家人还谈论过这个问题。您的残疾孩子的人生更是积极的态度。他的音乐具有何等纯粹的个性化表现力啊，人生与音乐中都产生如此美好的事情！”

我们离开萨尔茨堡的那一天早晨，饭店女老板的丈夫——大概他今天起得格外早——和妻子、长子夫妇一起与我们一家人合影留念。丈夫操着不太流利的英语对上身穿着蒂罗尔民族服装的光说：

“你是个好小伙子。”



## 4

在萨尔茨堡逗留一周，然后在维也纳逗留三天，最后到达巴黎以后，我们都一直沉浸在音乐的浓郁气氛里。我们欣赏身穿莫扎特时代服装的演员们用古代乐器演奏的各种音乐会，观赏木偶剧《魔笛》，还参观各种纪念馆，看到莫扎特、贝多芬的乐谱手稿。我们乘车出门兜风时，来到一座小教堂。对于这些音乐活动，光比我们更感兴趣，尽情享受。在萨尔茨堡居住几天以后，光在与饭店的卧室相通的、带阳台的起居室的壁炉前，开始聚精会神地对着五线谱创作新曲。

不记得什么时候，还是相当早以前，我曾经在文章中这样

说过：人经历过一次美好的体验，于是大概又会经历一次或几次同样的体验。人生中会有如此感觉的一个时期。但当这种美好的体验不知不觉结束的时候，恐怕再也无法享受到这种感觉。甚至在享受美好体验的时刻，就会感觉到人生秋天的来临……

我和妻子对这次旅行怀着深切的感谢之情。对于光来说，又是怎样的呢？在观看旅途照片的时候，除了听音乐这样的活动外，他对其他所有的情景都想不起来，面无表情，没有特别的感慨……

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乘坐飞机或火车，只要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身在家里似的平静感觉。如果近一个星期住在一家饭店里，更是如此。这种身在家中的感觉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他坐在小桌子旁或者趴在地毯上在五线谱上作曲。

于是，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光来说，这个世界上最能给予他心情平静感觉的是作曲的时候。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思想不正是通过自己的音乐来表现的吗？就我自己而言，不正是为了表现自己现在这样生存在世界里，这个根本性的感情才写小说吗？而且梦想把通往超越这个世界的道路融进这种表现。然而，我经常从光的音乐里预感到自己希望的实现。



# 声音的表情



## 1

光将他的新作编辑成第二张 CD 出版。在一次收录的 CD 曲子里第一次使用小提琴。因此，前些日子，我们一家人听了几位优秀的年轻小提琴手的演奏来进行比较。我深深感觉到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大家都认为日本国家的未来如何越来越难预测，但谁也不会怀疑，日本音乐家不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将成为世界之冠。

最后决定由出类拔萃的年轻的小提琴手加藤知子女士和第

一张CD的钢琴演奏家海老彰子女士、长笛吹奏家小泉浩先生共同合作演奏光的第二张CD的曲子。于是我们一家人又一次认真倾听了加藤知子女士的唱片。

光当然是最热心的听众，当与他同龄的制片人和母亲问他对加藤女士的演奏有什么感想时，光表示演奏十分美妙动人，接着说：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的表情！”

大家起先以为光指的是演奏者的小提琴声音的个人特色，因为光说的话虽然简单，但在音乐语言方面，有时包含着意想不到的专业性的观察。

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自己没有见过本人，所以不知道她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而且看来光对她的声音还特别在意。

声音的表情。这种表现形式很有意思。如果模仿小林秀雄的说法，大概可以这么说：不存在某个人的声音，但是存在声音的表情。我们回想某个人的声音时，不是从记忆里寻找他的声音，而是回想他在某个时候的声音的表情。

另外，光的视觉异常，即使戴着眼镜矫正视力，也仍然难以分辨对象，甚至看电视里的相扑比赛，他都要坐在电视机紧旁边。在日常生活中，他大概很难看清别人的表情。因此，他恐怕是以敏锐的听觉把别人的个性、感情听成声音的表情吧？

我们一家人谈论这件事时，大家似乎都格外认真注意倾听别人的声音，就像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一样。当时我谈起这样一件事：

与往年一样，今年还是去从成城学园前车站往北笔直延伸的大路上赏樱。那条路的尽头略往右拐，便是大冈升平先生的

家。樱花盛开的时候，住在车站南面的野上弥生子女士有时也穿过铁轨，前去大冈家拜访。这两个人的声音都很洪亮优美。

大冈给我家里来过电话，他为人温和——这无疑出于正确的含义的理解。光接的电话，他对光说话十分和蔼亲切。光只要不是发病后筋疲力尽，对电话铃声肯定会作出反应。他往往抢在别人前面接电话，只要觉得对方说话和蔼，就非常尊重他。

大冈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一天，光接到大冈打来的电话，他把电话交给我以后，到厨房去，对母亲说："今天大冈先生的声音低一度。"我放下电话后，光也对我这么说。光具有绝对音感，通过音调记忆声音的表情，所以发现今天大冈的声音比平时低一个音程。而大冈先生当天下午在住院的那家医院里——他打电话对我说：你的新著已经收到，但现在住院检查身体，所以这一段时间看不了，请原谅——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我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当别人谈论自己的时候，光喜欢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我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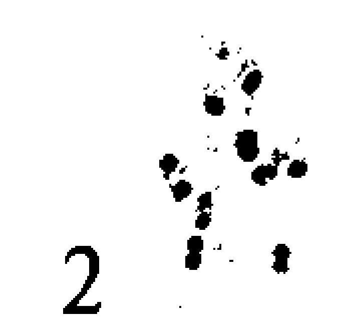
"光，你现在还记得大冈先生的声音吗？不是那种低音，而是平时那样的音调。"

"当然记得。前些日子还听过大冈先生的声音哩。"

妻子和女儿都笑起来，对他说："五六年前的事情不能说是前些日子。"但是，我想到做梦。如果光真的像这句不可思议的话所说的那样，现在还能经常听到大冈先生对他鼓励的亲切的声音，那该多好啊！

广而论之，如果我们平时能偶尔听到死者熟悉而亲切的声

音，那生活将变得何等丰富而深刻啊！



## 2

我利用光出版新的CD——准备起名为《大江光第二张音乐》——的机会，请几位朋友策划一些活动。其中之一是制作电视记录片，综合记录光走上音乐创作道路的人生历程和他的父亲——我的文学生涯。一个残疾人如何表现自己？家里人如何接受他的人生过程？这个电视记录片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所以我们都表示同意。

计划进展到即将开拍阶段，我和光开始各自的准备。光要在电视里谈论自己的各种人生体验，因此采用录音带的方式练习准确的发音和说话，他还要仔细回想残留在脑子里的小时候的记忆。

恰好这时NHK语言电视广播制作的一部反映我的一位老朋友、法国作家生活的电视记录片请我撰写解说词。这部记录片拍得非常出色，其中有这位名叫米歇尔·特鲁尼耶的作家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采访小孩子的镜头。我在看记录片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主意，所以在解说词录音那一天，我拿到工作的报酬后，绕到新宿，买了录音机和麦克风。

在我们家采访录像那一天，光面对麦克风，心情十分紧张，但是他努力回答问题，语调显出平时没有的郑重其事。光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说话，也很注意语言的节奏以及整体形

态——语言作为文章的一贯性和声调的统一。而面对采访所表现的郑重其事的心态，使他追求与平时略微不同的节奏和形态。身有残疾的光认为这种方式就是人说话的原则。

即使谈话的内容含糊不清，语法经常凌乱错误，但自始至终还是勉强保持一种声调形态。就是说，比起谈话本身的内容，他似乎更重视语言的音乐性。

用他的话说，就是声音的表情……

于是我想到：作为他的父亲，我的小说和随笔经常被读者批评为“难懂”——更直率地说，是“晦涩的拙劣文章”。这种看法也许现在还依然存在。岂止如此，恐怕大有市场。最近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说话的音乐性问题。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离开四国的森林山村不过才五六年。大冈先生去世至今也正是五六年，而光在这段时间里，一直记住大冈的声音和音调。所以，我把山村语言作为自己言语感觉的基础，应该说是正常的。事实上，我在东京说的话，经常感觉具有甚至如外语那样的音调形态。

于是，比起耳朵听到的语言，我更重视眼睛阅看的语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向。对于这一点，我好像有一种自我意识。因此，至少我的创作初期、中期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文体。

我一边认真听着光的谈话的音调形态及其音乐性，一边想着这些问题，似乎产生一种通过语言感觉治愈的心情。我打算在小说里慢慢地予以检验……

3 

经过一个星期的练习，光的说话方式取得显著效果。星期一那一天，光接电话的声调显得彬彬有礼。这是精神神经科的K医生——光一直受到他的关照——打来的电话，说是日本现在遍地都是外国劳务人员，由于文化差异产生许多心理问题，到医院要求治疗或咨询，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大问题。现在已经成立一个学会，思考这个问题，问我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有何感想。

我对这些情况既不了解也缺乏专业知识，但能够接近思考这些问题的人们，觉得实在是难得的机会。我回答说："在文学领域做好这方面的充分准备以后，再向您请教。"接着，K医生似乎比正题更感兴趣地说道：

"没想到是光出来接电话，他现在说话很好哇。"

后来，我陪着光到他的医院去复诊取药，他又一次称赞光说话清晰明了。

不久以前，就是三月份，光所在的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公布明年有几个老师有所调动。据妻子说，他带光去医院的时候，K医生每个月都要问光是否发病，发病状态如何这样的问题。那一天，光回答医生的问题以后，K医生说："光好像还有话要说。"在妻子的鼓励下，光说出完全出乎她意料的话：

"从下个月，四月开始，能继续下去吗？"

继续什么？最关键的部分没有说出来。光说话几乎都是这样。当然，光其实一直在考虑"什么"、"做什么"这个重要的问题。应该说，这个主题一直处于他的心里正当中的位置。所

以，大概他觉得没有必要说出来。

只有与他的心灵相通的人——例如母亲——才能最迅速准确地理解他的这种说话方式。其实，我们平时在双方都了解谈话背景的情况下，交谈方式简单扼要，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劳力。从文学理论来说，有人称之为“克尼斯·巴克那样的战略性的文体化语言”。例如说：“你是要油豆腐（面）吗？”“不。我要炸粉团（面）。她要炸虾（面）。”

但是，光与谈话的对象之间没有按照某种规则形成的文体化的共同战略性基础。于是出现问题。

这种情况下，他的陪伴者——一般是妻子或者我——就要把光脑子里的“战略”向对方说明。听了我们的解释，光往往比对方更满意地点头。例如在回答K医生的问题时，这种方式可以使光回答的内容完整充实，有效地提高速度。但是，我和妻子这样做是否会妨碍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言语发达程度而必要的“辛苦劳动”（这是林达夫对法语trouvador一词的翻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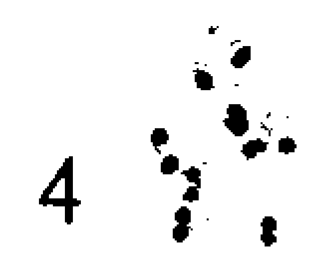
这表明大概还潜在着父母亲的体面这种早就应该克服的东西。面对麦克风，双方都期待着能够尽量正确地谈话，在光没有找到恰当的词语时，耐心地等待着，鼓励他自己弥补语言里缺少的“什么”、“做什么”这些重要的部分。这样方式的录音，使我仿佛看见沉睡在光心底的语言能力开始苏醒，他又重新成长。



北海道旭岳风景



通往富良野的道路

4 

为祝贺新的CD出版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在广岛举办音乐会。家有残疾儿的许多父母亲前来支持这场活动。在音乐会准备期间，我想把50年前发生在广岛的那场悲剧的含义告诉光。谈话的方式还是想让他面对麦克风，我也郑重其事地采取始终一贯的音调说话，然后让他以自己的语言表达感想，并且录音。

光生于六月，一生下来就发现脑部异常。在他出生七周以后，我就去广岛，采访原子弹轰炸患病医院的医生和患者，深受他们的人生态度的影响。当时我也觉得自己的孩子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怀着沮丧的心情，把写有光的名字的灯笼放到河里流走。那么，我是如何振作精神，为了文学的新生和光的康复而具体工作的呢？我觉得无法用自己和别人信服的语言说出来。尤其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更是如此。

于是，我想练习和光对着麦克风，用他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自己在广岛的日子里所经历的事情。也许那时与其说为了训练光的说话方式，不如说为了检验自己的"声音的表情"。



# 哭叫的灵魂

## 1

由于东京正是梅雨季节，乐器发潮，光的CD《大江光第二张音乐》（COCO78161）在北海道录音。录音那一天，因为我要和在一所大学担任领导的朋友谈话，妻子陪着光和音乐家们一起先去旭川。

光又高兴又紧张，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这个时候光最容易癫痫病发作。虽然这种担心缺乏足够的医学根据，但事实上发生了也许可以说是中度或轻度的发作。当天晚些时候，

我从妻子的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

除了主治医生之外，与光同行的都是光从发病到恢复的过程中最可信任依靠的一些人：妻子自不待言，其他的有从录制第一张CD开始就成为我们一家人的朋友、尤其受到光深深爱戴的长笛吹奏家小泉先生，钢琴演奏家海老女士，还有新朋友、小提琴演奏家加藤女士以及录音师们。

我在制作光的CD时才第一次与录音师打交道，我对他们深感兴趣。他们具有工程师的双手和脑子，同时又具有艺术家的耳朵。这种类型的人，心灵总是温柔而深邃。这使我想起——尤其通过给光的治疗——几位医生的为人。

光发病以后的日程安排里，有时在休息日和大家一起爬雪山，总是这些录音师给予光必要充分的照顾。录音的最后一天，我终于赶到旭川，在监控室里看着演奏家们演奏的画面，听着他们的演奏效果，发现在一旁对照乐谱的光已经没有任何发病遗留的痕迹。下面是我为发行这张CD写的文章。

## 2



旭川飘飞着鹅毛大雪，在水晶大厅里，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听到用小提琴演奏的光的《夜的随想曲》、《如歌的行板》。我似乎有点茫然，因为我听到的是灵魂哭叫般的音乐……

当然，这是富有表现力的优美音乐。但是，由于我长期从事创作小说的工作，对音乐也将它置换成文学语言进行理解，

而且更由于我是这个智力障碍的作曲者的父亲，所以仿佛听到忧郁的哭叫般的声音……

我在北海道新鲜的空气里思考着。这的确是灵魂在忧郁地哭叫的人——他不是婴儿，在比婴儿长大一点的幼童里，有的人已经具有这样的灵魂——创作的音乐。或者可以说，如果探索回响在那座用粗糙的木材建造起来的大厅空间里的旋律根源的话，恐怕最终只能追溯到忧郁地哭叫灵魂的人……

光的第一张CD《大江光的音乐》发行的时候，有过几次采访。尤其女记者、女播音员总是好意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光这样成为广为人知的人物，对他本人来说是好事吗？"

坦率地说，我不明白这个问题的含义。因此后来还时常想起。为配合CD发行而举行的演奏会上，光作为作曲者走上舞台对观众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应该从心里感到高兴。另外，当他发现自己的曲子出现在电视剧里时，一个一个地看着和他一起看电视的家人的脸，露出惊喜的表情。他的CD听众寄来的表达感想和充满鼓励语言的信函，他都装在大信封里珍惜地收藏在自己的床下……

但是，我认为，光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更何况性格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无论是对家里人，还是对职业培训福利院的老师和同学，或者对几个月去复诊一次的脑神经科的医生，都是如此。而且有时甚至觉得他已经忘记了自己还发行过CD。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我觉得，这从他为发行第二张CD而创作新曲时的表情可以看出来。第一张CD发行时他对音乐的反应——首先是自己的曲子由优秀的演奏家们变成现实的

声音——应该说是我们把光推到音乐前面。但是，他为发行第二张CD所进行的发自内心的努力使他进一步加深了创作的力度，并且在技术上加强磨炼。我觉得光的音乐表现力正在明显地提高。

这个提高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阴暗的灵魂哭叫般的声音。悲伤从一开始就是光的创作主题。然而，音乐表现力的进步使这种悲伤毫无掩饰地强烈表现出来。大概只能说光的悲伤变成这个样子。

## 3

小时候，因为我不明白“深思熟虑”、“深谋远虑”这些词语的含义，曾经暗地里苦恼过。然而，当我碰到什么新问题，或者必须做出决断的时候，脑子里如同闪过一道亮光，瞬间就能完成思考。就是说，我考虑问题就像反射性运动一样迅速。

但是，我在与人的现实交往中，隐约感到某人“深思熟虑”，某人“深谋远虑”，因为自己不懂得如何才能“深谋远虑”，大概也为此大伤脑筋。

自从以小说谋生以后，我开始理解，大部分靠的是经验，小部分的是靠理论。事实上，对于小说家来说，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做到深谋远虑、深思熟虑。慢慢地写、反复地修改，只有在这样的书写文字的时候，自己才在真正地思考，或许还能思考别人从未想过的新事情……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思

想。

光好像很难以语言来思考，他能够反射性地做出“这个好”，“这个正确”的判断。但是，比如他对母亲也无法用语言说明自己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就是说，他大概不能以语言进行思考吧？

但是，他喜欢音乐，除了睡觉，几乎都在听音乐，于是请人教他音乐创作的基本方法，逐渐地他学会以音符记述自己内心的音乐，他学会通过音乐来思考，通过音乐深思熟虑。

起初只要给光五线谱和一支铅笔，他就立刻开始记述自己的音乐。他能把脑子里的音乐，而且是以一连串的和音构成的音乐写在五线谱上，显然是思考过程中的操作。

对于光来说，五线谱是多么重要的纸张啊！这次去北海道录音，我和光坐在旭川与富良野之间高原的广袤玉米地里聊天。我说：“你今后，将来，想做什么？（沉默）是继续搞音乐吧？”

光半天没有回答，最后这样说：“纸还剩下几张？”光在创作收录进这次CD里的几首曲子的时候，我们经常看见他面对五线谱，铅笔却指向空中，一副沉思的神情。妻子有时对他说：“这么难的话，今天就不要写了，休息一会儿，好吗？”然而，光觉得母亲说的话不可理解，反问道：“为什么？”他对着五线谱显示出平静认真的表情，正表明这是他最充实的时候。

这次发行的CD正是他通过音乐创作认真深入地思考自己内心世界的结果，曲子的技巧更加复杂。我重复一遍：音乐创作力度的深化、技术的提高，使作曲者的悲伤变得强烈，

毫无掩饰地表现出来。而且，我听到小泉浩先生、海老彰子女士、加藤知子女士共同演奏的光的曲子，显然感觉到光自身充满幸福。

无论是悲伤还是痛苦，追求人的内心深处的力量——即使是在智力障碍却又无疑天真无邪的灵魂里——而且表现这种力量，就是同时对悲伤和痛苦的克服。

我们一家人深刻感受到音乐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这是艺术的力量。就在光为完成这一盘新的CD而努力创作和修改润色的旁边，我也在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打算作为自己小说家生涯的总结。初稿的完成与光的乐谱的完成恰好在同一时候。现在想起来，我们就像为了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而工作。两个人之间，显然是我更直接得到对方的鼓励。

## 4

录音结束以后的第二天，我们和电视摄制组一起去富良野。好像妻子打算写生花草风景，我的目的只是看看北海道独特的树木，光更是悠闲自得地休息。我们三个人在缓缓山坡相连的遥远的高原上，行走于一望无际的马铃薯、玉米、甜菜地之间的道路。我不禁深深感慨，好久没有这样心旷神怡地享受时光了。

这几个月，妻子最忙。第一张CD出版的时候，就作曲而

言，乐谱已经自费出版，所以只要选择合适的演奏家录音就行。这次出版的CD，虽然曲子并非新作，但润色定稿，就我从旁观察，觉得极其复杂，必须全力以赴。

为了完成乐谱，田村久美子女士，演奏家——尤其小泉浩先生和作曲家光同心协力，努力工作。妻子也经常在场，她的工作，广义地说，大概相当于制片人。由于光和母亲整天都在一起，他们俩总是就曲子交换意见。如果别人认为要修改曲子的某处细节，光能够立刻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他无法用语言充分说明这样修改的理由以及修改后达到什么效果。不过，妻子问明白光的感想后，在下一次的乐谱讨论会上向大家说明。

事情本来就很多，加上电视记录片的拍摄，还有夏天在广岛举行的音乐会，妻子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身心劳累。在接连几天紧张的录音以后，有这么一天放松一下自己，妻子轻松悠闲地写生小麦，采集本州少见的花草。

在她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但是对她这种性格，对她的这个神态，我觉得新鲜，仿佛第一次见面一样的感觉。虽然这只是我一直伏案创作长篇小说，今天好不容易放松一天而得到的感觉……

人到这个岁数——明年春天，我就满六十岁。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正专心致志地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为我小说生涯的总结——脑子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这样的感慨：

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这样与光共同生活。在我的人生中，我和妻子共同克服了可以说是生活中遭遇的最大困难，然而如今并不是只剩下回忆，问题依然遗留，

随时都会重新暴露出来，它甚至成为我现在人生的紧张与喜悦的主体。

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评价这种人生遭遇的得失呢？我想，只能认为人生就是如此。能说这是幸运吗？但的确不能说（或者绝不打算这么说）这是厄运。不过，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绝不能单纯地肯定就是前者。因为困难还继续存在。

现在，我们夫妇和残疾的孩子正享受着愉快而充实的午后时光。这一天，我刚刚知道收在光的新版CD里的最美妙的音乐同时也是忧郁地哭叫的灵魂的声音……

我虽然写了三十五年的小说，但我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无法给予总体的评价。我在CD盘上的说明文中写道，我感觉到音乐这种艺术的不可思议。尽管我心悦诚服地感觉到人生的不可思议，却只能说是极其质朴的感受。而且，我作为还在继续创作的小说家，深感人生的不可思议具有难以清理的多义性。



# 一切都完了。



## 1

今年五月至八月之间拍摄的光与我们的家庭生活的记录片在电视台播放了。我和妻子从电视画面上发现几处我们生活中的新的东西，似乎映照出我与光的关系中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侧面。

我陪同光去广岛参加音乐会的时候，特地带他参观原子弹轰炸资料馆。当他即将进入再现被炸的市内废墟以及伤亡者惨状的展厅时，显出从未有过的胆怯恐惧。我使劲鼓励他勇敢地

走进去。参观完资料馆，光和我都十分疲惫，坐在走廊的窗下椅子上休息。一会儿，我对光说：刚才看了这些东西，你说一说有什么感想。

光低着脑袋，以一种像是感叹又像是谴责的强烈口气回答说：“すべてだめでし（す）た。(一切都完了)”

我在电视里看了好几遍这个镜头，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虽然光的这句话在词语选择和语法上有偏差，但是他平时对发音、发声的要求总是很严格，说话从来不模棱两可，这句话听起来却含糊不清，即可以听成“すべてだめでした”，又可以听成“すべてだめですた”。

我想，就光的心情来说，他想说的是“すべてだめですた(一切都要完的)”。从今年初夏开始，我就把原子弹轰炸的各种照片和绘画给他看，在他的心里已经产生一定的情感，再加上这一次又亲眼看到展厅里的各种资料，同时在傍晚时候面对广岛的景色———动不动地看着祭灵塔里正在点燃的红色火光——此景此情，才感觉到“すべてだめですた”。

但是，光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出有点犹豫不决的样子，大概因为他觉得这“一切”也包括正坐在自己身边——尽管没精打采、疲惫忧郁，却还要极力表现出心情舒畅快活的样子和自己说话——的父亲在内。于是，他的这句话在语法上使用过去时，大概是想说带自己到展厅里来的父亲过去就“完了”，但现在不这么认为吧，所以“すべてだめでした(一切都完了)”。

电视记录片播放以后，收到许多鼓励的信件，报纸也发表了肯定的评论。不久，一家周刊杂志发表大致这样内容的电视评论：让残疾的孩子拍摄电视记录片似觉不妥，如果自己是残

疾孩子的母亲，绝对不让拍摄孩子发病的镜头。

我一边写着《康复的家庭》，一边这样想：这篇文章对癫痫病采取错误的态度，而且大谈“如果自己是残疾孩子的母亲”之类的豪言壮语——其实，如果她真的是残疾孩子的母亲，长期忍受艰辛痛苦的体验大概也会改变她，使她冷酷的心变得不那么残忍——我和妻子、光本人以及他的弟弟、妹妹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与这种对受癫痫病痛苦折磨的孩子及其父母亲的歧视的态度根本不同。

2

光的新CD《大江光第二张音乐》在去年秋天出版发行，并且举行了音乐会。一个雨夜的第二天早晨，我发现邮箱旁边的地上掉着两封明信片，上面沾着泥土。这明信片是为纪念光的CD发行而特地制作的，图案是光的乐谱手稿配以司修的秧鸡绘画，在会见记者等活动中发给大家。地上的两封明信片中，一张有文字，是用文字处理机打上去，没有署名；另一张大概不要了，扔在地上。昨夜下雨，不可能有人深夜冒雨大老远特地送来，也不会是邮寄来的，所以大概是住在附近的人写的。

**如果大江光不是大江健三郎的儿子，他能在闻名遐迩的“三得利大厅”举办自己作品的音乐会吗？他能出版发行CD**



幼年时候的光



吗？他能得到日本第一流（虽然离国际水平甚远）的演奏家们的合作吗？

正如《皇帝的新衣》的故事那样，没有本事的人受到出于“社会福利善意”的人们的同情支持而感到幸福。

请您注意，还有许多具有真才实学的作曲家因为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而郁闷不乐。

希望您真正了解许多音乐行家对大江光的作品的真实评价。

三得利大厅，还去吗？

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我发表讲话。现在把其中主要部分抄录如下：

今天各位出席我的儿子光的作品音乐会，他这个人没有流过泪，而且没有做过梦。即使小孩子不做梦，这在孩子身体健康的家庭里，大概不会在意吧？然而，我和妻子总觉得孩子欠缺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于是打算努力教孩子做梦。……我们对他说：“你晚上吃完药躺进被窝里睡觉，是这样的吧？可是你没发现吗？一只袋鼠跪在你的床边，用前肢这样子拿起你的手闻你的味道。这就是做梦！”然而，光不高兴地背过身去，他说：“这一带没有袋鼠！”

光以前与做梦格格不入。我和妻子都感到伤心。但是，《大江光第二张音乐》里收录一首曲子《梦》，是光自己起的曲名。

是光能做梦了吗？还是他想像父母亲经常对他说的做梦

而产生的音乐呢？即使让光回答，他也无法用语言说明白。然而，他确确实实创作了《梦》这首曲子。我们为此感到高兴。

当我倾听小提琴和钢琴演奏这首曲子时，脑子里出现一个新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首音乐如同灵魂的哭叫。也许说我听到阴暗的灵魂哭叫的声音更为准确。难道光做了这样的梦吗？如果不是做梦，难道是他认为做梦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听起来像是阴暗的灵魂哭叫的声音来自何处？不言而喻，这来自光的内心深处。而且我觉得这个新CD的所有曲子似乎都是这样的声音。

于是，我想到闪耀着朴素感情的第一张CD。这两张CD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呢？我认为它们是有关联的。而且更加深入。当我认真细致地观察的时候，发现在思考如何深入表现艺术、如何深入表现人生方面接触到它们的脉络。

不论是音乐还是文学，艺术创作就是赋予混沌以秩序，就是赋予暧昧的模糊的不定性的东西以形状。我们之所以觉得年轻的艺术家的工作具有新鲜感，就是因为对他们第一次完成的表现形式还看不习惯，好像遇到一位崭新的人。我想，就光而言，他的第一张CD《大江光的音乐》就有这样的新鲜感。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一旦完成第一次形式后，肯定还要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一步，积累经验，或者创造出新的形式。人创造艺术，作为艺术家而生存，就是接受这样的命运。

光也是这样进一步深化自己的音乐，终于创作出《大江光第二张音乐》。他反复听《大江光的音乐》，起到自我教育的作用，从而使创作技术更加多样，想像力更加丰富。他的起点必

须具有最早的音乐形式，然后运用形式创新的方法深化自己的音乐。他没有用语言谈论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新的CD就是具体深化的表现。我想，创作的过程正是他丰富的人生体验。

但是，对于光来说，音乐的深化必然触及他心中巨大的悲哀。灵魂哭叫的声音，正是出口被堵塞后开辟出路的呼喊。光的体验在这两张CD里表现出来的只是单纯的典型，但是这单纯的典型也同样存在有思考艺术普遍性的因素。

作为一般艺术的一个例子，看看我的小说吧。我生在四国的森林覆盖的山村里。如果我在高中的时候没有读到渡边一夫这位法国文学研究家的著作，从而产生就教于他的想法，也不会到东京来。大概在村子的森林工会里工作，和父亲以及祖祖辈辈那样，在家乡度过一生。但是，我进了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后来又开始写小说。第一篇是发表在《东京大学新闻》上的短篇小说。发表以后，我重新认真审阅。我甚至觉得，我这37年就是这样不断积累表现的形式并加以创新而度过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内心存在着比光更加阴暗复杂的悲伤和痛苦。纵览自己所写的书，自己的一生几乎全部都用在表现这种黑暗的东西，不由得万分惊愕。现在，我正在努力完成总结自己文学人生的最后一部小说，却一直扪心自问：难道自己离开祖祖辈辈幸福生活的山村，就是为了做这样的事吗……

但是，我听了这张光的音乐CD以后，明白了自己似乎无谓的人生工作的含义。就是说：不论悲伤还是痛苦，一旦以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就要不懈地彻底下去。像光这样的智力

障碍、心灵纯洁的残疾人也能通过音乐这种形式表现自己。

通过光的音乐，我还感觉到，表现本身具有使他康复的力量，具有治疗他的心灵的力量。不仅表现者本人，对于接受他的表现的人们来说，难道不也是这样的吗？我想说的是，这就是艺术的不可思议性。表现者通过自己创作的音乐或者文学不得不深入到黑暗的灵魂深处，在经受这种不幸的同时，也感受到通过这种表现行为自身被治疗、得以康复的不可思议性蜒可以说是幸福蜒这两种感受的不断重叠积累，造就表现者艺术的深化。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深化。而且，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接受艺术的人们来说，难道不是一样的吗？

就光过去31年的人生来说，小时候只是一心一意地倾听鸟的叫声，也许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后来逐渐听人创作的音乐，由于得益于母亲和优秀的老师的教导，他开始学习音乐，并且自己作曲。在出色的演奏家们的鼓励下，他出版了第一张CD。经过对自己的CD无数次的倾听、理解，他的内心产生在过去的形式基础上进一步创新的冲动。于是经过反复的创作修改，终于写出《梦》、《夜的随想曲》等阴暗的灵魂哭叫的声音一样的曲子。在我听来，这音乐的声音多么美妙清澈。从中可以知道，光通过音乐创作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巨大悲哀，同时也被治疗，得到康复。我想，这就是光的音乐，这就是光的人生。

光很少说话，实际上，除了音乐，对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他每天去世田谷区的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和那里的老师、同学好像相处得很愉快。但是，光对音乐具有

经过认真训练的“关注力”。这不仅是母亲和老师的训练，也是他20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听FM和唱片的自我训练的结果。

对于这种“关注力”，法国女哲学家西摩努·韦尔（1909项943）这样写道：如何才能把研究学问、学习、对上帝的爱结合起来呢？“关键在于带着关注力去祈祷，以灵魂最大的关注力向上帝祈祷。”我看到光对音乐倾注最大的“关注力”，心想韦尔的话是正确的。对光谈论上帝、信仰，大概比谈做梦更难。但是，光好像也害怕死。因此，我想，如果他通过对音乐的关注来理解祈祷，那该多好啊。

韦尔在同一篇文章里还谈到“圣杯传说”，受伤而痛苦的国王仍然守卫着圣杯，骑士走到他身旁，问道：“您很痛苦吗？”他说只有他才有资格接受圣杯。我认为，关心地询问光的痛苦与不幸的许多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拯救他”的许多人，实际上都在救助光这个残疾人，而首先就是即将开始的音乐会的这些演奏家们……

我深切感到，他们是通过各自的不同领域真正具有“关注力”的人们。而今天在这么大的音乐厅里座无虚席的听众难道不就是询问“您很痛苦吗？”的人们吗？难道现在不正是向光关切地询问吗？愿光的音乐能够回答你们的询问。

## 3

我讲完话以后，音乐会立即开始。在享受美好的时光以后，听众热烈地要求再来一次的掌声中，演奏家们邀请光走上舞台。以往这种时候总是我陪着光上台，但是从那一次的三得利大厅演出开始，我就让妻子代劳。光在母亲的陪同下沿着观众席的通道慢慢走向舞台。光的身体比母亲强壮，我觉得实际上他也有自己保护着母亲上台的心情。光比在我照料下更稳健的脚步和母亲一起顺利地走上明亮的舞台。我坐在昏暗的坐位上，心里产生一种平静的成就感，仿佛眺望着将来光与母亲两人共度人生的情景。

# 后记

每年夏天，我们一家人都到北轻井泽的别墅度假。登上高坡，辽阔的山坡上盛开着紫盆花、毛莨、麝香萱等各色花草。我喜欢花草，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直用色笔写生。于是，丈夫就让我为他的随笔集《康复的家庭》画插图。

丈夫的随笔很少这样连续以家庭作为主题，这些随笔在日本脏器制药——该公司为发展日中、日法的医学交流，还创立了小西国际交流财团——的季刊《早蕨》上发表。由于读者大多为医生和其他从事与医学相关工作的人们，所以从患者家属的角度来写，尤其受到他们的欢迎，而且被认为很重要。我起先觉得自己无法担此重任，没敢应承，但丈夫说北轻井泽花草的写生画和家庭照片那样的绘画就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开始绘画，没想到不知不觉竟然画了五年。

前些日子，我的母亲第二次住院，光的第二张CD出版发行，举行CD出版纪念音乐会，陪着发病刚愈的光第一次出国旅行，NHK拍摄《父子共鸣》电视节目，丈夫获奖……一件事接着一件事，最后我连画插图的时间几乎都没有。我绘画本来就是业余爱好，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赶出两三张连自己都不满意的画交出去，心里特别难受，甚至觉得有点沮丧。但是，小西国际交流财团的朋友们热情鼓励我，使我鼓起勇气继续画下去。我在母亲住院的病床旁边，画了纸气球和小布袋，寄托对她的回忆；在萨尔茨堡的饭店里，采一束雨后的野花插在茶杯里，写生一整天，在我身边的光对着五线谱继续作曲；去富

良野拍摄电视记录片的时候，在薰衣草的田地里，丈夫和光接受采访，我趁机急忙写生风景，风吹得画纸在手里啪嗒啪嗒翻动……这一切都留给我亲切的回忆。以前在北轻井泽的时候，丈夫工作，光模仿作曲家作曲，我模仿画家绘画，但是最近光也开始被称为作曲家，只剩下我还在模仿。我有机会为本书画插图，感到莫大的幸福。

大江由佳里

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康复的家庭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著　　郑民钦译
页数＝１９３
ＳＳ号＝１１２５４３３７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０３月第１版